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朱德历险记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杜世伟同志约我写本《朱德历险纪实》，希望把一些鲜为人知的惊心动魄的事情能如实地写出来，告诉广大读者。他非常动情地说，人们对朱总司令知道的太少了，尤其是青年一代，知道的更是微乎其微。我被他的情谊感动了，何况我自己正是长期从事朱德研究工作的，好像是处在一种责无旁贷，不容推卸的境地。所以，我就欣然同意了。

的确，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一讲到朱总司令，不是“朱德的扁担”，就是“伙伏头的故事”，看不到他运筹帷幄，叱咤风云，也看不到他跃马扬鞭，驰骋疆场。其实，这位伟大的军事家，是个有勇有谋的统帅，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长卷留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画面。他不仅灵活巧妙地运用战略战术，指挥千军万马，与敌人决胜于战场之上；而且在危急关头，能亲自带领战士冲锋陷阵，在枪林弹雨中，同敌人拼杀搏斗。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历尽艰险，有人说他是“戎马一生，大战三百，小战五千”。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权且不说。但是，他身经百战，绝非夸张之词。他被世人尊为“红军之父”，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是红军的总司令，是八路军的总司令，也是解放军的总司令。从有总司令那天起到取消总司令那天止，他是唯一的一位总司令，几十年如一日，绝非偶然。他和他的战友用生命和鲜血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历史，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是我们珍贵的精神财富。

书中所讲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是作者采访了许多跟随朱总司令南征北战的老同志和他的亲朋好友之后，又查阅了有关的史料和回忆录才写成的。尽管这样，也很难全面、准确地反映出朱总司令那种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大将风度，和他善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英雄气概。

朱总司令离开我们已经 20 年了，今年正是他老人家的诞辰 110 周年。谨以此小书来寄托一个战士对统帅的深切怀念之情。

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作　者

1996 年 11 月于北京

朱德历险纪实

智斗密探

1909 年春节刚过，21 岁的朱德就匆匆告别父老乡亲，与好友敬镕结伴开始南下云南的长途跋涉，去实现他那“从军救国”之梦。

朱德的“读书救国”、“强身救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中相继破灭之后，萌发了“从军救国”的思想。他认为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敢于把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强大的军队。中华民族要想不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和侵略，就得富国强兵。那时，由于受到日本明抬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下，“从军救国”成为许多爱国青年的共同愿望。

那时，云南正在编练新军，一改沿用了几千年的大刀长矛，都从国外购置新式枪炮，采用新式军队的操练方法。有不少四川人去云南加入新军，传来消息说云南陆军讲武堂也正在筹办，最近就要招生。朱德经过七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步行千里，在 4 月间赶到昆明。

夏天，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招生，经新军中的一位川籍军友的介绍，朱德和敬镕参加了考试，成绩合格，他俩都很高兴。万万没有想到，发榜时，敬镕录取了，而朱德却榜上无名。他前思后想弄不清为什么，按理说，他考的成绩比敬镕还好，这一点敬镕自己也承认，要只录取一个，那也该是他朱德。一连数天，他陷入苦闷之中，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敬镕实在觉得过意不去，便带着不安和歉意讲出了其中的奥妙之处，是他在报名时把籍贯改成了云南昭通。他解释说听别人讲过云南人比四川人好录取。这时，朱德才弄清了个中原委。

朱德从家乡带来的盘缠所剩无几，而他那“从军救国”之梦还未变成现实。但是决心已定，义无反顾，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要去闯荡闯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从母亲身上学会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准备去迎接一切困难。为了不改初衷，未能进入讲武堂，他降格以求，经一位在新军中任职的川籍军友的介绍，他补入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相当于师）第七十四协（相当于旅）步兵标（相当于团）当兵。在填写登记表时，他吸取了上次报考讲武堂的教训，把籍贯改写成云南临安府蒙自县，把原名“朱建德”改为“朱德”，字“玉阶”。

在新军里，由于朱德的文化程度高，又有强健的身体，在入伍后的基本训练中就取得了优异成绩，很快就担任了队（相当于连）的司书（文书）。不久，又逢讲武堂招生，他被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推荐去报考。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被录取了。这是朱德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也是他成为三军元帅的起点。从此，他开始了漫长而又神奇的军旅生涯。云南陆军讲武堂将要把他造就成为一个职业军人，造就成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名将。

1910 年 2 月，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课。朱德作为丙班步兵科的学生，开始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军事训练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清政府为培养军事人才扩建新军而建立的。教职员中的李根源、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张开儒等都是日本土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日本学习期间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拥护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回国后，除一少部分

人到新军中充任中级军官外，大部分人都去办讲武堂。这些人不仅参加了新军的建立和军事人才的培养，而且在以后的辛亥革命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坐落在昆明承华圃的讲武堂，每天清晨，当嘹亮的军号声迎来黎明之后，学生们在教官的带领下便开始一天的训练。在那广阔的操场上空响起那首激动人心的讲武堂的堂歌：

风云滚滚，
感觉它黄狮一梦醒。
同胞四万万，
互相奋起作长城。
神州大陆奇男子，
携手去从军。
但凭那团结力，
旋转新乾坤。
哪怕它欧风美雨，
来势颇凶狠。
练成铁臂担重任，
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

堪叹那世人，
不上高山安知陆地平。
二十世纪风潮紧，
欧美人要瓜分。
枕戈待旦，
奔赴疆场。
保家卫国，
壮烈牺牲。
要知从军事，
是男儿本分。
鼓起勇气向前进，
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

每当唱起这支歌时，朱德格外的激动和自豪，他感到每一句歌词都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几十年之后，他都清楚地记着这支使他终生难忘的歌。

朱德进入讲武堂后，深深受到浓烈的反清情绪的感染，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教官和学生的思想极为活跃，他们开始组织社团，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朱德在班上结交了一些朋友：范石生、唐淮源、杨如轩、朱培德、李云鹄、王均、金汉鼎、杨蓁、曹之骅、庐焘、曾钦仲、兰馥等。不久，他就约集范石生、杨如轩、唐淮源、李云鹄等人以五华山为名，成立了一个“五华社”，以互助互励、拯救中华为宗旨，还结为金兰之交，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

在第一学期即将结束时，有一位要好的同学问他：

“你听说过同盟会吗？”

“听说过。我早在四川体育学堂读书时就听说过，还看过他们出的《民

报》呢。”

“你愿意参加同盟会吗？”

“愿意。”朱德不假思索地回答着。

“那是个反清组织，官府知道了要杀头的。难道你不怕？”

“有啥子好怕的。好男儿应当如此。”

“我们知道你是个要求革命的热血青年，只要你不怕死，我就可以介绍你加入同盟会。”

随后，朱德又介绍“五华社”的成员也都加入了同盟会。在同盟会的各种秘密活动中，他们除了热烈地谈论军事起义外，主要是阅读当时的进步刊物，用以武装头脑和交流各地的革命信息。

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各种各样的宣传鼓动革命的书刊应运而生，《民报》、《天讨》、《汉声》、《汉帜》、《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夏声》、《新世纪》、《云南》等等，都秘密传入云南讲武堂。许多进步青年争相传阅着，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其中有许多青年就是在这些书刊的直接影响下，参加了同盟会，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那时云南有个叫叶尔凯的提学使（相当于教育厅长），得知有不少禁书已大量传入云南，正在青年学生中传阅，便派人潜入学生宿舍侦缉，并密报云南总督李经素，说传阅禁书尤以陆军讲武堂为最盛。李经羲看到密报之后，心惊肉跳，如坐针毡。他把同盟会视为死敌，把进步书刊视为洪水猛兽，立即下令知府衙门，要他们即刻派出密探装扮成新军的军官，进入陆军讲武堂日夜侦察，一旦发现有传阅禁书者，立即缉拿归案，不得有误。知府衙门那敢怠慢，马上搜罗来一批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和恶棍，换上军装混入了讲武堂。

这天，又是一个难得的星期天。

讲武堂里，一改往日口令声、歌声和操练声的喧闹，显得洛外的安静。同学们经过一周的苦读和操练，好不容易盼来了休息日，都相约出外游玩去了，只有朱德留在学校里，这正是他读书的日子，假日里读书已成为他的习惯。昨晚刚好从同盟会的同志手里拿到一本禁书，作完早操，他就钻进教室，埋头读起来，因为要很快传给别的同志。

快到中午时分，朱德仍坐在教室里如饥似渴地读着那本书，以至有人走进教室，他都丝毫没有觉察到。

突然间，一只大手拍在朱德的肩上，同时喊道：

“你是革命党！跟我走！”

朱德一惊，猛然回头一看，坏了：这不是经常出没在讲武堂里的那个密探吗？今天算倒霉，不该麻痹大意，撞上了他，看来这一关是难以闯过了，何况禁书就在手里。

“你认错人了。我不姓‘葛’，我姓朱，叫朱德。”朱德有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动声色地回答着。

“你不是革命党，那肯定是同盟会了？”密探紧追不放，一脸刁狠的模样。

“长官，我不是‘佟梦惠’，我真的叫朱德，在丙班步科。你若不信，可去问罗佩金教官和李根源总办。”□智斗密探

“你别跟我打哈哈。你不是革命党，也不是同盟会，那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看书。”这时，朱德早已把书合起来，将书背朝上，把书的正面

翻扣在桌面上。密探把他的一举一动看得真真切切，心想今天终于逮住了革命党，人赃俱在，就等回去报功领赏了。密探冷笑一声，说：

“我知道你在看书，问题是你在看啥子书？老实对你讲，我早就盯上你了。今天，你就是插翅也飞不掉了！”密探说着，伸手一把夺过那本禁书，狡黠地瞄了朱德一眼，把禁书翻转一看，封面上画的却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脑壳嗡的一声变大了。这难道是在变戏法吗？

就在这时，朱德不慌不忙他说：

“长官，我在看《三国演义》，刚才正看到诸葛亮巧施空城计，着迷了，不晓得有人进来，实在对不起。”

密探歪着脑壳斜着眼，把那本禁书拿在手上，像点票子一样，用拇指压着书页哗啦哗啦摆弄着，心不在焉地应对着说：“好书！好书！”但仍不撒手。

“你保准读过《三国演义》！”朱德笑着说。

“看过，看过，当然看过。关云长耍大刀，诸葛亮用计谋，是哪个也比不了的。”其实，知府衙门派到讲武堂来的密探，都是些不识几个大字的地痞、流氓和无赖。关云长、诸葛亮这些名字都是看戏时听来的，哪里读过《三国演义》？

这时，朱德已看出密探的尴尬，有意趁机戏弄他一下，好逼他把书还给自己，故意说：

“你能给讲两段精彩的，我就不费工夫看了。”

这一招激将法还真管用。密探立即推辞说：“噢！今天，我是公务在身。‘三国’嘛！改天再讲，改天再讲。今天还是你自己去看吧！”说着把书扔给了朱德，调头就离开了教室。

密探灰溜溜地走了，朱德虽然平安地闯过了一关，但他也没心思呆在教室里看书了。他找到范石生、唐淮源、杨蓁，把同密探斗智一事讲给他们听时，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拍手称快，都说朱德没有白读《三国演义》，学会了巧用计谋，禁书外面罩个别的书皮，这在兵书上叫作“偷梁换柱，李代桃僵”。用这个办法传阅禁书还真管用。打那以后，大家都照此办理。在同盟会员和进步青年手上传来传去的都是些《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以及《七剑十三侠》一类的武侠小说。其实，那都是些披了一件伪装外衣的“禁书”。那次事件之后，他们之间常用“玉阶兄看三国——蒙人”作为彼此玩笑的歇后语，用来打趣和嬉戏。

血战棉花坡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和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民国。这曾经使许多人欢欣鼓舞，以为中国将开辟一个新的纪元。然而，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并未停止，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大卖国贼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了，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于 1915 年 12 月 12 日公然宣布恢复帝制。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一致声讨，掀起护国讨袁的爱国运动。

这时，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云南新军的军官积极酝酿起兵讨袁。12 月 19 日，蔡锷机智地摆脱袁世凯对他的严密监视，辗转日本、香港、越南回到昆明。蔡愕在云南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他的到来，不仅坚定了唐继尧的讨袁决心，而且也壮大了讨袁军的声威。 22 日，蔡锷、唐继尧等一起召集上饺以上军官及外地来滇的爱国人士会议，宣誓效忠共和。25 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推举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镇守后方；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进而北伐；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广西，防堵广东龙济光部进攻滇南。云南独立，誓师讨袁，各省纷纷响应。

蔡锷即刻派人给驻各地的滇军将领送去亲笔信，介绍了全国反袁斗争的形势，要求他们作好准备，率部于 25 日和昆明同时起义，然后出师讨袁。

担任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的朱德，正在中越边境的蒙自、个旧一带剿匪平乱。当他得知袁世凯梦想做皇帝，一心要复辟帝制时，万分气愤地说：“袁贼不除，祸害无穷！”

12 月下旬的一天，朱德在街头突然遇到一位从昆明来的老朋友。

那人急忙凑上前来向他行礼，顾不得寒暄几句，就嘱咐他说：

“今晚务必请到城外的小庙相会，我有要事相告。”随即匆匆离去。

当晚，朱德甩掉帝制派的跟踪，如约来到城外小庙，来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便将一块碎布交到朱德手里。他展开碎布一看，一行熟悉的字呈现在眼前，分明是蔡锷的亲笔手令：

“按传令人的命令行事。”

“将军的命令，我朱德坚决执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朱德说。

来人告诉他，蔡锷已秘密回到昆明，议定于 25 日宣布云南独立，起兵讨袁护国，届时务必率部返回昆明，参加起义。朱德当即表示坚决执行命令，请来人转告蔡锷将军放心。

25 日凌晨，朱德遵照蔡锷的命令，率部向师部发起进攻，帝制派的军官闻风逃遁。于是，他集合部队，讲述了全国讨袁护国的大好形势，揭露袁世凯祸国殃民想当皇帝的罪行，宣布执行蔡锷将军的命令。全体官兵纷纷响应，振臂高呼：

“拥护共和！”

“打倒大卖国贼袁世凯！”

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开赴车站，立即登车，向昆明进发。

1916 年元旦，袁世凯蓄谋策划的登基大典虽然告吹了，但他一心当皇帝的贼心不死，还是启用了“中华帝国”的臭名，并改用“洪宪”纪元。

也就在这一天，在中华大地的西南边陲，响起了惊天动地惊雷，昆明举行了护国军誓师大会，发布了讨袁檄文，历数了袁世凯“叛国称帝”的十九

大罪状。护国军军容整齐，威武雄壮，士气高涨，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出征歌》：

滇军勇敢世界惊，

护国扬威名；
誓擒袁逆兴义兵，
民国我主人；
健儿之名我敢领，
踊跃争前行；
宝刀在手霜刃横，
杀贼如杀虻；
快清八方光汉京，
共和千万龄；
光焰万丈民权伸，
看我华国扬威灵。

护国军第一军下辖三个梯团，相继向川南进发。朱德所部编为第三梯团的六支队。22 日，六支队从昆明出发，朱德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身后一杆绣有“朱”字的黄底黑边的三角队旗迎风飘扬，好不威风。他引导着这支威武的队伍开向护国讨袁的前线。

护国讨袁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袁世凯惊恐万状，坐卧不安，立即下令组成“征滇临时军务处”，任命曹锟为川湘西路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督率十几万大军从湘西、川南迎战护国军。

护国军第一军进入川南之后，最初进展顺利。由于刘云峰所率第一梯团在云南宣布独立之前，已先期出发经东川、盐津入川。 20 日渡过金沙江后攻占了叙府（今四川宜宾）。赵又新的第二梯团和顾品珍的第三梯团，由贵州的毕节入川后，取道叙永（今四川永宁）向泸州进攻。

泸州，是川南之重镇，既为云南入川的必经孔道，又是重庆的重要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 月 6 日，护国军的董鸿勋支队与护国川军刘存厚部的陈礼门团合力攻克了泸州对岸的蓝田坝。袁世凯立即派曹锟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李长泰的第八师一部及周骏的川军第一师向泸州增援，双方兵力悬殊。2 月 9 日，北军偷渡长江，由于陈礼门麻痹大意，所部猝不及防，纷纷溃逃，蓝田坝、月亮岩相继失守。护国军一战而败，陈礼门自尽身亡，董鸿勋虽率队冲出包围，却遭到严重损失。

2 月 15 日，朱德率六支队赶到永宁后，即得到董鸿勋失利的消息。这时，蔡锷发来急电，命令他日夜兼程，急速前进，赶赴纳溪，接替董鸿勋的第三支队长职务。朱德率部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日夜兼程百余里， 17 日赶到纳溪前线。

此刻，阵地上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第三支队的余部仍在顽强地抵抗着敌人的进攻。第三支队正是朱德在蒙自带出来的那支部队，战斗作风英勇顽强，尽管损失很大，但是士气仍很高昂，锐气不减。特别是看到他们的老团长又来亲自指挥他们战斗，更是充满了信心。

朱德在战场调整好部队后，立即宣布了战场纪律，说：

“要消灭北洋军，打倒袁世凯，就得不怕死，勇敢冲锋。在战斗中，士兵退，班长杀；班长退，排长杀；排长退，连长杀；连长退，营长杀；营长退，团长杀；我朱德退，全军杀！这是铁的纪律，人人都得遵守。”

随后，他立即指挥队伍冲锋前进，将敌军击退约二三里，把部队布防在棉花坡正面高地上，同据守在红庙高地的北洋军形成对峙。

棉花坡距纳溪城有5公里，是坐落在金沙江与永宁河之间的一脉高地，江河沿岸都是起伏的山峦，是通往纳溪的大道，为两军必争之地，双方争夺异常激烈。北洋军在这里集结有重兵，他们倚仗着弹药充足和武器精良，昼夜不停地轰击护国军阵地。朱德带领着全支队日夜坚守在阵地上。但部队伤亡很大，营长曹之骅中弹穿肠，两天后牺牲。

护国军分三路进行反击。朱德亲自率领两个营附属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机枪排，从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双方交火以后，北洋军凭借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抵抗。朱德采用迂回战术，以一个营从正面用猛烈炮火牵制敌人，而将大部分兵力迂回到敌人的侧面去攻击。北洋军突然遭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损失惨重，随即组织兵力向朱部正面进行疯狂性的反扑，突破了几个缺口。朱德在友军的支援下，经过殊死搏斗，才夺回失去的阵地。

护国军在激战中，虽然取得了很大战绩，但双方兵力毕竟十分悬殊，三天鏖战，部队伤亡很大，减员颇多。于是，蔡锷下令护国军从22日起暂时改取防御态势。

23日，蔡锷从永宁到达纳溪，约同刘存厚召集会议，会商作战计划。蔡锷认为，就实力而言北洋军是占有较大优势，而护国军的兵源、粮饷一时得不到补充，相持日久，实为不利。因此，在军事上只有速战速决，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同时，还要发动各省的力量共同讨袁，以达到再造共和之目的。最后，蔡锷特别强调纳溪是主战场。他说：“纳溪一旦失利，护国军将全军崩溃。”会议决定，从叙府调一部分兵力前来纳溪参战，于28日发动全面进攻。

朱德回到三支队后，立即集合官兵讲话，鼓励大家振奋斗志，勇敢杀敌。这天夜里，他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一直思索着用什么战术才能打败北洋军，夺取胜利……出奇制胜。

第二天，他召集各营、连的主官，宣布了组织敢死队突袭敌军阵地的计划，并且布置了各营、连的具体战斗任务。

27日的深夜静悄悄，数百名官兵聚集在营地上，等待朱德支队长下达命令。

在这寒夜里，朱德环视着衣衫单薄但精神抖擞的士兵们，高声说道：

“弟兄们，我们为了保卫共和远离家乡来到前线，同北洋军拼死作战。为共和而战，虽死犹荣。生为共和的人，死为共和的鬼。不推翻袁贼，我朱德死不瞑目。不打败北洋军对不起我们的父母兄弟……”

官兵们被朱德慷慨激昂的讲话所感染，振臂高呼：

“生为共和的人，死为共和的鬼！”

“不推翻袁贼，死不瞑目！”

“我们要血战到底！”

朱德这时变得更加严肃，他瞪着两只大眼向士兵们喝道：

“我们现在挑选敢死队，不怕死的，愿意跟着我朱德去冲锋陷阵的，站

出来！”

“哗啦啦”一声，几乎是全部士兵站在他的面前。

“算我一个！”

“算我一个！”

“也算我一个！”

……

报名的呐喊声不断。朱德当场挑选了 80 名敢死队员。

当晚，趁着夜深人静，朱德带着 80 名敢死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敌人阵前的开阔地，无声无息地潜伏起来，单等护国军发起攻击的时刻到来。

拂晓，随着护国军总攻信号的发出，朱德带着敢死队突然跃起插入敌阵，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北洋军面对着突然袭来的护国军，还以为是天兵天将，早已吓得魂飞天外，只顾四处逃窜。敢死队员们个个如猛虎下山，在一片喊杀声中，越战越猛，跃过堑壕，冲向敌群。

后续部队上来了，一杆绣有“朱”字的队旗指向敌阵，敢死队的队员们紧紧跟着掌旗人，接连夺下北洋军的几处阵地。

这一仗，朱德赢得了勇敢善战、忠贞不渝的声誉。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起了：“黄（永社）柜盖、廖（月江）毛瑟，金（汉鼎）朱（德）支队惹不得”的佳话。

然而，失败后的北洋军又重新集结兵力，向护国军阵地反扑过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战事旷日持久，仗越打越艰苦。3 月 3 日，消息传来，护国军左路军被迫放弃叙府。3 月 4 日，蔡锷下令暂时撤出纳溪，退至大河驿一线休整待机。朱德支队奉命担任后卫。

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保卫战，在护国讨袁战争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那时，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省还没有宣布独立。袁世凯的北洋军声势浩大。而纳溪之战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使其死伤三四千人。同时，还为全国的护国运动赢得了两个多月的宝贵时间，促使全国讨袁护国之势风起云涌。

朱德支队在这次战役中，从 2 月 19 日投入战斗到 3 月 7 日撤出，浴血奋战 16 个昼夜，在生死搏斗中，始终坚持在第一线，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发展很快。3 月 15 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立即出兵湖南，并准备向广东进军，对袁世凯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一派护国讨袁的大好形势之下，3 月 27 日，蔡锷决定对泸州发动第二次进攻。

进攻部队分三路：顾品珍梯团为中路；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为左路；金汉鼎、朱德支队和义勇军张煦、廖月江支队为有路，向纳溪推进。而朱德支队在右路中，又担负着主攻任务。因此，蔡锷于 3 月 15 日在大洲驿总司令部召见了朱德，向他说明了作战意图：

“逆军极无攻击精神，所以，我军只需在正面配置少数兵力，而用主力冲击其侧背，敌必然溃逃。千万要告诉各级将领，指挥官的手中一定要多留预备队，便于运用。”

18 日拂晓前，朱德支队开始发起攻击。前方敌军为北洋军第七师吴新田

旅的第二十七、二十八两个团，不仅武器好，战斗力强，而且兵力超过朱德支队的三倍以上。这一带地形复杂，山峦起伏，路窄林密，渠沟水网纵横，易守难攻，前进十分困难。经过五昼夜的激烈战斗，朱德支队连续突破了北洋军的几道防线，直插到距泸州只有十几里的南寿山附近。

作战中，朱德不仅注重战术的运用，同时还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农民们不仅为护国军送粮食，运弹药，抬伤员，还为护国军送情报，甚至直接参加作战。一天，有个牧童跑来找到朱德后，非常神秘地说：

“我知道北洋军的大炮藏在什么地方。我带你们去！”

朱德抚摸着牧童的头，称赞说：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好娃儿！敢冒死来报告敌军炮兵阵地，还要带我们去。要的，长大了也是个好样的。”立即吩咐左右，快去弄点吃的来，吃饱了，好去执行任务。

然后，他同参谋们商量派一支突击队，随牧童迂回到敌后的炮兵阵地附近，隐蔽起来。当护国军进攻开始后，突然出其不意地进攻敌炮兵阵地，夺取后，点火为号。朱德看到敌人后方浓烟滚滚腾空而起，知道定是奇袭成功，立即命令部队发起冲锋。顿时，号角声、喊声、杀声震撼着山野。北洋军腹背受敌，还弄不清后面怎么失火的。这时，又遭到三支队猛烈炮火的袭击，阵脚大乱，北洋军纷纷夺路而逃。

从 17 日到 23 日，一周之内，护国军在绵延百里的战线上，重创了北洋军，毙伤敌人九百多人，缴获大炮 7 门，机枪 9 挺，步枪九百余支，炮弹二百多发，子弹 13 万发。

就在护国军节节取得胜利之际，袁世凯却处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境地。他被迫于 3 月 22 日宣布取消帝制。并密令陈宦、张敬尧同蔡锷谈判停战。经过多次磋商，双方决定于 3 月 31 日起停战 1 周，后又延长为 1 个月，实际上两军的作战活动已经停下来了。

6 月 6 日，袁世凯在忧愤之中一命归天。第二天，黎元洪宣誓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张敬尧一看大势已去，立即率部撤出沪州。朱德的第三支队因作战有功，受到总司令部的嘉奖，获得首先进入沪州的荣誉。

朱德在护国战争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成为远近闻名的滇军名将。正如吴玉章祝贺朱德六十寿辰时所说的“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

护国战争中，力量悬殊的不利形势和艰苦卓绝的拼死战斗，大大磨练了朱德的斗志，提高了他指挥作战的能力。他自己后来曾说：“打大仗，我还是从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遇难昭觉寺

1920 年 5 月，战事频繁的四川又燃起了猛烈的战火，巴山蜀水之间，硝烟迷漫，炮火连天，百姓在啼饥号寒。

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无视入川滇军将领的劝阻，尽力排挤不愿听从他任意摆布的四川督军熊克武，以阻挠“北伐”为借口，发动了‘倒熊’战争。朱德虽然早就提出过“撤回部队（指将滇军撤回云南），还政于民，滇川和解”的正确主张，但不为唐继尧所采纳，身不由己地继续卷入了军阀混战的旋涡。

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朱德愈来愈担心唐继尧出兵北伐的许诺将化为乌有，他接连向滇、黔、川军的将领们发出通电，呼吁三省息兵停战，永远睦谊，尽早出兵北伐，慷慨激昂地陈述着：“誓师江干，秣马关陇，能出者是也，不出者非也；一瞬千金，时不易得，急行者是也，犹豫者非也。”川、滇、黔的一些将领纷纷通电响应，而唐继尧却置若罔闻，仍令顾品珍的第一军、赵又新的第二军继续留在四川，全力作战，完成所谓“靖川”任务。

战争从 5 月开始，滇军由川南出师，到 7 月朱德率第三混成旅进入成都市郊龙泉驿一带。事也凑巧，在成都遇到了他在南溪结识的老朋友孙炳文。他向孙炳文倾诉衷肠和苦闷，想跳出军阀混战的泥沼，去另寻救国之新路。孙炳文说他打算去北京追随“五四运动”的领袖李大钊，朱德说：

“我愿与君同往。”

“舍得你那将军的头衔和荣誉？”孙炳文有意说笑。

“只要再不涂炭生灵，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吃饱穿暖，我情愿丢掉这顶乌纱帽，回家去种田！”当年朱德入云南讲武堂和参加辛亥革命，的确是抱定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不是为了做官，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当上旅长。

朱德与孙炳文经过几天彻夜长谈，最后商定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之前，先到外国去学习，看看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去研究外国的政治和军事。孙炳文先行去北京，朱德待料理完军中事务，即去北京找孙炳文。

风云突变。四川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下，川军各部很快就在四

川督军熊克武的主持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滇军，战火再次燃起。滇军还是那个滇军，但同当年为了护国讨袁入川作战，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士气一落千丈。不仅四川老百姓和川军反对，就像朱德这样的将领也反对。再加上粮饷奇缺，孤立无援，适逢时疫流行，士兵死亡极多；一些将领由于对唐继尧的不满，也无心指挥部队作战。天时、地利、人和均为不利。

7 月上旬，滇、川两军为了争夺成都，在成都东郊龙泉驿展开激战，血战九昼夜，滇军大败。朱德所率的第三混成旅损失惨重，死伤过半，只剩下一个团的兵力，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川军冲破滇军的防线冲入成都。滇军撤退时陷入一片慌乱中，朱德与部队失掉联系，只身冲出重围，来到了昭觉寺。

昭觉寺是成都著名的古刹之一，建于唐朝贞观年间。寺内殿宇建造宏大壮观，有天王殿、先觉堂、圆觉殿、观音阁、藏经楼，大小殿堂数十座，寺内寺外林木葱茏，郁郁苍苍，风景秀丽，有西南“第一丛林”之美称。

绿荫笼罩着的昭觉寺，山门紧闭着，里面一片寂静，只有几个和尚掌着灯笼，提着哨棒在巡夜。

三更过后，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已渐渐稀疏了，巡夜的和尚在窃窃私语，守门的和尚在打盹。

突然间，传来几声“笃！笃！”的扣门声，守门的两个和尚从梦中惊醒，侧耳细听认定是有人敲门后，凑到门缝前一看，是个戴大盖帽的军人，早已魂飞天外，“啊”了一声，谁也没应声，就躲到一边了。敲门人听清了守门和尚的动静，就说：

“师傅，请快开开门！”

守门的和尚根本不搭腔，他们牢记着主持的吩咐：“现时兵荒马乱。不论黑夜还是白天，不开山门，外人一律不准入内。”任凭敲门人怎样央求都无济于事，守门的和尚呆在那里，从不答理。

远处的狗吠声和枪声越来越清晰，看来追兵已经很近，不能再迟疑了。敲门人走下山门的台阶，顺着寺院的高墙来到一棵大树旁，双手抱着树干，两下就窜上了树顶，越墙而过。当他落地还未站稳脚跟，就被几个巡夜的和尚逮住了：

“你是啥子人？可晓得这是佛门之地？”

“晓得，晓得。我是来找你们主持的。山门叫不开，后面又有追兵，不得已才翻墙进来！实在是罪过！”翻墙人毫无反抗，束手就擒。

巡夜的和尚一看是个当兵的，腰里还别着把手枪，必定是个当官的。但他并不反抗，这是为什么？和尚们有些纳闷。

“请师傅们松松手，带我去见主持。我既然进来了，就不会跑的。放心好了！”巡夜的和尚们觉得他说得也在理，就松开了手。

这时，早有和尚通报了主持，说捉住了一个越墙而入要见主持的当兵的，看样子还是个大官。

“只身一人夜闯寺庙，领他进来无妨！”

“那人身上有枪！”

“有枪也不怕，他不会是来暗杀我的。快去带来一问便知。”

在众和尚带领下，穿过几座院落，来到主持住的禅房。

昭觉寺的主持了尘法师，一见来人是位威武的将军，心中陡生疑窦：他是何人？为何深夜到此？其中必有缘故。了尘递了个眼色，众和尚通通退下。这时，了尘双手合十，念道：

“阿弥陀佛！这是佛门之地。施主，深更半夜来此，有何要事？”

来人觉得事到如今，生死攸关，必须实话实说：

“我乃滇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朱德，不幸在龙泉驿战败，逃命到此。后有川军穷追不舍。来到贵寺，久久扣门不开，才出此下策，越墙而入，实为罪过。主持大慈大悲，能救我不死，功德无量，我知恩必报。”朱德抱拳致礼相求。

了尘一听是“朱德”，眼睛一下亮了。没想到原来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威武军人，正是扛着“朱”字旗血战棉花坡的战将朱德。

“阿弥陀佛！贫僧了尘，在此有礼了！能面见朱将军，真是三生有幸！朱将军护国讨袁，威震巴蜀，久仰久仰！只是这佛门之地，不便收留。请将军还是另谋良策为好！”了尘十分为难地拒绝了朱德的请求。

“古人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法师德高望重，昭觉寺广布善事，早已闻名天下。今日相遇，总不会见死不救，何况我只借贵寺暂避一时风险！”

了尘为难了。他望着墙上“普渡众生”的匾额在沉思：如何是好？

突然，有和尚进来禀报：

“师傅，山门外有不少当兵的，在敲门、呐喊，说有人进了庙里，要进来搜查。”

了尘不假思索地说道：

“山门不能开，告诉他们此乃佛门净土，除僧人之外，没有别人。”

朱德凭感觉，了尘主持有意要救自己。

报信的和尚出去后，了尘对朱德说：

“阿弥陀佛，佛祖保祐！事已至此，那就委屈朱将军在寺内暂避一时吧！这昭觉寺是千年古刹，佛门净土。将军千万动不得刀枪！以免惹起祸端！”

“请放心！我朱德一切会听从主持安排！”

了尘把门外的和尚叫进来，吩咐说：

“朱将军到此之事，谁都不得讲出去！佛祖有眼，阿弥陀佛！”

然后，了尘领着朱德来到八仙堂隐藏起来，还再三叮咛说：

“朱将军放心，有了尘在，有昭觉寺在，将军一定平安无事！”

“法师大恩大德，朱德没齿不忘！”

了尘安顿完朱德藏身之事，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前院的天王殿时，川军已破门而入，一拥而上。了尘率众和尚端立在大殿前，一字排开，密密匝匝足有四五层，个个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个当官模样的小头目，手里提着二把盒子枪，嚷嚷道：

“听着，你们这些秃和尚，给老子闪开！要晓得：你会念经，它可不会念经，只会吐子弹，要惹恼了它，这家伙可亲娘老子都不认，还管你啥子秃和尚！”边说边把两支手枪在了尘眼前挥舞着。

“老子是川军，为四川人卖命！专抓吃人肉喝人血的云南蛮子。有一个当官的领着几个蛮子，被我们追到这里不见了。秃和尚，你们说这前不着村，后不挨店，只有你这座破庙，他们能跑到哪里去？闪开，给老子搜，那个不识相，就先敲掉他的脑壳！”

“阿弥陀佛！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从不杀生，人世间的互相杀戮，与我佛门弟子毫不相干……”了尘像讲经布道一样向拥进来的川军解释着。

“搜！少听他放屁！不能放过每一间屋子。老子不信，他能上天，还能入地，活见鬼了！”

闯入昭觉寺的几十名川军，一下冲进了天王殿、先觉堂、圆觉殿、观音阁、涅槃堂，就连禅房和后面的藏经楼也不放过，但仍不见人影。

那个提着手枪的小头目，砸开八仙堂的大门后，只听得里面“咣啷”一声，一下惊呆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你在这里藏着，可让老子好找。他急忙后退一步，拉动枪拴为自己壮了壮胆，喊道：

“龟儿子，给老子乖乖爬出来，就饶了你的小命。要是想耍啥子名堂，老子就敲掉你的脑壳，让你去见阎王！”小头目又朝着那帮子当兵的喝道：

“打着火把，快去点灯！”

说的轻巧，谁也不敢进去。在小头目的再三逼迫下，八仙堂里的灯点着了，可谁也不敢进去搜查，一怕真碰上追捕的滇军，自己在明处，他在暗处，那还不是一枪一个去送死；二怕得罪了菩萨，惹来三灾六难，谁家没个老小，自己受罪不说，还得连累家人。人常说：常烧香，多磕头，积德行善。啥子鬼迷心窍，钻到庙里来瞎胡闹，这不是招灾惹祸！当兵的你瞧瞧我，我瞧瞧

你，那个也不先把腿伸进去。小头目急了，骂了一声“一群胆小鬼”后，自己壮着胆，猫着腰跨进了八仙堂。喊道：

“龟儿子，莫耍花子了。你藏在那里，我早看到了。是你自己爬出来呢，还是叫老子去把你揪出来？你说！”

这一切，朱德听得清清楚楚。这家伙还是有点鬼花样，想用这种欺诈的伎俩达到目的，不觉可笑。

几分钟短暂的寂静后，小头目不耐烦了，大吼一声：

“再不出来，老子就开枪了！”震得八仙堂都在颤动。

小头目一脚踢翻了香案，抬头两眼死盯着天花板的藻井。突然，大喝道：

“龟儿子，你跑不了啦！”双手扣动扳机：“啪！啪！”就是两枪。随着枪声，在天花板掉下来的同时，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灰尘布满八仙堂，灯也熄灭了。等再打起火把看时，地上躺着一只血肉模糊的大白猫。原来在八仙堂搞小动作，捉弄这帮川军的就是这只专偷供果吃的大白猫。

八仙堂里的枪声惊动了整个昭觉寺，了尘主持也惊呆了，以为出了大事，便急忙赶来。当他看到这般情景，才算放心：

“阿弥陀佛！戒杀生，是我佛门之规。这可如何是好！”

一个当兵的凑到小头目耳边，低声说：

“大哥！这庙是佛爷住的地方，不比平常百姓家里。得罪了佛爷，怪罪下来可了不得，犯不着，还是撤了吧！”

小头目定睛看看八仙堂里的各位神仙，个个都不再是面带笑容，而是怒目圆睁。他眨了眨眼睛，再仔细瞧时，更觉得在瞪着自己，就差走下神坛同他拼个死活了。他真有点害怕了，要是神仙显灵降灾于他如何了得。

“走！去别处看看！”小头目一招手，都涌向另一座佛堂。

这帮川军破门砸锁，一直折腾到大天光，一无所获，才作鸟兽散，离开了昭觉寺。

朱德摆脱了川军的追捕和搜查后，就在昭觉寺里暂住下来，在暮鼓晨钟中听和尚诵经，在夏夜纳凉时和了尘方丈谈古论今。

一天，朱德和了尘在树荫下对弈。朱德试探着对了尘说：

“了尘法师，这法号起得太妙了！”

“是出家时，我师傅给起的。”

“了尘，了尘，了却了尘缘，寓意深刻。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看破红尘吧！”

“有这层含义。出家人，最主要的是要断了与尘世的恩恩怨怨，一心修行诵经。师傅的用意就在此。”

“年轻的时候读《红楼梦》，一开头就有一首《好了歌》，讲的也像是‘了尘’的意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今还能记得！”说着，朱德就背起了《好了歌》：

“世上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上都说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朱将军真是位儒将，实在让人敬佩……这几天，我一直想着一件事，三思不得其解，不知问得问不得？”

“问得，问得，有啥子尽管问就是了。”

“将军智谋超群、勇敢过人，又能征善战，北洋军都能打败，为何败给

川军，落到这种地步？”

“咳！”朱德长叹一声，说：

“摆起来，话就长了。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是为战争的性质所决定。护国讨袁，得到了人民和官兵的拥护。这次打仗，是为唐继尧图川，遭到川人的反对，同样也遭到滇军官兵反对，官兵厌战，瘟疫流行，又无援军和补充。哪能不失败！成也滇军，败也滇军。从失败中，我看清了军阀混战的结果，所以下定决心，不再为他们卖命，已与朋友相约，打算出国去学习新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听了将军的一番高论，让贫僧肃然起敬，茅塞顿开。将军是国家栋梁之材，定能为民族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朱德在昭觉寺住了月余，等外面一切平静之后，才踏上归途，去川南追赶部队。

临别时，了尘主持与众和尚直送到山门外。了尘合十诵道：

“阿弥陀佛，祝好人一路平安，万事如意！”

朱德依依不舍地说：

“各位师傅请回吧！我忘不了昭觉寺，有机会一定回来拜见各位，感谢救命之恩！”

朱德回到云南后，就拜托他的朋友周官和到成都，用上等捕木为昭觉寺特制了一块长丈余，高五尺的大匾。匾的正中是选自佛经渴语中的“应世人间”四个大字，每字足有二尺见方，专请当时成都著名的书法家颜楷书写。落款为“下民朱德周官和立”。周官和专程送到昭觉寺时，了尘主持和众僧人一齐出动，诵经迎接。

了尘把朱德所赠的匾额视为珍品，悬挂在观音阁的门额上，使昭觉寺平添了许多光彩，前来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无不争相观看。朱德避难昭觉寺的佳话，一传十、十传百，直传到今天。

时光的车轮，飞速前进，沧海桑田，换了人间。转眼之间到了 1957 年。

已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朱德，于这一年的二、三月间，去湖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陕西等省考察时，2 月 25 日抵达四川成都。这是他三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到成都。那天夜里，他辗转反侧睡不着，失眠了。算起来，他阔别仪陇已经 47 年，多么想念那里的父老乡亲，可是没有时间回去看看。但是，再忙也得抽时间到昭觉寺去，面谢当年的救命之恩，以了却几十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的心愿。

朱德轻车简从来到昭觉寺。昭觉寺里满院生辉，大小和尚都出来迎接观看，个个合十诵经，寺内钟鼓齐鸣。

朱德问道了尘法师时，僧人们告诉他了尘早已圆寂，离开人世。他无限感慨地说：

“遗憾呀！临了，也没有见到他。了尘法师是位德行很高，佛学很深的大法师。人们会永远记住他的！”朱德十分悲痛地脱帽致哀，众僧人和随行人员都为之感动。

朱德久久仔立在观音阁前，望着自己三十多年前赠送的那块“应世人间”的大匾在沉思。他想起了龙泉驿的炮声，想起了昭觉寺里的暮鼓晨钟，想起了惨死在八仙堂的那只白猫，想起了了尘方丈的不了深情。

亡命天涯

斗转星移，风云突变。滇军已渐渐失去昨日的辉煌。

1920 年 10 月，各路川军为了驱逐滇军出川，齐集川南，向滇军发起猛烈攻击，正在危急时刻，滇军第二军赵又新部的参谋长杨森突然反水，投向川军。赵又新在泸州突围时，又被杨森的部下击毙，形势急转直下，滇军一再败退，最后不得不放弃川南，退入贵州。唐继尧企图依仗滇军实力控制四川的美梦完全破灭。

朱德率部退回云南后，开始驻扎在滇北的昭通。不久，顾品珍等积极策划“倒唐”，朱德表示赞同，原来留在云南的滇军将领叶荃、邓泰中等也表示反戈倒唐。1921 年 2 月 6 日，朱德等将领联名致电唐继尧：“为大局计，为西南计，为吾滇计，为公自身计，实有不能不请我公暂避贤路”。逼迫唐继尧离开云南。唐继尧一看大势所去，立即于 2 月 7 日离开昆明，不久即去了香港。2 月 8 日，朱德率部进入昆明。

倒唐的目的实现后，朱德即向滇军总司令顾品珍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军职，离开云南，另谋出路。但在众多朋友和同事的再三挽留下，他答应暂时留在昆明，为新政权的建设尽一点绵薄之力。他被任命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不久，又兼任云南省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及复查锡务公司帐项委员长。他忠于职守，严格要求，彻底清理了官僚和奸商拖欠铁路局的欠款，惩治了贪官污吏，为新政权的建立在努力工作。然而，云南的现实越来越使他失望，对所谓的新政权能否挽回战乱连年带来的损失，能否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他产生了怀疑，失去了信心。尤其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心胸狭窄的顾品珍，在一旦掌权之后，容不得别人对他有丝毫不恭，非常专横，连学生们利用暑假演出宣传新思潮的活动，都被严加禁止。这就使他下决心要离开云南。

1922 年 3 月，云南的政局出现了再次动荡。孙中山先生命令滇军出兵讨伐北洋军阀，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将滇军调往宜良集中准备出发，云南边境一带出现空虚。而一直图谋称霸西南的“云南小皇帝”唐继尧认为时机已到，秘密潜回云南，纠集旧部并收买了吴学显、莫卜等土匪武装，从蒙自发兵向昆明进攻。顾品珍率部仓促应战，由于判断失误，战略上处于被动，在小河口竹园战役中，被土匪武装吴学显所属之黄诚伯部偷袭时击毙。顾部的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率其主力一部败退广西。此时，流言四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败局已无法挽回。宁静的昆明城已乱作一团，人心惶惶，纷纷出逃。

唐继尧一回到昆明，就下令四处搜捕忠于孙中山拥护北伐的原滇军将领。3 月 27 日，对朱德发出通缉令，一定要捉拿朱德，以报他被驱逐出云南的一箭之仇。滇军的代理总司令金汉鼎从未见过这种惨败的局面，一筹莫展。他找到朱德商量如何是好？朱德再三为他打气：“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他们共同商定，先离开云南退到缅甸，再从长计议。

星夜，朱德和金汉鼎、刘云峰、唐淮源等带着一连人马打算经楚雄、大理出境去缅甸。他们刚到安宁休息，没料想到罗佩金四十多人的卫队和二十多匹驮马也赶到了。患难之中故旧相见，格外高兴。

突然，传来了驻楚雄的滇军司令华封歌倒向唐继尧的消息。这无疑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朱德说：

“去缅甸是不可能了。看来只能北上了。这也是逼上梁山。”

罗佩金还是满怀信心地劝说大家：

“华封歌是我的老部下，我最了解他，还是很重友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会放大家一马，让出条路来，叫大家过去的。”

朱德看人看事总是清澈透亮，入木三分。他说：

“华封歌可是个见钱眼开的人。他的友情和良心，早在银元的叮　声中消失了。他会把最后一个老朋友出卖给唐继尧，来换取高官厚禄。我们绝不能相信这种有奶便是娘的龟儿子，应该立即调头北上，渡过金沙江，沿着旧的马道穿过西康，到四川后就可顺江而下，去上海转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

罗佩金却认为北上是死路一条，坚决反对。他说：

“往北去，谈何容易。一路险山恶水，盗匪出没，凶多吉少。再说，就是能到了四川，那也是去送死，现在四川掌权的新军阀，是同滇军不共戴天的刘湘和杨森，不会放过我们。”

各说各的理，意见难统一。朱德最后非常感慨地说：

“人各有志。事到如今，只好分道扬镳了，但愿我们后会有期，能在云南这块土地再次相见！”

罗佩金带着他的卫队直奔楚雄，朱德等一行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当罗佩金到达楚雄时，华封歌知道了朱德和金汉鼎等北上的路线。他为了向唐继尧求功邀赏，立即派出一营骑兵穷追不舍，并张贴榜文重金悬赏捉拿朱德、金汉鼎等人。

一场逃亡和追捕在滇北的崇山峻岭中进行着。这里山势险要，森林密布，只有一条蜿蜒崎岖的古老的马帮贩运的山间小道，隐没在丛林和杂草中。逃亡者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只盼早日甩掉敌人，进入安全地带；追捕者马不停蹄，星夜赶路，一心只想捉到朱德等人好去领赏。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忘了所追捕的是滇军赫赫有名的一批高级将领，特别是朱德有着在云南边界跋山涉水、穿越丛林的丰富经验。几天了，他们连个人影也没有见到。

朱德、金汉鼎一行从大姚进入彝民区后，更是人生地不熟，困难重重。一天，他们冒雨赶到盐丰的桃花山。深夜，突然遭到普小洪土匪武装的袭击。土匪凭着人多势众、地形熟悉，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一个连队在朱德的指挥下，经过顽强战斗，虽然打退了敌人，但人马损失过半，等到天明清点时，只剩下朱德、金汉鼎、刘云峰、唐淮源、谭兆福和副官周澎、汤王清等十余军官和卫队的几十名士兵。

为了安全起见，朱德在每次出发之前，都先派出一个小分队，由刘云峰带领，提前先行，边探路边侦察，以防不测。在抵达金沙江边的前一天，刘云峰在前面中了埋伏，被桃花山上的土匪绑架而去，生死不明。当朱德在后面隐隐约约听到有枪声，飞兵赶到时，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朱德一行穿林海，攀悬崖，沿着山间马道，终于来到金沙江边的渡口。

这里两岸的大山如同刀砍斧劈一般，陡峭壁立，莽莽苍苍的林木遮天蔽日，金沙江活像一群被激怒的狮子咆哮着，在山涧里狂奔不停，白浪滔滔，涛声轰鸣。朱德牵着他那匹大黑马，站在江边，不见一只渡船，看不到一个人影。他仰望南天，翻滚的白云不停地变换着形状，飘向远方。他思绪万千，长叹一声后，自言自语地说：

“难道真是苍天无眼，人间无情。我们就没得法子渡过江去，非死在这

里不成？我朱德自信现在还没有到去见阎王的时候。”

眼前的现实是需要一只船，一只救命的船，哪怕是一只小船，就可以把一位将对中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领袖人物渡到彼岸。朱德的双手放在嘴边作成喇叭状，面对着滔滔不停的金沙江呼喊着：

“有船吗？过江了！”

“船老板，过江了！”

回声在山间回荡着。

朱德、金汉鼎、唐淮源这些滇军中的青年将领，当年在蔡锷将军的麾下，都曾指挥过千军万马，是身经百战的名将，有多少堡垒被他们攻破，有多少敌人被他们征服，谁也说不清。然而，今天他们像是到了天尽头，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此时，朱德瞪着双眼巡视着金沙江两岸，就像一把梳子，把滩头、江湾、江汉的犄角旮旯梳了一遍，来见船只的踪影。当他的眼神扫视到江对岸时，立即露出惊喜的神色：

“船，那边有一只船！”但他又有些怀疑似的，用手揉了揉眼睛仔细再瞧时，的的确确是一只船。这一奇迹的出现，使朱德极为兴奋，他高声喊道：

“有船了，快来看，有一个人从山上走下来上船了！”

“有希望了，他向我们划来！”

顿时，朱德一行像列队一样齐刷刷地一字摆开，站在江边向对岸招手、欢呼：

“船老板，过江了！”

“船老板，过江了！”

欢呼声在山谷中回荡着，经久不息。

小船乘风破浪，顺江而下。不久，就靠岸了。朱德迎上前去，同船老板寒暄一番，希望能尽快把他们渡过江去，必有重谢。船老板仗义豪爽，一听说他们是当年护国讨袁的滇军，站在面前同他讲话的正是血战纳溪棉花坡的朱德，更是倍加亲切，他非常激动地说：

“我在对岸观察多时，觉得你们不像土匪强盗，也不是坏人，看来定有急事要渡过江去。这不，我才冒死来了，没想见到贵人喽！”

船老板名叫曾海若，是云南丽江永兴湾碧人，一直在江上摆渡谋生。前些日子听说唐继尧杀回昆明，到处悬赏捕杀原护国军将领，出的价码都吓死人，高的十几万，低的也是几万，说定都给白花花的钢洋。船老板气愤地对朋友说：

“唐继尧这个老贼，心都黑透了。他为了独霸云南，已经六亲不认了，花钱买入头的事，迟早是要遭报应的。我们再穷，也不去干那种丧尽天良的事。要是我遇到他要杀的人，一定摆过江去，让他们逃命！”

没想到在金沙江边，他真的遇到了唐继尧悬赏捕捉的朱德和金汉鼎等。他认为正是天公的巧安排，也是对他的良心的考验。他把胸脯一拍，对朱德说：

“请放心，有我曾海若在，就有你们在。前面别说是金沙江，就是火海，我也要把各位老总摆过去！”

此时，乌云翻滚，眼看就要变天。在江边更不能久留，便决定先摆一趟过江，留下的人等待去找船的人回来一块过江。

朱德、金汉鼎、唐淮源等带着几个贴身警卫，拉着战马，登上小船，直驶对岸。真是吉人天相，江上风向突然变换，吹起一阵东南风，船老板喜笑

着说：

“各位老总，你们的好福份，借来了东风，一路顺风，平安过江了！”

只见船老板借着风势，挥舞船桨，划向江心。小船被托上浪峰，转瞬间又滑向波谷，一高一低在波谷浪尖上颠簸，翻滚的巨浪劈头盖脑地泼向船中，朱德一行个个都被浇的透湿，像似刚从江里捞出来一样。涛声哗哗，风声呼呼，演奏起悲泣雄壮的乐章，是送别曲，还是壮行歌，他们个个自有感受。面对此情此景，每个人的思绪如同奔腾翻滚、呼啸而下的金沙江。

斗转星移，时势变化，一言难尽。这些滇军名将，把他们显赫的头衔：总司令、参谋长、军长、旅长等等，连同滇军昔日的辉煌统统抛到了金沙江中。如今，成了败军之将，落荒而逃。这都是为什么？路又在何方？

过江后，朱德对船老板说：

“曾老板冒死摆渡，才使我们脱离险境，本该重金酬谢，只因我们是仓皇出走，没有贵重之物。相信后会有期，你的救难之情，救命之恩来日相报。留下这一百钢洋，给你买点酒，暖暖身子，驱散风寒吧！”

船老板坚持不收。他说：

“要是为了钱，我曾海若就不摆老总们过江来了！再说，你们出门在外，这江湖上用钱的地方多了，还是留下吧！我只求朱旅长题几个字留作纪念。”

朱德满口答应，找来一张红纸，不假思索地挥毫写就四个苍劲的大字“侠义可嘉”，然后，在落款的地方写上：“朱德题赠”。曾老板如获至宝，高兴地说：

“这比什么都金贵，我一定好好保存起来！”

朱德一行拱手告别了曾海若老板，踏上新的征程。

就在这时，他们得到了罗佩金被杀害的消息。原来罗佩金不听朱德的劝阻，轻信华封歌不会亏待他这位原来的顶头上司，但他一到楚雄就被华封歌解除武装。罗佩金被捕后，设法逃往华坪，唐继尧指示当地土匪跟踪追捕，在直却的双金坡把他处死了。

金汉鼎非常悲痛地说：

“罗公过于自信，不该不听玉阶兄的再三忠告，遭此非命！”

朱德也极为惋惜地说：

“他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上级，彼此都很了解。他为人耿直，但过于自信。到了这个时候，还同华封歌讲啥子友情？完全是自投罗网，拉都拉不住呀！可惜滇军又少了一位名将！国家少了一位忠良！”

他们在大水井伍祥贞家借宿一夜，天微明，就由伍祥贞的弟弟带路赶往盐边。上路不久，突然飞来一队人马，全是彝人装扮，拖枪挎刀，扬鞭跃马而来，还未等他们弄清是哪路人马时，已将他们团团围住，枪口直对着朱德等人，只要一扣动扳机，准有人得去见阎王。小头目瞪着一双大眼，操着带有浓重口音的四川话喊道：

“给老子都放下家伙，举起双手！！哪个反抗，就先敲掉他的脑壳。”其余的喽罗们也跟着嚷嚷起来：

“放下家伙！”

朱德心想就你们这几条枪，哪是对手！枪一响，保准个个都上西天了。但不能作这无谓的牺牲，常言道“虎落平原被犬欺”，“走到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他强压心头怒火，说道：

“来将不通姓名，就要收枪，未免有点不尽情理了。弟兄们都是闯荡江

湖的人，我先把话说在明处，如何处置？那就听从尊便了。”讲到这个份上，他觉得滇军这块破烂招牌还得打起来，也许可以抵挡一阵子。他用拇指往后一指，接着说：

“这位是滇军代总司令金汉鼎将军,那位是唐淮源将军,敝人是朱德……

小头目本来就觉得同自己说话的人威严庄重，不卑不亢，毫无惧怕的表情，绝不是等闲之辈，而讲的又是地地道道的川音，正在纳闷，一听说是让北洋军闻风丧胆的朱德，一下就慌了神，立即翻身下马，连忙施礼，说：

“不知是各位将军到此，失礼之处还望海涵！”

“我们是边防军的巡逻队，各位老总有何吩咐？”

朱德一听是四川边防军，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他预感到一场厮杀将会避免，可以平安抵达会理了，便说：

“有紧急军情途经此地，望能借贵方一条便道前往。我等绝不会在此停留打扰。”

小头目犹豫片刻，回答说：

“此事实难作主，望能派一代表前去同我大哥雷云飞商量，各位可在这里休息两天，等候回话。”

朱德同金汉鼎等商量之后，派出一位副官去同雷云飞谈判。

雷云飞，号星如，四川盐边（今四川渡口市盐边）人，原来是个贫苦的农家子弟，自幼上过几年私塾，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但他酷爱中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一些武侠小说，对他影响极深。他崇尚忠义，辛亥革命前就参加袍哥（哥老会），从事反对清王朝的活动。辛亥革命爆发，他在川南一带拉起一支农民武装，最多时有五千人马，不仅有汉族还有彝族，在川、康、滇三省交界的金沙江畔，占山为王，其势力范围五六百里，控制了南起金沙江北到会理、盐边的整个川南地区，俨然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他打富济贫，专同官府作对，不论云南、四川的旧军阀还是新军阀，都拿他没有法子，说他是“大土匪”、“山大王”。后来，四川的新军阀只好把他收编为四川边防军。大小也算给了个“司令”当当。

两天后，朱德一行正在焦急等待消息的时候，突然有一支马队从北面挥鞭呼啸而来，等到可以看清来人面目时，朱德一眼就认出里面有派去的副官等人，看来交涉还算顺利。待马队来到面前时，就有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翻身下马，向朱德等人行了一个军礼，说：

“雷云飞特来迎接各位将军！”接着拉开架势用“袍哥”跪江湖闯码头时，见面对试的办法，施礼后打着手势，用“袍哥”的黑话向朱德盘问“海底”。

朱德早听说雷云飞是条独具义胆豪情的好汉，早年参加了袍哥（哥老会），还是位“龙头大爷”。朱德自己在辛亥革命前，也曾秘密参加了“哥老会”，“哥老会”里通行的这一套礼节、规矩、手势和黑话，虽有多年不用，但仍谙熟在胸，一旦做起来是个地地道道的“袍哥”。他对雷云飞的盘底对答如流，应付自如，一问一答，高潮迭起。在一旁的金汉鼎、唐淮源还有雷云飞手下的大小头目，个个目瞪口呆，惊奇赞叹。

最后，雷云飞倍感亲切，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地对朱德说：

“久闻大名未曾相识，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今日相见，算我雷云飞三生有幸！”

朱德说：

“常言道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弟兄们在患难中萍水相逢，既然是一家人，也就免礼了！”上前拉起雷云飞。

雷云飞把朱德一行接到乌拉山双龙村的山寨，按“袍哥”的规矩和当地的风俗举行了庆典。杀猪宰羊，大摆宴席，三百人出来作陪，好大的场面和气派。朱德与雷云飞同饮了结盟的鸡血酒，发誓“患难相顾，富贵同享，永世不忘”。朱德将刻有自己名字的一支德国造的勃朗宁手枪取下，连同八支长枪赠予雷云飞，作为见面礼；雷云飞拿出三百钢洋和一些礼物回赠答谢。雷云飞穿行席间，频频举杯向客人祝酒。最后，他恳求朱德留下，为他出谋划策，以图共同发展。朱德再三说明他们遭到唐继尧的攻击和追捕，准备北伐的滇军已经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一则要去南方向孙中山先生复命，再则他本人觉得国民革命已经无望，决心出国学习，寻求救国的良方，另辟新路。

他们在山寨上休整了十天，等待扮作商人的便装做好后，朱德将六十名卫队和六十多支长枪、短枪和他心爱的座骑大黑马留给了雷云飞，嘱咐说：

“这些人马留下给你。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都要用到正道上！”

朱德骑着雷云飞的“八百红”小矮马，唐淮源骑着大骡子，金汉鼎坐着凉轿，带着几个护卫，一律是商人穿戴。雷云飞挑选了六名枪法极好、勇猛过人的壮士与他一同护送到会理。然后，朱德折转北上，经西昌过小相岭，渡大渡河，再翻越白雪皑皑的大相岭，一路艰险尽在不言中，又经越西、雅安、乐山、叙府，于5月中旬才抵达南溪家中。

这次极为悲惨的逃亡，在朱德的生命旅途中是一次根本性的转折。他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亡命天涯，也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眼前的现实和滇军的经历教育了他，使他逐渐懂得了在军阀混战、穷兵黩式的旋涡里，根本无法实现他当年投笔从戎、强兵救国的美好愿望，只能力军阀们卖命当炮灰。他已下定决心同新旧军阀决裂。他说：

“我是借着唐继尧的毒手，把同封建势力的关系彻底斩断了。”

他从黑暗中冲杀出来，去寻找一条光明大道。不久，他告别巴山蜀水和父老乡亲，顺江而下，去找共产党。

辗转找党

一路艰辛，经雅安、乐山、叙府（今宜宾），朱德回到南溪家里，与亲人团聚。他向亲朋好友倾述了劫后余生，打算走出已山蜀水，顺江而下，经上海转往北京，找孙炳文，去圆他那个新的强国之梦。

大家听到他的这个决定，都大惑不解，唯独他的妻子陈玉珍支持他，说：

“你的决定是对的，就放心地去吧！我等你回来！”

没料想到，几天之后突然接到杨森的电报，约他去重庆叙旧。他虽猜不透杨森的用心，但考虑再三觉得重庆是非去不可。一则出川必经重庆，不见杨森，难以通行；再则有请不去，定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他同金汉鼎商量之后，决定立即动身，应邀赴会。

5 月下旬，朱德同金汉鼎乘船沿嘉陵江而下，来到重庆，受到杨森的热情欢迎和款待。

杨森是四川广安人，当年广安与仪陇同属顺庆府管辖，是朱德的同乡。他早年曾就读于顺庆府中学堂，又是朱德的同学。他 1913 年离开川军投奔了滇军，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过队长，护国战争时，随赵又新人川，任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曾与朱德并肩战斗在川南一带。1920 年，川军和滇军大战，他率部反水，转身又投靠了川军。他与朱德是同乡、同学、同事，交情很深。当年，他在滇军里豪赌，输光了军饷，在万分焦急，走投无路时，得到了朱德的资助，才度过了难关。他对朱德的人品和才华十分钦佩。

可是，这时的杨森，远非当年。他刚刚接任了刘湘的川军第二军军长，并兼任着重庆警备司令，踌躇满志，正想争雄于四川，实现其独霸全川的野心。所以，对朱德和金汉鼎的到来，喜出望外，格外高兴。他深深懂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以为只要有朱、金二将相助，定能成其大业。主意已定，便向朱德发出邀请。

朱德和金汉鼎一到重庆，他便施出浑身解数，进行拉拢。陪着他们去看赛龙舟、游览名胜古迹，每天都是美味佳肴，待如上宾，酒后茶余，就摆起龙门阵，追忆往事。他们谈到了家乡顺庆府，谈到了顺庆府的中学堂，谈到了云南讲武堂，还谈到了纳溪战。杨森为了套近呼，还乘兴吟诵了朱德的一首七言诗：

重光祖国供余晖，

万众同心用力微。
毳幕腥膻终寂寞，
汉家子弟尽雄飞。
喜当年富兼身壮，
时正秋高又马肥。
戎马少年半同学，
倾心为国志无违。

杨森想用乡亲、友情这个带子，把朱德拉得更靠近自己。

龙门阵摆得海阔天空。这一天，杨森终于谈到了正题，他说：

“玉阶兄，四川需要你，川军也需要你呀！衷心地希望你能留在家乡，

助我一臂之力，把川军整饬得像滇军那样，成为一支不垮杆子的队伍。眼下，可先在第二军里弄个师长当当，将来队伍发展了，弄个军长、司令的当当，凭你的干才，绝不成问题！”

决心不再与军阀为伍的朱德，婉言谢绝了杨森的盛情厚谊。说：

“子惠兄，实话实说吧！我已厌倦了军旅生涯。十年戎马，出生入死，是为了支持革命。可是，革命却不知哪里去了！失望呀！一腔热血为国家，到头来革命也夭折了，痛心呀！所以，我准备出国去留学，去看看人家的革命是怎么个搞法。”

杨森一听朱德想去留学，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

“玉阶兄真是奇人一个。我若没记错的话，仁兄今年已三十有六了，还漂洋过海，像娃儿学话那个样子，跟着洋人呀呀学语，不太累了嘛！我真弄不明白，你到底图个啥子哟！”

杨森虽再三挽留，也无济干事，最后只好不无惋借地说：

“玉阶兄，学成归来，望能重返故里。我这里是虚席以待！”

江轮缓缓驶出朝天门码头，顺江而下。朱德站在甲板上，挥手告别了送行的亲朋好友，告别了故乡的山水，出三峡，过汉口，经九江、南京，一路顺风，抵达上海。

上海，对朱德说来非常陌生，他只是在照片和年画上看到过，什么样子并不清楚。他想象中的大上海一定是一座美丽文明的城市。然而，当他第一天进入上海时，给他的印象却是丑恶的落后的。

他在肇家滨路一个同盟会的朋友家里住下，花了几天时间观光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商业区到工业区，从租界地到棚户区。他亲眼看到了在黄浦江上横行无忌的是帝国主义的军舰和挂满万国旗子的商船；他亲眼看到了外滩上矗立的是高大的楼群，在棚户区里连成一片的却是贫民窟；他还亲眼看到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走在中国土地上；还亲眼看到“红头阿三”（英国人雇佣的印度巡捕）在祖界里欺压中国人民。而使他最痛心的是在外滩公园门口看到挂着“中国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下激怒了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气愤地说：

“上海，是哪个的天下？少数人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多数人昼夜奔波，忍饥挨饿。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上海已经不是中国人的上海，的的确确是个冒险家的乐园！”

7 月初，骄阳似火。

朱德匆匆离开上海，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在这个盛夏之季，大江南北和黄河两岸，本应都是收获的季节，然而他透过车窗看到的却是一片凄凉景象。连年内战，满目疮痍，田园荒芜，人烟稀少。面对此情此景，他忧心如焚，整个中国的劳苦大众都在受难呀！

朱德走出前门火车站，雇了一辆人力车，就到宣武门外的方壶斋胡同去找孙炳文。

两人见面格外高兴，孙炳文对朱德如约而至尤为欣赏，说：

“玉阶兄，一路辛苦了！料定你是会来的，只是没有想到你来的这么快呀！为啥子这么突然，连个电报也没打，好去车站接你哟！”

“多谢了！我朱德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与你相约出洋，是我梦寐以求的事。这次能迅速成行，还得感谢唐继尧了。我是借着他的黑手斩断了同旧势力的联系。”

孙炳文把自己的妻子任锐和连襟黄志烜介绍给朱德认识。

朱德住下后，详细地向孙炳文介绍了唐继尧趁滇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出师北伐之际，又杀回云南，顾品珍战死，罗佩金出逃，他和金汉鼎等一批滇军将领被追捕、抄家和通缉的情况。他极为愤慨地说：

“是唐继尧逼着我亡命天涯，去另谋生路的。”

第二天，朱德在孙炳文、黄志烜的陪同下，游览了古都北京。古老的北京紫禁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已失去了昨日的辉煌，显得破败不堪，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已暗淡无光，到处是野草丛生，更加衬托出今日的凄凉。孙炳文告诉朱德，如今里面仍住着清朝的宣统皇帝。

北京街头仍旧弥漫着浓厚的封建气味，到处都可看到旧的王公大臣，国会里豢养着一批新官僚，其实都是“猪仔国会”的老人物。每逢初一、十五，头戴顶子、身穿长袍马褂的人还乘着轿子去“上朝”，那些遗老遗少们照样拎着鸟笼、摇着扇子，招摇过市，见面之后还是弯腰、打躬、下跪，搞请安、问候的繁琐礼节。昔日的威风虽已丧失殆尽，但仍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臭架子。北洋军阀的达官贵人，整天在吃喝嫖赌中过日子。

孙炳文问朱德对北京的印象时，朱德说：

“北京就像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封建主义的味道特别浓厚。旧官僚、军阀正在这里玩弄权术，把中国待价而沽。”

孙炳文又问他：

“与上海有什么不同？”

“北京和上海之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封建的没落的腐朽的，一个是殖民地式的丑陋的罪恶的。”他心情十分沉痛地说：

“中国破烂不堪了！”

几天之后，在黄志烜的邀请之下，孙炳文陪同朱德乘北去的火车到宣化、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一带旅行。

车过居庸关后，他看到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人”字形铁路，解决了火车在崇山峻岭中爬坡的难题，使中国人在建筑铁路的历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他说：

“这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值得自豪！”

当他换乘汽车来到鸡鸣山煤矿时，在井下却看到矿工们的繁重劳动，在昏暗的灯光下，满面黝黑的采煤工，浑身沾满煤屑，佝偻着身子把煤一篓篓背出矿井。矿工们如同他在川南看到的盐工和个旧看到的锡矿工一样，干着牛马不如的重活，而终日不得温饱。说：

“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离开鸡鸣山，朱德与孙炳文继续北上，先后到了归绥和大同。他们凭吊了古战场，参观了王昭君墓和大同石窟。雄伟壮观的长城、星罗棋布的烽火台，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和广袤无垠的大漠荒原，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路上，孙炳文向朱德谈起了铁路、煤矿工人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地闹起工潮。工潮的声势越大，军阀和外国资本家就越恐慌。孙炳文还告诉朱德他的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一个新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文无产阶级专政，朱德越听越感兴趣。他说：

“这是个好党，一定要找到。我也想加入，你能介绍我和李大钊见面

吗？”

“很不巧，李大钊正好离开北京去南方了。据说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正在上海。此人我也认识，我们找陈独秀去！”孙炳文说。

朱德非常赞同：

“这个主意要得！我们马上动身去上海找陈独秀去！”

8 月中旬，朱德与孙炳文顶着似火的骄阳，迎着炙人的热浪来到上海。恰巧这时金汉鼎也到了上海，他对朱德说：

“有个最新消息，中山先生最近从广州来到上海，听说我们在这里，他很想见一见，你看如何？”

“当然要见。中山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革命领袖，一定要去晋见。你约个时间吧！”

孙中山比朱德大二十岁，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驱。所以，辛亥革命前，他就秘密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这次来上海，是因为 6 月间他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8 月间，他被迫离开广东经香港来到上海。目前，他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中，正谋划着如何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府。

这天，朱德、金汉鼎等在上海莫利爱路 29 号（今香山路 7 号）的一幢寓所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来客。各人自报家门后，孙中山先生同他们一一握手。他握着朱德的手说：

“你就是蔡锷麾下的勇将朱德！早已闻名。你们都是讨袁护国的有功之臣！”

朱德答道：

“作为革命军人，理应忠于职守，讨平国贼！”

孙中山接着向朱德、金汉鼎、孙炳文等讲述了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的经过。他说：

“这是我在革命道路上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三十多年来，我虽屡遭失败，但从没有这样惨，这样使我痛心！过去失败，毕竟是败在敌手之中，而这次却败于自己长期信赖的人的手中，教训沉痛。因此，我想借助驻在广西的滇军和桂军去讨伐陈炯明，夺回广州，再造共和。我希望你们能尽快回到滇军中去，重振军威！为使部队能迅速调动，可以由香港先付十万大洋作为军费！”

朱德万万没有想到，中山先生对他如此器重，能够在这危难之际委以重任，真有点受宠若惊，但又很快冷静下来。他从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中，对国内长期的混战已不抱什么希望，对孙中山先生依靠这个军阀反对那个军阀的老办法也不再相信，更不赞同。但他非常尊敬中山先生，作为中山先生的学生和崇拜者，他不便当面去否定中山先生的作法。所以，只好对中山先生说：

“我和炳文准备出国去，现在正在办理护照！”

孙中山听到“出国”，开始有些惊讶，沉思片刻后，说：

“你们一定要出国，就去美国吧！那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有许许多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朱德觉得美国虽然是个新国家，却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许对美国人很好，可是美国对我们为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的人并不好。它不援助我们，却去帮助我们的敌人。他想到欧洲去，因为在“十月革命”的影

响下，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因而，他非常委婉地对孙中山先生说：

“我愿意到欧洲去。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很得人心。去研究这个新的革命理论和运动，对我们中国革命会更有好处。另外，我是一个军人，还想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痕迹，学一学那次大战的经验教训。”

时间过得快，在亲切交谈中已度过了一个上午。

孙中山见劝说他们无效，只好作罢，便默默点头表示赞同他们出国的意见。临别时，孙中山还紧握着朱德的手，说：

“革命前程远大，虽然各人志向不同，道路不同，但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盛。好自为之吧！”

金汉鼎当场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并表示立即动身去广西，动员滇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争。

几天之后，朱德和孙炳文在公共租界闸北的一所普通房子里，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1915 年 9 月，在上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1916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 年与李大钊等创办了《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1922 年 7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经过孙炳文的介绍，朱德怀着殷切的希望，兴致勃勃地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他坦诚地谈了自己是怎样由一个农家子弟、贫苦学生投身军界，又是如何在新思潮的启蒙下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以及在滇军的经历；他还陈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他说：

“我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反革命篡夺了，孙中山先生利用军阀反对军阀的办法也失灵了。这一切证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从头搞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是个小心谨慎而又寡言少语的人。他侧着头倾听着朱德的陈述，两跟直盯着对方上下打量着，突然若有所思地发问道：

“你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朱德当即回答，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了比较。他直截了当地说：

“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和光宗耀祖，我可以在功名利禄中选择，可以在滇军、川军中选择，也可以在旅长、师长中选择，而为国家民族，我却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选择，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选择。如今，摆在我面前的是有两条路，但我要走的只能是后者，也可以说别无选择。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求跟着共产党走。我认为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绝不后悔，也永不背叛。”

听完朱德的回答，陈独秀沉思片刻后，立即答复说：

“要参加共产党，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随时准备为它献出宝贵的生命。”

“请相信我，我能做到。只要组织需要，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朱德插话说。

陈独秀不以为然地摆摆手，慢条斯理地说：

“不客气地说，像你这样身份的人，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再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共产党才会接受。所以，我奉劝你不要加入共产党，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那样对革命和自己都会有好处的。我看你是个典型的军人，不适合搞政治。”

陈独秀的一席话，像一瓢冷水泼在朱德的头上。这分明是把他拒之于党门之外嘛！他拼死从旧营垒中冲出来，陈独秀不仅不欢迎，还要把他再推回去。他和孙炳文都觉得人格受到了污辱。他们带着满腹的委屈和惆怅，慢慢走出了陈独秀那间小屋。

朱德十分痛心，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就没有资格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就无权信奉马克思主义？难道在革命的新秩序中，真没有朱德的立足之地？

他彻夜难眠，问孙炳文：

“革命，为什么这么难？世界上为什么还有不准别人革命的人？我的一只脚虽然还在旧秩序中，但拔出的这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落脚之地。”

孙炳文劝说：

“革命，我们是革定了，绝不能动摇。党，一时入不了，不紧要。我们还可以去争取！你已经迈出的这只脚，应该一直朝前走，不能退回去！”

“我有生以来一直是朝前走，从未后退过。放心吧！”朱德说。

陈独秀无情的拒绝，没有使朱德对共产党失去希望和信心。经过几天的思考，反而使他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决心更坚定了。他首先明白了共产党不是国民党那样的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加入的党；也不像国民党那样。只要提出入党申请就可以加入。他从失望的痛苦走出来后，对孙炳文说：

“我一定要争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今年不行，明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我深信最终会有那么一天到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朱德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强者，他的行动准则是：认定了的事就干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一生都是如此。

他同孙炳文商定，按照原计划到欧洲去，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真理。

1922 年是朱德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他转轨的一年。他从笃信孙文学说转信马克思主义，从为缔造共和拼杀疆场转变成为了寻求真理而远走天涯。这里有他当年赠好友艾成麻的诗为证：

中山主义非无补，
卡尔思潮集大成。
从此天涯寻正道，
他年另换旧旗旌。

4 年之后，朱德再次出现在陈独秀面前时，却是另一番景象。这时，陈独秀对他已刮目相看了，不仅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共产党员，而且还委以重任。先派他在上海、南京一带搜集孙传芳、吴佩孚等军阀的情报；后派他去湖北、四川争取四川军阀杨森支持北伐战争。

1922 年 9 月初。朱德乘法国邮船“阿尔及尔”号缓缓离开上海黄浦江，开始了漫长的海上航行。

“阿尔及尔”号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上，水天一色，茫茫一片汪洋，偶尔有几只海鸥伴着轮船，在蓝天上翱翔。

大海，对朱德说来是陌生的。他生在大山中，长在大山中，最熟悉的是山。连绵不断的大巴山，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深邃莫测的大凉山，他都见识过。水，他也不陌生、孩童时期淌过家乡的小河，长大了才见到奔腾的嘉陵江、大渡河，从那时起，他才知道江比河大，水要是发起怒来，比野兽还凶猛；后来又见过一泻千里的长江和万马奔腾的黄河。江河是雄伟壮观的，但比起大海来，那就渺小多了。看到大海，看到了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他的心胸和眼界一下开阔了。他站在甲板上，面对大海，凝望着、沉思着，遇想着大海的那一边该是个什么样子。

在这次难忘的航行中，朱德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与他同船的除老朋友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史逸、史尚宽、夏秀峰、李毓九、李景泌等十多人，大多是四川老乡，也有几位福建、安徽的。这些将要步入异国他乡的华夏赤子，常常聚在甲板上“摆龙门阵”。他们相互作着自我介绍，畅谈着个人的出洋打算和未来的抱负。当他们知道朱德曾是蔡锷麾下的一位将军，时年 36 岁，在同行者中是位长者时，有位朋友怀着敬重的心情问道：

“玉阶兄已过而立之年，放着将军不当，漂洋过海，不远万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何必曰利。吾将为国而上下求索！”朱德学着对方嬉戏腔调，用文绉绉的话回答着，逗得大家都捧腹大笑。他却不紧不慢地接着说下去：

“年龄大点，有啥子要紧。我听说勤工俭学的先行者蔡和森的妈妈葛健豪是 54 岁时举家赴法，去勤工俭学；徐特立是 43 岁，黄齐生是 40 岁才出国留学的……你们说，他们哪个比我小呀！”朱德扳着指头跟大家讲起从孙炳文那里听来的这些故事，还挺认真的。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他也更加敬佩了。

邮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过科伦坡、孟买入红海，再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邮船行驶得很慢，每到一个口岸，都要停留一两天，有时甚至三四天，以便补充淡水、燃料和食品。朱德一行抓住这个难得机会，就上岸去参观各地的风土人情。

一路上，他所看到的一切与他想象中的外国完全是两个样子。在南洋一带，他看到许多离乡背井去寻找生活的骨肉同胞，连一个栖身之地都没有，过着贫困不堪的日子，而花园洋房里住着的庄园主、资本家，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在西贡，来自广东、福建的华侨约 20 多万，但他们在法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下，忍受着极不公平的苛捐杂税，每人每年仅人头税就得交 18 元，而当地人只交 5 元。他非常感慨地对华侨说：“这都是因为华侨没有强盛的祖国作后盾。所以，他们专门欺辱我们中国人！”在非洲，黑人的悲惨生活，更使他万分惊讶。他说：“黑人世界是非人的世界，黑人是白人的奴隶。黑人苦力一贫如洗，没有一件衣服，身上只围个裙裙，太惨了！”

他目睹了这一幕幕的惨状，深有感触地对同行的朋友说：

“看来悲惨的事情少不单单是中国有，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这算什么世道？”

“阿尔及尔”号邮轮经过 40 多天的漫长航行，最后到达了法国名城马赛。

马赛，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名城；因一支《马赛曲》而扬名于天下。朱德一进入马赛港，耳边就回响起早已成为法国国歌的《马赛曲》，那高昂激荡的旋律，促人奋进。关于《马赛曲》的故事，早在国内就听说过，今天能踏上这块土地，就倍加亲切。

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就换乘火车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号称为世界“花都”的城市，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也不再那么美丽动人了，到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法国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战祸使其大伤元气，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座文明古城，沿街有不少衣衫褴褛的寡妇、孤儿、伤兵和乞丐，向过路的行人乞讨。

他和孙炳文一起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古迹。他看到那凯旋门虽已斑驳陆离，失去昔日风采，但依然宏伟壮观，它上面的图案记录着法兰西光彩夺目的历史。当他登上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时，巴黎的全景尽收眼底。他对铁塔的浩大工程和精巧结构赞不绝口。大家特地在铁塔前合影留念。他们还参观了记录着法兰西文明和革命历史的罗浮宫、冈戈尔广场、共和国广场、拿破仑墓、拉雷兹神甫墓地的公社社员墙。

在巴黎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寄居在一位中国商人的家里。那是一个在年轻时就来法国谋生的人，但他依然眷恋故土。一有空闲，就请朱德他们介绍祖国发生的事情。同时，他也讲一些在巴黎的见闻。一天，他对朱德讲，听说有一个中国留法学生团体是共产党，在宣传鼓动革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急忙追问这些人在哪里，那位商人说更多的情况就不清楚了，答应第二天带他和孙炳文去找另一个朋友，弄清了最近成立的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是周恩来，不凑巧的是他已经离开法国，去了德国柏林。那个朋友还把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告诉了他们。

这一意外的消息，又一次燃起了朱德找党的希望之火。他和孙炳文商量后，决定去柏林找周恩来。

周恩来这时是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同时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 年 2 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委会宣传委员，正在柏林考察德国的劳工运动，但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留德学生中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组织，就住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寓所里。

这天，朱德、孙炳文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当他叩开房门时，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年轻人。朱德有些吃惊，忙说：

“我们刚从中国来，想找一位叫局恩来的先生。”

那位年轻人非常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说：

“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朱德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的名字，他不仅听说过，还读过新近出版的《少年》杂志，在《少年》第 2 号上，他仔细地阅读过周恩来写的论文《共产主义与中国》。他非常欣赏周恩来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他曾对孙炳文说：“周恩来的主张正是你我多年来所探索和追求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周恩来。他想共产党的领导人，又能写

出那样的文章，年龄总不会比自己小。这时的周恩来才 24 岁。

“我，姓朱名德，字玉阶。”朱德作着自我介绍，接着指一指孙炳文，说：

“他，姓孙名炳文，字濬明。我俩是同乡、同志，这次又一同来到欧洲学习。”

一阵寒暄之后，谈话转入正题。朱德用他那浓重的川音一字一板地叙述着他走过的道路和追求革命的经历。从他祖辈在“湖广填四川”时，由广东韶关移居四川仪陇，讲到全家人节衣缩食供他上学；又从他弃教从戎，奋身军界，抱着军事救国的理想，讲到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最后，讲到他亡命天涯去找党，拒绝了杨森的挽留和孙中山先生的重托，抛弃高官厚禄，一心想加入共产党，然而又被陈独秀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

“我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了，这次到德国来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派我做什么都行。”朱德结束了他长时间的倾述后，歉意地笑了，说：“占去了你很多时间。”

周恩来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记着。朱德前半生的经历是丰富多采的，其中有苦难艰辛，也有厮杀拼搏，刀光剑影、悲欢离合，样样都有，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都齐全。在周恩来的经历中，还未曾遇到过这样一个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将军，他被朱德异乎寻常的经历和执着的追求深深打动了。他沉思片刻之后，说：

“玉阶兄，你们吃饭了没有？如果没有，那我们该吃饭去了！谈话有的是时间，吃完饭我们还可以接着谈。”

以后，又经过了几次交谈。他们从国内形势、各种思潮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详细交谈，气氛十分融洽。

周恩来向朱德和孙炳文表示：

“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

1922 年 11 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把这一喜讯告诉朱德时，周恩来还特地叮咛说：

“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让人知道你是一位共产党员。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因为，像你这样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去团结更多的人。”

从此，朱德就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在德国留德学生中开展工作，后来还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的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他用一生的奋斗实践了向党组织表示的决心：“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

“朱将军”扬名柏林

朱德刚到德国时，面临最大困难是语言障碍。这对年已 36 岁，毫无德文基础的朱德来说，语言不通，既不能与当地的人交谈，又不能阅读德文书籍，真是一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处境。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知难而进，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德文和德语的会话上，比常人付出了十倍的努力，利用一切机会刻苦学习。

朱德学习的方法非常独特，他不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死啃书本，而是紧密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他买了一本柏林市区图，请库尔提老师作指导，把柏林市区图上的地名，都用中文注上读音和含义。他每天挤出时间，按照交通路线，由近而远，边走边看，边问边记，沿途的教堂、学校、博物馆、剧院、公园、画廊、商店，他都停下来仔细辨认着德文招牌，观察着德国人的风俗习惯。有时，偶尔在公园里还同游人交谈。几个月里，他几乎走遍了柏林的大街小巷，他对这座陌生的世界名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记下了街道和建筑物的名称和位置，而且也渐渐地学会了用德语进行日常生活对话。后来，他回忆起这一段有趣的学习生活时，曾说：“我硬是用走路来学习德文的日常用语和地名的。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达到可以出去买东西、旅行，上街可以坐车了。”通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德语，他终于可以用德语会话。这时，他多么希望能更多地走走看看，更多地去了解德国的文化和人民的生活。他除了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的活动外，经常同一些中国留学生结伴去参观博物馆，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址，访问工厂、农村和市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情况，给朱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总算认识了它的本质。原来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后来，他回忆起那一段访问德国工厂的收获时，说：“我开始放弃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中国的信念。”

朱德在同中国留学生的交往中，得知位于德国中部莱纳河畔的哥廷根，虽然是一座仅有 4 万多人的小城，但却有一所 1737 年创办，曾培养出众多学者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它使这座小城闻名于世。法国的拿破仑曾赞誉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不仅属于汉诺威，而且属于全世界。”当时，在这座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就有四十多人，特别凑巧的是其中有十多人都是来自巴山蜀水间的四川人。所以，朱德于 1923 年的 5 月间，也迁居到哥廷根。

朱德和孙炳文受到哥廷根中国留德学生会的欢迎。留德学生会的会长魏嗣銮与朱德、孙炳文是同乡，所以格外亲切、热情。以后，朱德就在魏嗣銮的帮助下，继续学习德文。

朱德在哥廷根住在文德路 88 号。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将军、战败后退役的一位男爵。朱德为了深入了解世界近代战争，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请那位男爵为他辅导，并请他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战例，研究其战略战术。朱德在文德路男爵家里住了 5 个月，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潜心研究了世界近代战争的历史和战法。

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每星期三召开一次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这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主要活动。这时，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增加了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他们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以及《共产主义 ABC》等著作作为必读

书。此外，还学习《向导》、《国际通讯》上刊登的有关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文章，一起探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具体问题。

1924 年 3 月，朱德进入了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专业。他虽然每天都去听课，但大学里的课程并没有引起他多大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党的活动。在留学生中，朱德年龄最大，待人诚恳，学习刻苦，受到大家敬重。不久，他当选为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当时，党组织的活动主要在留学生中，重点是团结中国留学生，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

朱德于 1924 年 12 月下旬，在哥廷根市政局办了移居手续，乘火车回到柏林。年初，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孙中山先生正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久，柏林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他被中共旅德支部派往国民党驻德支部工作。当时，他还没有公开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后来，他被推选为国民党驻德支部的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活动仍在留学生中。

国民党改组后，党内的右派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影响到留德的学生。所以，学生会中就分成了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动起武来。这时，朱德主持创办了一份《明星》报，向留学生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的政策，以争取中间立场的学生，同右派势力作斗争。

中国留学生总会设在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康德大街 122 号。这是一座有阁楼的二层小楼，楼内有七八间明亮宽敞的房间。可说是闹中取静的一个极好的寓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学生经常在这里活动，来往柏林的一些同志也常在这里暂住，一时间，便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个活动中心。但是，因为是留学生总会，各派学生都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这时，国民党右派学生正在另立门户，打出了“青年党”的旗帜，妄想独占此楼。

一天，来了几个右派学生，突然把大门的锁换了，并宣布占领了留学生总会，刷出一张布告，声称“此楼过去被共党霸占，现在要收回失地”等等。

左派学生百对这种无理挑衅，毫不示弱。他们用斧头劈开门锁，重新装了一把新锁，也贴出一张布告，严正申明：“留学生总会受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驻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都有权使用。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独占。”

右派学生眼看着夺到手的小楼又丢了，并不死心，企图再枪回来。

朱德、孙炳文、刘鼎等几个人，正在楼里整理刚刚编印好的《明星》报。突然间从大门涌进一群右派学生，个个挽着袖子，攥着拳头，瞪着双眼，摆出一副打斗的架势。领头一个冲着朱德嚷嚷道：

“我们要收复失地，限你们 8 小时内滚出去。不然，就不客气了！”边叫嚷边在朱德面前挥舞着拳头。

刘鼎看他们人多势众，担心真要动起手来朱德吃亏，便对孙炳文说：

“是否去报警！”

还没等孙炳文回答，朱德就飞起一脚，挑起身边的一把椅子，趁椅子还未落地时，抓在手里甩在地上。“咋嚓”一声，一把好端端的椅子散了架。他顺手拣起两根椅子腿，立在墙根，冲着右派学生喝道：

“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还奢谈‘收复失地’，好啊！你们去收复台湾、琉球、香港、澳门，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租借地。去呀！去找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算账去！在自己伺胞面前逞威风，充好汉，可耻！滚出去，立

即给我滚出去！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这时的朱德的确被激怒了。他一改平时对同胞，对同学，对朋友那种宽厚、和善、友好的面孔，一下变成了一个怒目金刚，吓得右派学生一个个灰溜溜地溜了。那个领头的一面后退还一面虚张声势地叫着：

“朱德，你不要吓唬人。我们不怕你，这事没个完……”

一场风暴过后，小楼又恢复了平静。刘鼎开玩笑地说：

“玉阶兄，今天我才算领教了朱将军的威风。我想当年讨袁护国战争中，纳溪大战，把北洋军张敬尧打得落花流水，那是真刀真枪，会比今天更加痛快淋漓！”

朱德哈哈大笑：

“我也只是想吓吓他们。说实在的，这些乳臭未干的娃儿，哪是我的对手！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猖狂得厉害！”

从此，右派学生老实多了，再未敢来胡闹，他们私下里传说：朱德力大过人，武艺高强，浑身是胆，真是个惹不得的将军！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工人和学生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的游行队伍，遭到英国军警的屠杀，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运动。香港海员和各界工人总罢工，使英帝国主义霸占的香港一下变成了一座臭气熏天的死城。在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人民集会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柏林时，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中共旅欧支部立即发动留学生组织声援活动。朱德通宵达旦地编排了一期《明星》，介绍了“五卅惨案”的经过，还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他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发表演说，散发传单。中国留学生的正义行动，还得到了德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她的机关报《红旗报》发表文章痛斥英帝国主义。

不久，军阀政府派特使徐树挣到德国进行卖国活动。朱德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带领留德学生包围了中国驻德国的使馆，要求中国驻德大使出来接见，答复大家的要求。那个平时神气十足的大使魏宸祖，早已吓得躲藏起来。久久等候，毫无音讯，愤怒的留学生在朱德的带领下，冲过了警察的警戒线，涌进了使馆的大厅。问遍了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说“不知道”。后来，有一个人悄悄透露说大使藏起来了，但不知藏在哪里。

朱德一挥手，说：

“搜！看他能钻到地里去不成。”学生们一涌而上，从一楼搜到三楼，每一个房间都不放过，终于从一个衣柜里把大使“请”了出来。当面向他表达了中国留德学生的爱国心愿，要他立下字据，担保特使徐树挣不向德国借债，不买军火，不搞卖国勾当，徐树铮立即离德回国。终于，徐树铮在朱德等中国留学生驱赶下灰溜溜离开了德国。

这一爱国行动，不仅在留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德国人称赞中国学生运动的成功，钦佩朱德的指挥才能，说：“没想到原来领导中国留学生运动的是位将军！”

驻德大使魏宸祖对留学生的游行活动和占领使馆的行为耿耿于怀，他向德国政府提出建议，把参与活动的留学生驱逐出境。朱德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名。

中国发生的“五卅运动”，也得到德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中国的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

6月19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的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着在柏林的一部分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数千名来自许多国家的留学生，集结在广场上，有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控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暴行。当时，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与会者的高昂情绪，整个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

集会即将结束时，突然间大批德国警察冲入会场，逮捕了35名外国与会者。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在大雨中，他们被押上了敞篷汽车，关进了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

这是一座古城堡式的监狱，五层楼高的建筑，看不到门窗，也没有走廊，只有一条狭窄的悬梯直通到楼顶，然后再从楼顶一层一层下到各层的牢房。显然是为了防止犯人逃跑和劫狱而专门设计的。

和朱德同时被捕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孙炳文、房师亮、章伯钧、谬焕星、刘鼎等。他们被带进牢房的第三层，一人一间，单独监禁起来。坐在班房里，同外界隔绝了，大家都焦急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突然从关押朱德的牢房里传出了德语的吼声：

“我抗议！你们逮捕中国留学生是非法的！”

“我要见你们警官！”

“我要见中国大使！”

这一招，还真灵。立即打破牢房里的沉静，其它牢房立即响应，纷纷提出同样的抗议：

“抗议非法逮捕！”

“我们要见中国大使！”

“我们要见警官！”

抗议声，吵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看守警察来制止，也无效。

一阵抗议声过后。突然间，又传来了朱德的歌声，他唱起了《国际歌》，大家也跟着唱起了《国际歌》。一曲唱罢，朱德又唱起了《马赛曲》，那慷慨激昂的歌声，那无限的愤怒在牢房里回荡。虽然他们分别关在牢房里，但抗议声和歌声，却把大家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这歌声鼓舞着大家团结战斗，这歌声也搅得那些警察日夜不得安宁。他们知道带头的正是那位中国的“朱将军”。

第二天，德共中央的机关报《红旗报》发表消息，揭露德国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质问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国留学生抗议英帝国主义，何罪之有？政府当局悍然出动警察逮捕中国留学生，岂不说明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站在一边吗？这岂不表明它己背叛了德国人民？德共还要求社会民主党公开表态，究竟是站在英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中国留学生一边？德共巧妙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推上了被告席，弄得他们狼狈不堪。迫于舆论的压力和人民的反对，三天后，柏林当局不作任何解释，就悄悄地把中国留学生放了。但是，朱德等人的护照被无理吊销了，要把他们驱逐出德国。这当然又是中国驻德大使馆同德国当局做成的一桩肮脏交易。

朱德无限悲愤地对刘鼎说：

“此地已不想久留，‘驱逐’正合吾意。我们到苏联去，那才是一块自由的天地！”

7 月 4 日，朱德等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帮助下，办好了去苏联的护照，登上了开往列宁格勒的轮船，去实现他那“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的宏图大愿。

朱德离开了柏林，踏上了新的征途，但“朱将军”却扬名柏林城。

山雨欲来

南昌的五月，又热又躁。在这个不是，“火炉”甚似“火炉”的城市过夏天，真是难受极了。不仅没有雨，连一丝风都没有，憋得人都透不过气来。人们都像大旱盼雨一样，仰望着蓝天，企盼着来点风，哪怕是一场台风也好！大家知道台风一上岸，将会给江西带来一场大雨，大雨过后，会有一个晴朗的天空，那将是一个凉爽宜人的南昌。

山雨欲来风满楼。

天公作美，大家的企盼就要变成现实。

你看那天际，乌云滚滚而来。

暴风雨即将来临。

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投降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竞相举起了屠刀，杀向共产党人，杀向工农群众，人民在流血。

1927 年，被中国人民的鲜血染得鲜红鲜红，是个腥风血雨的年月。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4 月 15 日，李济深等一手制造了广州大屠杀，捕杀了共产党员和工人两千多人。

5 月 21 日，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

……

反革命的冷风，很快吹到了南昌。

朱培德这个一贯看风转舵的家伙，随着形势的突变，立即改变了他那种暧昧态度，在 5 月 15 日，公然以避免武装人员磨擦为由，突然遣散了在他部队里工作的一百四十多名政工人员。

一夜之间，南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署名为“机关枪连”、“迫击炮连”的反动标语：

“欢送共先生出境！”

“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

……

转眼之间，谣言四起，有人放出风说：“共产党员如果不离开南昌，就对他们不客气了！”

6 月 4 日，是端午节。

南昌人民刚刚欢度了这个全民族的喜庆节日，就碰上了极不顺心的事，就像是在吃粽子时，吃出了一只苍蝇。

6 月 5 日，朱培德这个善于钻营的坏蛋，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明目张胆地打出了反共的黑旗，悍然宣布：

“礼送共产党出江西！”

就在这一天里，他调兵遣将，派出部队，实行全城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断绝交通。接着就封锁了省工会、农协会、省市学联、南昌市党部等革命机关和团体，封闭了共产党人所办的报纸。然后，他亲自出台演了一出“礼送”共产党人的丑剧。

朱培德这只狡猾的狐狸看出了武汉的国共合作，还未最后公开分裂，在江西还蕴藏着强大的革命力量。如果用武力解决共产党，不仅没有足够的把握，弄不好还会引火烧身。所以，他就没有敢公开亮出屠刀。他经过一番周

密策划，玩弄了一个圈套，以开会为名，用武装把省、市机关里的共产党员都“请”了去，假惺惺地说：

“南昌地处宁汉对立之前哨，情况复杂，为了避免流血事件和影响社会治安，你们要闹革命就去武汉闹吧，我这里以礼相送！”

他又是设宴饯行，又是赠送旅费，在军乐队的吹打声中，将共产党人押上火车。他就是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欺骗手法，将二十多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分子“礼送”出境。

朱德得知这一事件后，极为气愤，立即赶到高升巷的原“张勋公馆”，上门质问朱培德。

朱德与朱培德可说是老相识了。早在云南昆明陆军讲武堂时，他俩就是同学，同期在丙班学习，在全班 339 人中，他两人品学兼优，学科和术科的成绩都很突出。操练时，他俩指挥队伍，下达口令，声音洪亮，气字轩昂，动作干净利索，博得教官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每次会操、检阅或者为日本、德国领事表演，总办李根源不是指定朱德，就是指定朱培德来带队，演练。所以，教官和同学们都称他们为“模范二朱”。后来，他们一起参加了昆明的“重九起义”，在滇军里，他俩都是“四大名将”之一。人世沧桑，各走一方。他们在人生轨迹上，各自朝着不同的目标运行着。但是，他们个人之间，总还是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友谊。

朱培德一见朱德到来，看他神色不对，就猜到了七八分，知道是上门问罪来了。他陪着一副笑脸，装出抱歉的样子，摊开双手，一字一板地说：

“玉阶兄，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望能谅解弟的处境和难处……至于老兄……我看还是暂时回避一下为好！”

朱德没有开口，想让他一直讲下去，看看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朱培德接着劝朱德说：

“叫我看，玉阶兄最好能在三日之内离开南昌。不然，你的安全，我就难以保证了！”

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嘛。朱德怒目相对，义正辞严地说：

“凡是反共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也是违背孙中山先生遗愿的，望你三思而行。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这一点，我想你也是清楚的。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时就是这样。今天，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更谈不上个人的生死安危了。但是，可以相告，我朱德在南昌的安全，相信还不会成为什么问题，请放心好了！”

朱培德假惺惺地连连点头称是：

“那是！那是！我相信不会有人打玉阶兄的主意！……”

“但愿如此！”

两人不欢而散。朱德出门前甩下了一句话：

“后会有期！保重了！”

朱培德就为这句话琢磨了半夜，弄不清是好心，还是歹意，还是一语双关。

7 日下午，朱德派警卫员刘刚去牛行车站打听，当天还有无去九江的火车。那时，赣江上还没有桥，火车还没有通到南昌市区，往返南昌市区与牛行车站，都得坐船摆渡，才能过江。

刘刚冒雨过江，到牛行车站一问，售票的说去九江的客车没有了。今天，只有一趟拉煤的列车去九江。他急忙赶回花园角 2 号，向朱德作了报告。

朱德在家里来回踱着步子，盘算了一阵，当机立断地说：

“马上赶煤车，去九江！”

这时，朱德身边的几个随员也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总觉得情况紧急，就赶忙收拾行装，冒雨过江，直奔牛行车站。

一叶小舟，在风雨里飘摇，一会儿冲进赣江的激流，搏浪前进。小船仓里的朱德透过濛濛雨幕，望着远去的南昌城楼，思绪万千。是啊！在南昌城里的岁月，虽然只有半年多，时光短暂，但留下的记忆却是终生难忘。他在心底里暗自向南昌道别；向朝夕相处的战友道别：再见了南昌，再见了战友！我们迟早是要回来的！

上煤车时，又出现了麻烦，费了许多口舌也无用。好在那是个“钱能通神”的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嘛！何况人呢！朱德给随行人员递了个眼色，作了一个递钱的手势，当几块白花花的大洋拍在了有关人员的手上时，立即被请进了列车后部的一节公务车厢。

火车在大雨中开往九江。

早晨到达九江时，又是另一番景象，已经雨过天晴，一片翠绿。

朱德和几个随行人员在车站旁边的小饭铺里吃罢早饭，就去拜会金汉鼎。

这时，金汉鼎是第九军军长，又兼着赣北的警备司令。他虽是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但府第还是门禁森严。

刘刚向门卫递上一张朱德的名片，说：

“请通报一下，我们长官要见军长！”

卫兵一看眼前这位长官威武庄重，又有这么多的随从，不敢怠慢，很快把名片递了进去。

不一会，门里面一阵骚动，一位当官的跑出来说：

“让长官久等了，军长出迎！”金汉鼎随后跟了出来，亲自迎接朱德，说：

“玉阶兄，什么风把你刮来了！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抱歉，抱歉呀！”

“南昌刮起了九级台风，你不知道呀！”

一语双关，点出了原委，金汉鼎只好说：

“只听说，南昌的风很大……”

两人握手寒暄之后，一同步入客厅。

朱德同金汉鼎也是老相识了，他们在滇军中并肩战斗，生死与共，都曾立下过赫赫战功，让敌人闻风丧胆。“金、朱惹不得”的民谣，说的就是他俩大战北洋军，威震川南的事。1922 年，唐继尧杀回昆明，他俩结伴出逃，历经艰险才到了上海。后来，朱德出洋去寻求报国真理；金汉鼎奉中山先生之命南下广东参与策划重振滇军。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但他们之间的情谊还是很深的。所以，金汉鼎接待朱德非常热情。

第二天，天气晴朗，蓝天如洗。

金汉鼎派人护送朱德上庐山，住进牯岭仙岩公寓对面的一幢西式洋房。这是杨如轩新造的别墅，落成不久，只有他的老父亲住在里面，其余房间大部分都空闲着。

朱德和杨如轩也是老朋友了，他们不仅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同班同学，而且在滇军里杨如轩还曾是朱德的部下。由于这层特殊的关系，金汉鼎把朱德安排在杨如轩的别墅里，暂避风险和休息。

庐山，这是让多少人想往的风景如画的避暑胜地啊！然而，朱德无心久留，急于下山，他一直惦记着把南昌发生的一切，尽快报告给中央。

他和随行人员作好了一切准备，悄悄换了便装，秘密地下了山。为了行踪不被人发现，到九江后，他未再去找金汉鼎，特地派人去买了几张去武汉的外轮船票。

上船前，朱德非常机警地嘱咐随行人员，说：

“现在到处都是军警，对去武汉的人员盘查得都很紧。你们把各自所带的武器都集中起来交给刘刚，让他设法先带上船去。我们看看动静，随后上船。”

刘刚把几支手枪和子弹放在一只盛洗脸用具的竹篮子底下，不动声色地拎着篮子，大摇大摆地向码头走去。

朱德一行站在码头外面观察动静。

九江码头上，军人、警察荷枪实弹，堵在码头的入口处。不分男女老少，个个都得盘问检查，吵吵嚷嚷，乱作一团。箱笼、包袱摊开一地，吃的穿的用的，花花绿绿，什么都有，像是南方“晒霉雨”、亮家当一样。外国的船员站在甲板上看热闹。

突然间，一位乘客的磁花瓶被打破了，立即引起一阵争吵和骚乱，就在混乱中，刘刚机敏地躲过盘查，提着那只竹篮子上了船。他靠在船舷边向朱德招手。

“平安无事啰！我们上船！”

朱德像下令一样，大手一挥，随行人员跟着他走向码头。

轮船溯江而上。

朱德一到武汉，就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南昌发生的反共事件。

南昌起义立头功

7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作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初步决定。由于朱德在南昌有便利的工作条件，对各方面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就派他先赶回南昌作准备。

朱德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乘船秘密离开武汉抵达九江。在九江警备司令部的大门口，他碰巧遇到了正准备上庐山的金汉鼎。金汉鼎急如星火地说：

“玉阶兄，我奉令上庐山，有话咱们在船上说吧！”

上船后，金汉鼎告诉他说：

“刚刚接到益之（朱培德的字）从庐山上打来的电话，说汪精卫、张发奎都到了牯岭，要我立即上山，说有要事相商。”

“有啥子要事？”

“我也猜不透，只是近来风声很紧，流言蜚语不断，像是要发生什么事变。”

“益之近来的态度如何？”朱德作进一步地试探。

“在目前的形势下，他当然仍倾向于汪精卫。”

“铸九（金汉鼎的字），在这多事之秋，你有何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还不是跟着益之一起干！”

“铸九，江西这帮子人马都是灰色的，不愿革命了。我们一同到广东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重振北伐大业！”

金汉鼎对朱德的一席好言相劝无动于衷，反而劝说朱德：

“你刚到江西，对近来这里发生的一切不甚了解，凡事还是谨慎为好！”显然，金汉鼎是拒绝了朱德的要求。

船到莲花洞，去南昌的火车已没有了。金汉鼎约朱德上庐山歇宿，待明天再去南昌。朱德谢绝了金汉鼎的邀请，留在莲花洞，等待明天的班车。

朱德一回到南昌，就先秘密地去拜访他的好友李团长。

朱德的突然出现，使李团长非常惊奇，他带着十分疑惑的神色，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玉阶兄。是什么风把你吹回来的？前些日子哪里去了？此次返回南昌，有何贵干？”

朱德不动声色，笑容满面地答道：

“我是身不在南昌心在南昌呀！老实说，我虽不在南昌，却没离开江西一步，一直在铸九那里避暑。承蒙他盛情款待，这一段时光过得是神仙般的生活。在庐山上，我住的是杨如轩新修的小别墅。云雾缭绕的庐山，景色万千、云雾时聚时散，变幻莫测呀！这次，我算是初识庐山真面目！”

“老兄，一定和总指挥（朱培德）在山上幸会了？”李团长仍在试探着朱德真实行踪。

“那是当然了。他怕我产生误会，一见面就作种种解释。还再三提出，请我回南昌后担任新职。什么虚席以待，什么任其选择，什么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咳！难哪，现在是事难做，官难当呀！”

“老兄突然离开南昌，行踪不辨。大家都在猜测，说这是总指挥特意安排的。这样，既能向上交待，又可不失兄弟情义，真是难能可贵啊！”

李团长一听朱德说离开南昌后，一直住在金汉鼎那里，这次在庐山上又见到了朱培德。这来来去去，肯定都是朱培德特地安排的，足见朱德和朱培

德、金汉鼎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了。他心里的疑团一下解开了。所以，不断地为朱培德的“礼送出境”之举打圆场，说好话。

“总指挥的用心，人所共知。我当然是理解的，他还算够朋友。不过，也有那么一些人真不够朋友。他们见势而趋，失势而远，更有甚者是诬陷邀功，卖友求荣了。古人云：‘广交天下士，知心能几人’，真是千真万确呀！”朱德在这里感慨了一番，有意试探一下他的态度。

“老兄不必过虑。我李某虽不是名士豪杰，但绝非负义之辈。你若不信，我可对天盟誓……”李团长唯恐朱德怀疑他会干出卖朋友的事，连忙再三表白自己。

“你我肝胆相照，何必言誓。这次重返南昌，无非是因为这里人地两熟，诸事都有个照应。最后，是去是留？我还得看看各方情况再定。”

李团长一听朱德去留问题还未决定，便说：

“老兄的行踪未定之前，就住在舍下。我可以担保你不会有任何风险。若有三长两短，不仅对不起你，也无法向总指挥交待呀！”

“老弟盛情难却，实在感激。不过长住在这里打搅你，我也过意不去。何况你公事繁忙，迎来送往，彼此不便，还是麻烦你替我另找一个安静的住处为好。那样，我的家眷也可以接回来。”

李团长频频点头，觉得朱德讲的很有道理，就说：

“老兄既然有安家的打算，只好听便。房子不会有多大问题，你原来住的花园角 2 号，可能还空闲着。”他回头叫来副官，说：

“你马上去花园角 2 号看看，告诉房东不要把房子租给别人，就说朱团长回来了！”

第二天，朱德又回到了花园角 2 号。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江西省委在南昌市松柏巷召开了中共江西全省代表大会，推选罗亦农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宛希先负责宣传工作，吴振鹏负责青年工作，许全珍负责妇女工作。大会分析了全省的革命形势，听取了代表们对各地工农运动情况的汇报。

朱德住下之后，就立即同江西省委取得联系，向省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陈潭秋、宛希先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同他们一起发动各界人民团体，成立“南昌市民欢迎铁军大会筹备处”，积极筹设接待站、运输队等，并为即将进入南昌的部队，预先筹划了适宜的驻地。

朱德受党的重托；夜以继日地开展着活动。这次回南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弄清敌情。所以，他不停地“拜访”各方人士，特别是驻南昌的高级军官。通过直接地交谈和派人秘密调查，弄清了南昌及其附近驻军的部署、人员、武器、装备以及设防与火力配备情况。

当夜幕徐徐落下以后，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冒着南昌夏夜里特有的闷热，挥汗伏案精心绘制一份敌军分布图，仔细地标出了火力的配备位置。

7 月 26 日，周恩来按照中央的决定，化装后秘密赶赴南昌领导武装起义。27 日，他一到南昌就来到花园角 2 号朱德寓所。两人相见，心情都非常激动。

“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朱德说。

“时间就是胜利嘛！现在必须争分夺秒！”

朱德接过周恩来手上的黑皮包，递上一把纸扇，一杯清茶。他还没等周恩来把水喝完，便开始汇报他回到南昌后的工作情况，并把事先买好的几张南昌市街道略图和亲自绘制的敌军分布图，摆在桌子上。

周恩来看到朱德绘的图上不仅有街道、地名和敌人的番号、兵力，而且还有碉堡、火力配置以及进攻路线等，非常满意地说：

“这份兵要图绘得好极了。你为南昌暴动立了头功！”

朱德继续介绍了南昌地区的敌情：

“南昌城内外，现有六个团：第三军的两个团，是二十三团和二十四团，第九军的两个团，是七十九团和八十团；第五路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第六军的五十七团，是最近几天进驻南昌的。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警卫部队。总兵力约万把人，都经过训练，有一定的战斗力。我办的那个军官教育团，第一、二营的学员已提前毕业，分配了工作；第三营还有三个连。我在南昌市公安局争取过来的保安人员和消防人员，约有四五百人，人数不算多，武器也不算好，但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情况，暴动时，可望成为一支可靠的力量。不过，前几天朱培德派人把在南昌的军用物资全运走了。”

周恩来点头赞许说：

“你的心血没有白费，为暴动作了一件大好事。这些情况为制定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朱德说：

“上层高级军官的工作进展不大。他们当中许多人长期追随军阀，多是趋炎附势、追名逐利之徒。有些人虽然对当前的形势颇多感慨，但是，当真要他革命时，那就对不起了，还是升官发财要紧。”

“不足为奇。他们的总指挥张发奎、朱培德，不就是这样吗？对他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但对下面的将领和下级军官，我们还要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努力去争取。”周恩来拿过一条湿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摇着纸扇兴奋地说：

“最新消息，完全为我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除了叶挺所在的第十一军、贺龙的第二十军外，还有国民政府卢德铭警卫团、武汉军校的部分同志以及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等，可望在暴动前夕赶到南昌。这样，我们的兵力多于敌人几倍。他们在赣南、赣东有部队，也是远水不解近渴，来不及增援。所以说，南昌暴动正如中央估计的那样，是稳操胜券！”

朱德腾出宽敞的中厅，在中厅摆上一张小圆桌、四把椅子，临时加了一架帆布行军床，就让周恩来住在这里。他把警卫员刘刚叫来吩咐说：

“周先生今日才到此地，由你在家好好招待几日，处处多留心点。要听从命令，他叫你去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是了，不得怠慢！”

朱德又叫身边的随从王荣坤上街买来了各种应时小菜，他自己动手烧了几个富有川味的小菜，同周恩来一同进餐。

吃罢午饭，朱德按原计划要去赴约，临行前，他对周恩来说：

“你有事就叫刘刚去做。他是本地人，各方的情况比较熟悉。”

周恩来看看刘刚，点了点头。

朱德出面租赁了南昌市中山路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作为领导起义的大本营。这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五层大楼，大小有近百间房间，又地处市区中心，设立指挥部非常适宜。

前敌委员会决定 8 月 1 日凌晨 4 时发动起义。前敌委员会组成了参谋团，周恩来任主任，参谋团的成员有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参谋长为刘伯承。由周恩来签发了绝密的作战命令：

“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之目的，决定于明日早晨 4 时开始向城内外

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朱德部署好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后，于 7 月 31 日晚上，遵照前委的指示，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举办一个宴会，邀请第三军在南昌的两个团的团长和团副参加。这两个团是朱培德的主力，也是起义军的劲敌。如果在起义中把这两个团的指挥官拖住，使其失去指挥，将大大有利于起义军。朱德凭着他在滇军中的威望向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和二十四团团长萧曰文等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带着团副一起来赴宴。

他们拿到请帖，一看是朱德将军的邀请，就有点受宠若惊，顿时感到身价百倍，飘飘然地赶来赴宴。

宴会设在城西大士院街口的佳宾楼上，而二十三团和二十四团的驻地都在城东，相距甚远。这也是朱德有意安排的，既是调虎离山计，当然离得越远就越好。

朱德在佳宾楼里悠闲自得地应酬着各位客人。

“我们虽然同在一座城市，难得一聚。好在同出一脉，都是滇军，不是外人。今天敬请各位光临，纯属叙旧，别无他事，各位随便畅饮！”朱德举杯敬酒。

“朱将军乃滇军前辈！赐吾等如此殊荣，担当不起。能与将军同桌共饮，实为今生难得！今日北伐，相聚在赣，虽是异土他乡，能同朱将军在一起，倍加亲切。今后，将军若有用得着部下之处，吾等当效犬马之劳！”萧团长代表几位来客表白感谢之情。

“你我兄弟都是一家人，当年为蔡锷将军指挥；今天，同归朱总指挥领导。理应如此，不必客气！”朱德的大度、豪爽之气深深感动了客人，边吃边饮，叙旧谈心，笑语不停。

一桌丰盛的酒席，从傍晚吃到夜里 9 时，眼看着就要打烊了，客人们才慢慢起身。朱德掏出怀表看了看，说：

“时间还早。各位今晚又无事，何不去打几圈麻将！这附近有一处极好去处。”

酒足饭饱之后，再去打上几圈，真是难得的机会。客人们毫不推辞地随同朱德来到就近的大士院 93 号，去作‘雀城之战’。警卫员刘刚按照朱德的吩咐，把客人的几个卫士也请到了旁边的小馆子里喝酒去了。

几个团长解带宽衣，相互推让了一番后，就入座开局，进入牌阵，如痴如迷，朱德在一旁观战。

“发财！”

“东风！”

“一万！”

……

交替、轮番地呼唤着，胜家、败家轮流坐庄，正在酣战中。约莫到午夜时分，四圈麻将还未打完，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决开门！快开门！”

大门启开，闯进来的是二十四团的副官，他跌跌撞撞地迈进门后，喘息未定就向萧大胡子报告说：

“报告团长，9 点接到指挥部通知，说贺龙的一个副营长密报，明晨 4 时共党要暴动……命令各团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严加防范！”

一听“暴动”二字，几个团长，一下惊呆了，不知所措，半晌还未醒过

梦来。

萧大胡子知道这一下坏了事，便向副官大发雷霆：

“混账东西！为何不早来报告！”

“接到指挥部的通知后，我就……出来，跑遍全城也未找到团长……刚才在小酒馆里，碰见了几个护兵，才知道团长在这里……”副官感到实在委屈，在小声申辩着。

这时，几位团长已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在地上直打转转，感到大祸临头了。

朱德见此情景，知道一定是走漏了风声，但他仍从容不迫，若无其事地说：

“各位老弟，不必惊慌。在这多事之秋，蜚短流长，什么谣传没有？‘暴动’呀，‘起义’呀，天天都能听到，未必可信。各位都是从大风大浪里闯荡过来的，何必大惊小怪？天塌下来，有一颗脑壳顶着，怕什么！来来来，各就各位，打完这四圈，尽欢而散！”

“朱将军，你是无‘官’一身轻哟！我们哪能同你相比呀！你同朱总指挥、王军长他们是什么交情？我们一个芝麻大的官，万一今晚出了事，脑壳还不得搬家……谢谢今晚的款待了！好在都在南昌，改天再聚吧！”说罢，几个团长匆匆离去，各奔自己的营区。

朱德也不便强留，以免发生意外，只好打着哈哈，送走客人。然后，他立即赶到起义点指挥部，去报告新的情况。

这时，起义总指挥部已经得知“二十军第一团里有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叛变，把起义的时间向敌人告密了。所以，前委把原定的起义时间从凌晨 4 时提前了两个小时。

8 月 1 日凌晨 2 时整，南昌起义的战斗打响了。

“叭！叭！叭！”清脆的枪声，击破了沉静的夜空。霎时间，枪声、炮声、杀声和爆炸声响彻南昌城。

起义军战士们，呼喊着从四面八方向敌人驻地发起了进攻，起义进行得十分顺利，二十三团和二十四团虽是敌军的主力，由于朱德的调虎离山计，也没有过多的抵抗，就被消灭了。仅用了 3 个小时，就解决了南昌城区的战斗。

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胜利了。从此，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开辟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八一”变成了人民军队的象征。

当东方出现曙光时，在洗马池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高高飘扬着的起义军的红旗格外的鲜红耀眼。

市民们潮水般地涌向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庆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欢迎成千上万的威武雄壮的起义军。

激战三河坝

南昌起义军翻越过闽赣边境的武夷山，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汀州城。

经汀州、上杭、永定到广东潮汕的这次进军，声势之大，行军序列之长，也是少有的。整个南下的起义军分成三个梯队前进：第一梯队，由叶挺、贺龙率主力部队前进；第二梯队，由谭平山带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跟进；第三梯队，由李立三负责伤员，最后由周士第率领第二十五师作后卫。全部南下的起义军，拉成了一条长长的行军纵队，前锋已接近潮汕，后尾还在汀州、上杭一带。

前委在汀州时，对夺取广东东江的计划，又进行了详细讨论，当时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叶挺提出，主力应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另以一小部分兵力取潮汕。如果主力经潮汕再取惠州，拖长时间，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起义军之可能。另一种意见主张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以主力取潮汕，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这种意见得到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支持，多数同志也渴望早日攻占潮汕，既能得到休息，又能在沿海口岸得到国际的援助。所以，会上通过了后一种意见，这就形成了三河坝分兵的决策，使原来兵力已日益不足的起义军力量更加分散。

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从处在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由韩江顺流而下，直向潮汕进发：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的教育团，共约四千人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

三河坝，位于广东大埔县的南面，中心点汇城是个三江口。北面飞流直下的汀江和从西南方向奔腾而来的梅江，在这里汇合后汹涌澎湃，向南泄人水深流急的韩江，最后在澄海流入南海。从这里，溯江而上可通闽、赣，顺流而下可直达潮汕。同三江汇合点对应的是一座笔枝尾山，形同鱼尾，山势险峻，群峰叠嶂，松林茂密，可攻可守，大有一山镇三江之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大部队过江之后，直取潮汕，第二十五师来到三河坝后，师长周士第接到第十一军军长叶挺的命令，命令他领导的第二十五师归朱德指挥，留守在三河坝，监视梅县等地之敌，以保证主力部队夺取潮汕。

第二十五师是以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无论部队的战斗力，还是党的力量，在南昌起义军中都属最强的劲旅之一。所以，把坚守三河坝、抗击钱大钧部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10 月 1 日，朱德带着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察看了三河坝一带的地形。朱德说：

“这三河坝的名字起得太绝了，正在汀江、梅江、韩江三江汇合口上。一旦发生战斗，第二十五师留在三河坝，将是背水而战，地形对我极为不利。这是兵家之大忌。部队应该拉到三河坝对岸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一带布防。”

“我们完全同意朱军长的意见，立即调动部队过江。”周士第点头答道。

星夜，开动了“大利号”轮船，把起义军运到江东的东文部，只在观音阁留下一个三人的观察哨。同时，将江西岸的各种大小船只，全部撤到东岸，只留下一只小船作渡船。第二十五师的师部设在田氏宗祠　内，第七十五团驻守在笔伎尾山、龙虎坑一带；第七十三团驻守在下村一带。部队进入阵地

后，情绪十分高昂，连夜挖战壕，筑工事，准备还击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的午后，在江岸边的竹林旁，朱德召集全师的军官讲话。

第二十五师的许多军官都晓得朱德的威名，但未见过本人，在他们想象中的朱军长，一定也是一身将校呢，戴着白手套，拎着一根细马鞭，登着一双乌黑马靴；有的还猜想一定留着两撇八字胡须，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当师长周士第向大家介绍说：

“请朱军长为大家讲话！”

大家看到的朱德和起义军的普通士兵一样。他戴着一顶军帽，身后背着一顶小斗笠，灰蓝色的军眼上衣，穿着一条短裤，打着绑带，脚上是一双草鞋。给人的印象是再普通不过了，完全是一个老兵的装束，所不同的就是他身上挎着一只德国造二十响的驳壳枪。

“同志们，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们二十五师有着叶挺独立团的光荣传统。今天，我们都要下定决心，坚守住三河坝，只要在这里把敌人牵制住了，就为夺取潮汕的我军创造了胜利的条件，大家有无信心？”朱德向大家发问。

“有！”全体军官一致回答。

“我同大家一样，你们的师长和党代表、参谋长也一样，都有信心。我们要有‘人在阵地在’的信念。你们要保持‘铁军’的荣誉，要发扬汀泗桥战斗、贺胜桥战斗的勇敢精神，要发扬会昌战斗中奋勇杀敌的精神，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朱德的讲话，博得大家一阵阵掌声。他还讲了如何构筑工事，如何防守阵地；对渡江的敌人在什么时候打，怎样打最为有利。每个军官都静静地听着，对他那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心和渊博的军事知识十分敬佩。

会后，朱德巡视了前沿阵地，检查构筑的工事，并亲自示范，挥锹挖土，挖筑了散兵坑和交通壕。

果然，钱大均气势汹汹地向起义军扑来。他仗着已补充好了的三个师，有三万多人马，准备在三河坝同起义军决一死战，以报他会昌战斗中惨败之仇。敌军一进入三河坝，就到处搜寻渡河器材，从早到晚沿江只搜寻到了二十多只小篷船。

半夜，敌人趁着浓重的夜色开始偷渡。他们哪知道起义军早有准备，正在滩头阵地上等着他们哩！开始渡江时，江东起义军毫无反应，敌人自以为得计，壮着胆子，让船工加快划桨。当船划到江中时，起义军战士遵照着朱德再三强调的“半渡而击”的原则，枪、炮一齐开火，大部分船只被击沉，剩下的几只也靠着西岸顺流而下。

到了下半夜，狡猾的敌人又从韩江的上游悄悄驶来十多条船，在炮火掩护下，企图强渡登岸，在起义军密集炮火的截击下，半数被击沉，半数靠岸后占领了滩头竹林。

这时，第七十五团的团长孙一中，亲自带着六个连队猛扑下去，三百多敌人全部被打死、击伤或活捉，无一漏网。

钱大钧并不就此罢休。第二天，他又从上游松口一带抓来十多条民船，准备强渡韩江。拂晓，大雾弥漫，笼罩着整个韩江，敌人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强渡韩江，又遭到起义军的迎头痛击，仍没有渡过江来。

10 月 3 日拂晓，韩江的江面上又是浓雾沉沉，久久不能散去，能见度极低，滩头和竹林全都隐没在浓雾之中，十步之外都看不见人。钱大钧抓住这个难得机会，以浓雾作掩护，调集了大批船只，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分多路

抢渡韩江。

一部分敌人强渡登岸后，就抢占了七十五团的滩头阵地。但是，岸边的高地还仍在起义军手里，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波浪式的冲锋被击退了，还在不断地增援，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反复争夺着阵地，战斗一直僵持到午后。

下午 3 时，敌人又调集了许多机枪和迫击炮作掩护，拼命攻击。起义军战士虽经昼夜作战，又已粮绝，仍坚持顽强拼搏，奋勇当先，毫无惧色。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连续争夺，不下数十次。

黄昏时分，侧翼的第七十四团赶来增援，再次杀退敌人，夺回阵地，这时，阵地前沿和阵地上，敌人留下的尸体比比皆是。

当夜幕落下时，起义军已陷入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

朱德认为经过三天三夜的顽强阻击，大量杀伤了敌人，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已经完成。在激战中，起义军伤亡也很大，为了保存实力，应该立即撤出战斗，去追赶主力。于是，下令留下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的第三营作掩护，其余采取交替掩护，逐步撤退的办法，迅速转移。

命令下达后，第二十五师在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的率领下，在迷漫的浓雾中，有组织地迅速撤出战斗，去追赶前委和主力部队。

绝处逢生

朱德带着第二十五师撤出三河坝后，去追赶主力部队，到了饶平（今三饶）的茂芝镇，恰巧遇到了第二十军教导团的参谋长周邦采和第二十军第三师六团六连连长杨至诚及毛泽覃、粟裕等刚从潮汕突围出来。这时，才得知起义军主力已在广东揭阳、汤坑一线失败，潮汕已经失守，部队已被打散，许多起义军的领导人离开部队转入地下。失败的消息就像晴天霹雳，整个第二十五师都陷入了迷惘之中：革命还有无希望？铁军还能否坚持？起义的火种还能否保留住？大家把希望全寄托在朱德身上。当时，留下来的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只剩下他这位第九军军长。

据可靠情报得知，国民党反动派又纠集了五个师的兵力，从潮汕和三河坝两个方向，向第二十五师扑来，企图用南北夹击的办法彻底消灭第二十五师。起义军由于接连失利，减员很多，又同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组织上思想上都相当混乱。

为了挽救这支南昌起义幸存下来的孤军，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 10 月 7 日，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了起义军全体军官会议。他说：

“我们的主力部队在潮汕失败了，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敌人正向我们袭来。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为了保住铁军的荣誉，我们必须高举起南昌起义这面武装斗争的光辉旗帜。现在，我们这是一支由几个单位会合在一起的部队，没有长官了。我只是第九军的军长，不是你们的长官，只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研究研究，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陈毅立即站出来，说：

“我陈毅拥护朱军长领导！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成员，又是第九军的军长，是我们当中的最高领导，最大的干部。自从起义军南征以来，特别是在三河坝的激战中，完全证明他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指挥才能……”

王尔琢还没等陈毅讲完就插话说：

“我也拥护朱军长领导！”

接着，有许多军官表态：

“拥护朱军长！”

“拥护朱军长！”

……

会上，气氛热烈，大家都表示支持朱德来领导部队。经过热烈讨论后，决定积极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避开敌人主攻方向，从东北方向迂回穿插到闽赣边境，加强政治工作，稳定军心，防止叛变行为发生。最后，一致通过了朱德提出的“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真奔湘南”的决策，准备去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湘、赣边界，去找“落脚点”，开展游击战。起义军进行了整编，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九军教育团编为第三营，共两千人。由当地党组织派出向导带路，开始千里转战。

10 月 7 日下午，朱德带着起义军离开饶平，经麒麟岭，过柏树关进入了福建，沿着粤闽边界的崎岖山路北上。从九峰经平和、永定、上杭， 18 日到达闽赣交界处的武平。这时，敌人已发现起义军余部向西转移的动向，钱大钧派出一个师尾追不放。

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朱德觉得应给予敌人以还击。他的意见得到了陈毅、王尔琢等的支持，就在武平附近选择有利地形设伏，击退钱大钧部的两

个团的进攻。后来，又遇到了钟绍奎的部队，消灭了他的一个营，才进入了武平以西武夷山的南端。

这时，起义军已剩下一千五百多人，处境也更加困难，悲观和动摇的情绪在部队中蔓延着，行军路上遇到岔道口，便有人不辞而别。有那么几个还是黄埔军校出身的连长，私下找到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去另寻出路，并劝说陈毅同他们一起走。他们非常仗义地对陈毅说：

“说实在的，你是个知识分子，文化人，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我们都是带过队伍的人，眼下，这支队伍不行了，别说冲锋陷阵了，碰都碰不得，一碰就垮光了。与其当俘虏，不如换上便衣溜了！”

陈毅瞪着一双闪动的眼睛。双眉一立，说：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在这种关头撇下队伍溜了，还算什么铁军？连个男子汉都不配，你们要走，你们走。我陈毅说话算数的，绝对不走，一定跟着朱德干到底！脑壳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疤。看看我这个知识分子，能不能学会带兵打仗，人各有志，诸位请便吧！还是那句老话，铁军垮不掉，革命是有希望的！”

这天，起义军来到石径岭。

石径岭，位于武夷山的最南端，在武平西北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的山都是峭壁悬崖，放眼望去，如同斧砍刀削一般。在壁立的两山之间，有一条石径山路，弯弯曲曲盘亘其中，最狭窄的隘口，山势更加陡峭，道路也更加艰险，大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

隘口，又早被民团占据，修筑明碉暗堡，置有路障和栅门，设立关卡，有专人把守盘查，敲榨勒索过往行人，干起了收“买路钱”的勾当。听说起义军已到平和，有从石径岭翻过武夷山去江西的迹象，民团便加强了防守，增加岗哨，日夜巡逻。

起义军风风火火赶到隘口时，无法通过，担负前卫的是原七十三团改编的第一营，他们虽是英勇善战的铁军劲旅，几次冲杀都无法通过。敌人居高临下，在大树林荫的庇护下，隐蔽在石缝草丛之中。他在暗处，你在明处，只听见枪声和嚎叫声，看不见一个人影。几次冲杀没有过去，还遭到民团机枪和手榴弹的袭击，有很大伤亡，西进的道路完全被阻挡。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当儿，朱德来到前卫部队。他问明情况后，对前卫部队的指挥员说：

“敌人设防坚固的隘口，不宜强攻。这自古就是兵家之禁忌。《三十六汁》中有一计，叫做‘暗渡陈仓’，讲的就是在作战中，故意暴露行动，利用敌人固守之际，迂回偷袭，出奇制胜。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迂回侧击的打法，去夺取胜利？”

前卫部队的指挥员听了朱德的这一番话后，频频点头，但举目四望，全都是悬崖峭壁，又有些为难了。朱德一面命令部队立即散开隐蔽，一面向身边的几个干部交待了任务，要他们将正面部队改强攻为佯攻，用以迷惑敌人，吸引火力。然后，他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隐没在路边的林莽之中。

朱德穿过密林草丛，登悬崖，攀峭壁，健步如飞，参谋和警卫员都撵不上他。当他登上隘口的顶峰，在民团的侧后出现时，民团的碉堡、堑壕都暴露在他的脚下。他一声令下：

“打！狠狠地打！送这些龟儿子都上西天去！”

参谋、警卫员都一齐开枪射击，手榴弹在敌人头上开了花。民团万万没

有想到遭到如此袭击。

“飞将军从天落”，突如其来的袭击，一下打得敌人懵头转向，惊恐万状，呼喊着：“天兵天将下凡了！”纷纷逃命去了。

正在佯攻的前卫部队知道朱德奇袭成功，便杀向隘口。

这真是绝处逢生。朱德用他的勇敢和智慧，指挥着部队杀出了一条生路。当起义军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石径岭隘口时，看见朱德威武地站在峭壁的山顶上，手里握着他那把心爱的驳壳枪，正指挥着后续部队通过隘口。他不断地向部队招手致意。

起义军的军官和士兵在石径岭战斗中，亲眼目睹了朱军长攀登悬崖峭壁的勃勃英姿，看到了他那身先士卒的大智大勇。也看到了他那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朱德智勇双全的盛名大震，起义军对他的信赖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石径岭战斗之后，起义军摆脱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击，完成了“隐蔽北上”的任务，开始“穿山西进”，直指赣南山区。

人生旅途的十字路中口

南昌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失败了。

浩浩荡荡的三万大军，只剩下由朱德指挥的二十五师和九军教导团的千把人，加上从潮汕突围出来的部分官兵，也不足两千人。

反革命军队从四面八方麇集而来。这支起义军余部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

起义军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山间小道上缓缓行走着，士气低落，人心涣散。一些意志薄弱者，受不了饥饿、劳累和疾病的折磨，畏缩了，动摇了，他们在岔道上悄悄溜走了。部队减员天天都在增加，眼看着这支铁军就有垮掉的危险。

危急关头，朱德挺身而出，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广东饶平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了形势与去向问题。他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出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他说：

“我们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到农民运动基础好的地方去，到那里去找个落脚点。这个地方就是三不管的湘粤赣边境。那里山高林密，便于同敌人打游击。”

朱德带着起义军从饶平出发，过了闽粤交界的柏嵩关，进入了福建的平和、永定、上杭，然后经武平、翻过武夷山，插入江西。

10 月下旬，起义军摆脱了尾追的敌军，来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

一天傍晚，朱德传下命令：

“全体军官在河坝子里集合，开会。”

夕阳刚刚隐没在山后，小河的流水缓缓地流淌着。

河滩的竹林边上，很快挤满了来自各个部队的军官。坐着的，躺着的，背靠背相互支撑着的，无精打采地议论着：一定有重要事情。

不一会，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走来了。朱德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背着一顶斗笠，一双破草鞋用绳子横七竖八地捆在脚上。他脸颊瘦削，胡子老长，双眼却炯炯有神，和蔼可亲。他慢慢走到人群中间，环顾一下，招招手，示意大家坐拢一些。人们起身挪动，向他靠拢。在这前途渺茫的严重时刻，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企盼着他回答：革命还有无希望？我们的出路在何方？

大家渐渐地安静下来，静的只剩下了小河的水声，哗，哗，哗地流淌着。

朱德望着这些同自己一道浴血奋战的同志，悲怆而又激愤地说：

“同志们，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革命的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要走下去，我们还是要革命的。”

朱德讲话的声音从低沉而逐渐激越，由激越而亢奋：

“同志们，要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想再革命的，可以回家去，绝不勉强。但是，武器必须留下，因为那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用那企盼的眼神看着大家，期待着每一个战友的回答。

整个河坝子又变成一片寂静，晚风吹动着竹林沙沙作响，河水哗哗流向远方。

起义军的军官们个个低头沉思，在人生旅途的十字路口上，用行动作出最后抉择：是去？是留？必须作出回答。

朱德洪亮的声音，打破了冻结一般的沉静。

“我希望大家不要走！我是不走的，陈毅、王尔琢也是不会走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他向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那慷慨激昂的声调越来越高，在山谷中回荡：

“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 1927 年的中国革命好比 1905 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 1905 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 1917 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只要我们认清革命前途，积蓄革命力量，不怕艰苦，不怕挫折，坚持斗争下去，中国也会有个‘1917 年’，胜利一定会到来。我劝同志们坚信这一点……”

这时，陈毅首先站出来，支持朱德。他说：

“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终究是会成功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的英雄，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的英雄。失败的英雄比胜利的英雄还要难当。我陈毅虽然没有多大的本事，但愿竭尽全力辅助朱军长，把我们这支队伍带出绝境，革命到底！”

朱德和陈毅这些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像一声声惊雷在人群爆炸，激起了阵阵掌声。沉闷了许久的起义军军官，立刻活跃起来，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却在高声发问：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去打游击嘛！”朱德朝发问的方向看了一眼，斩钉截铁般地回答说。

“这一带，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很有基础。我们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能伸展开来。”

“反动派天天在后面追赶，能站住脚吗？”有人又提出疑问。

“他们总有一天会不追的。封建军阀们是协调不起来的。不要多久，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只要大家团结一致，风雨同舟，就会开创新局面，取得新胜利。”

大家望着朱德，看他那样平易近人，有问必答，讲得通俗易懂，句句在理，就不断地向他提出问题：

“有枪，没有子弹怎么办？”

“给养怎解决？人总是要吃饭的？”

“伤病员怎么办？”

……

朱德仔细听着每个人的提问，耐心地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革命前途。会一直开了一个多小时。他那精辟的分析，深刻的讲话，令人信服，大家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浑身增添了力量。

骤然间，爆发出一个宏亮的声音：

“我跟朱军长走！”

顷刻之间，“跟朱军长走！”“跟朱军长革命到底！”的呼喊声在山谷间回荡着。

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革命终于胜利了。

有位将军，在 30 年后，向朱德问起这一段历史：

“听说，那时您是登高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才把这支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朱德非常谦虚地说：

“有那么回事。但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

大家风雨同舟，团结奋斗，才战胜千难万险，取得了胜利。”

濠头圩遇险

“叭！叭！”

两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小村的宁静，把布置完警戒任务刚刚躺下的朱德从睡梦中惊醒。

他从地铺上坐起，推了推身边的警卫员。叫道：

“有情况，快起来！”

一听有情况，警卫员从地铺上一跃而起，提着手枪就要冲出去。

朱德上前一把拉住他说：

“出不去了。你听四面都是枪声，还有人在敲祠堂的大门！我们被包围了。”

这时，敲门声和喊叫声越来越大，在静静的夜里听得清清楚楚。有人还在用脚踹门的同时，嗥叫着：

“现在不开门，等老子冲进去了，把你们都通通毙了！”

朱德是昨天傍晚带着五十多人的小分队来到濠头圩的，此行，他们肩负着从江西崇义去湖南汝城同范石生谈判联合反蒋的重任。

濠头圩，坐落在汝城境内的讴水江畔，是个群山环绕，树木葱郁的镇子。虽说只有三四十户人家，但是个南来北往的重要隘口，有条大路往北通桂东，往东就可到江西崇义。附近的乡亲们常来赶圩场，也就热闹起来。在圩场的北面有一棵三人合抱不住的苦楝树，树高数丈，枝叶茂密，浓荫盖地。这棵百年大树，是濠头历史的见证。大革命时期，濠头圩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风起云涌，农民协会的许多会都是在这棵大树下召开的。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疯狂报复，在这棵树上吊打农会的干部和赤卫队员，进行反攻倒算。苦楝树下，曾演出过许多悲壮而惊险的故事，濠头人民热爱共产党。

朱德进入濠头圩后，立即命令小分队布置岗哨，封锁消息，以免惊动了附近的土匪武装挨户团的何其朗。为了不惊扰百姓，小分队就在圩场外的一座祠堂里住下，他本人和警卫员就住在祠堂后院伙房旁的小屋里。

祠堂的大门终于被撞开了，“哗啦啦！”一下子冲进了一帮子土匪，吆五喝六地向后院冲来。这时，包围祠堂的土匪已爬上房顶，逃走和躲藏已来不及。朱德急中生智，对警卫员说：

“不要慌张，见机行事！”

他和警卫员两人侧身闪进紧挨着的伙房，把手枪塞进柴禾堆里，顺手拿起一条围裙系在腰上，正要往外走。

几个土匪冲了进来，用枪顶住他的胸口问道：

“朱德在哪里？快说！”

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这里面心有缘故？朱德不慌不忙，非常沉着地回答说：

“在后面嘛！”还用手指了指另一处院子。几个匪兵顺着所指方向一窝蜂地追去。可有个提着手枪的小头目满脸奸笑，仍很不放心地追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

朱德把双手的手掌在围裙上擦了擦，带着几分窘迫，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我？是个伙夫头。”

小头目借着明亮的火光，把他打量一番，只见他腰上围着条脏里吧叽的

破围裙，便骂了一声：

“从哪冒出来个做饭的？”

小头目左看右看，还是疑惑不解，又把他拉到油灯下，仔细瞧了一遍，见他胡子拉碴的足有五六十岁，一身破烂军衣补丁摞补丁像件“八卦衣”，也就信以为真了。一扭头，就又盘问起警卫员：

“你是干什么的？”

“我们俩同行，他是我的伙计。”朱德生怕警卫员露了馅，就抢先镇定自若地回答着，同时递了一个眼色。警卫员把手里提的布袋子抖动了一下。小头目立即警觉起来，便把枪对着警卫员，不怀好意地骂道：

“你小子还有枪？”

“没，我哪来的枪。”

“布袋里装的什么？”

“是几个……伙食钱，买米用的。”警卫员装着很不情愿讲出实情的样子想把布袋藏起来。

小头目一听是钱，眼睛一下亮了许多，伸手就想抢过来，不料警卫员攥得太紧了。争夺之中，布袋里的银元都滚落在地上。小头目一看是白花花的银元，怎能不爱？弯下腰就一块一块地去捡。就在这时，朱德装着帮着捡银元的样子，迅速从柴禾堆里取出手枪。“砰！”的一声，手起枪响，小头目脑袋开花，栽倒在地。朱德同警卫员打开后窗，纵身跳出，顺着枪声去找部队。

被打死的小头目，正是何其朗的小舅子朱龙奴。他是奉其姐夫之命，前来捕捉朱德的。原来，当朱德带着小分队路经濠头圩附近的白村时，走漏了消息，被伪乡长何曾智知道了。这时蒋介石悬赏通缉朱德的告示到处可见，他觉得这可是个领赏的机会，就给何其朗写了一封信送到苦竹坳。苦竹坳离濠头只二十多里，何其朗正带着二百挨户团驻在那里。

这天，何其朗正同他的姘头在屋里吸鸦片，腾云驾雾，正在兴头上，突然乡丁跑去报告说：“总爷，不好了……朱德来了……”何其朗一听朱德到了，吓得灵魂出窍，便说：“快，快撤！”乡丁慢慢才说清楚是朱德到了濠头，然后递上何曾智那封告密邀赏的信。

何其朗急忙打开，只见上面写着：“贤弟：今有共党朱德率部来濠，兵仅五十，夜宿祠堂，良机难逢，时不可失，望速派兵剿灭之”。何其朗便把这一能领赏的美差交给其小舅子朱龙奴，让他带着二百民团前往捕捉朱德。

这次遭到何其朗民团的偷袭，虽纯系偶然，但差一点酿成大祸。原来是小分队到濠头前，在白村就走漏了风声；到濠头宿营后，由于连续行军，一路上疲劳，困顿不堪。朱德在向濠头圩外派出警戒时，虽曾再三叮咛：“这里靠近惯匪何其朗的地盘，哨兵一定要提高警惕，夜里绝不能打盹！”但是，实在太疲劳的哨兵还是打盹了。何其朗的民团又多是当地人，熟门熟路。所以，一直摸到祠堂里，出现了前面那场惊险局面。

小分队冲出祠堂后，占据了濠头的制高点和通向汝城的路口。一看不见朱德，大家非常焦急，正准备再返回祠堂去营救时，圩场的南面杀出一股匪徒，“冲哇！杀哇！”怪叫着冲了过来；北面的敌人一听南面有枪声和喊杀声，也折转了回来。这时，正好朱德赶到，一看这正是一个调动敌人互相残杀的极好机会，便命令警卫员向南来的敌人扔了两颗手榴弹，他自己也向北面折回头来的敌人扔了一颗手榴弹。“轰！轰！轰！”手榴弹爆炸了，南北

两面的敌人都蒙在鼓里，在黑夜里也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果真厮杀起来。朱德趁机撤出圩场找到部队，在敌人的一片混战中，他和部队会合了。

匪徒们相互间对打了一阵后，才发现上当受骗了，是他们自己打自己。而朱德早已无影无踪。

天亮后，何其朗神气十足地赶来督战时，看到濠头的苦楝树下匪尸遍地，万万没有想到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当找到他的小舅子时，已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气得他直翻白眼，半天才哭出一句话来：

“这让我回去怎么交待呀！”

天亮了，东方出现了鱼肚白色，朱德带着他的小分队，告别了濠头圩，迎着黎明的曙光向汝城进发，去同范石生谈判联合。

蒋介石密令：逮捕朱德

11 月初，在赣南山区的深山密林里，晚霜晨雾，寒气逼人。

几天阴雨过后，天刚放晴。

衣衫单薄的起义军战士都挤在向阳处晒暖暖。

朱德和陈毅坐在门口的石阶上，一面晒太阳，一面翻阅着地下交通员从崇义城搞来的报纸。

那时候，起义军刚刚进行了上堡整训，精神面貌有很大改变，但是物质方面还十分困难，眼看严冬降临，吃穿都无着落。同外界也断了联系，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报纸。只能从敌人报纸的字里行间，看形势，看敌情。

陈毅拿着一张报，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

突然，朱德一拍大腿站起来了，抖着手中的报纸，叫道：

“好消息！有法子了。我说天无绝人之路嘛！你看，范石生就在我们旁边。”

陈毅被朱德的兴奋感染了，说：

“啥子好消息！让我看看。”

他一把从朱德手中抢过那张报纸，看见在地方要闻版上，有一条引人注目的大字标题消息：

“范石生军长率国民革命第十六军移防湖南郴州一带”。

朱德拍着陈毅的肩头，欣喜地说：

“找范石生去，有他的就有我的。枪支、弹药、吃饭、穿衣，样样都可以解决。”

陈毅嬉笑着说：

“别充壳子。你同他是啥子关系？他是堂堂的大军长，又不归你指挥！”

朱德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

“这就得慢慢道来！”

朱德向陈毅摆起龙门阵，细说范石生。

范石生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把兄弟，一起秘密参加了同盟会，一起参加昆明重九起义，一起追随蔡锷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后来，范石生成了滇军的高级将领，在广东讨伐陈炯明时，建立功勋，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颤”。中山先生非常倚重于他，委任他为滇军第二军军长，授予上将军衔。 1926 年，第二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范石生仍旧担任军长。但他同粤系、桂系军阀均有矛盾，而同蒋介石的矛盾更尖锐。斗转星移，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时，已不再是孙中山时代，而是蒋介石掌权。所以，范石生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很想找一个盟友，进可以同蒋介石抗衡，讨价还价；退可以杀回云南，重振滇军。近年来，这是一直困扰着范石生的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朱德刚讲到这里，陈毅就心直口快地说：

“我们做这个盟友，他一定欢迎！”

朱德点点头，说：

“我们党同范石生的友谊已很久了。那还是恩来同志亲自建立的。”

“还有此事？没有看出来，你这肚皮里装的东西还不少哩！快，快，别卖关子，来个竹筒倒豆子，全倒出来嘛！”

朱德又接着讲起中国共产党同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的经过。

那还是 1926 年，范石生的第二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时，周恩来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王懋庭，把一批经过训练的云南籍的共产党员派到了十六军，组成了政治部。“四·一二”以后，蒋介石下令“清党”，范石生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搁置不理。所以，十六军内一直保存着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当起义军南下时，周恩来还给朱德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同范石生部联络时，与十六军内的共产党组织接上关系。

于是，朱德与陈毅商定，由朱德亲笔写一信，通过地下党的交通员送给范石生，等待回音。

其实，当范石生得知起义军南下失利，朱德带着余部在赣南转战时，曾几次派人秘密寻访，只是没有找到朱德。

十天后，范石生派人给朱德送来复信，说：

“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曰唯（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处一晤。专此恭候。”

朱德看完来信，对陈毅说：

“范石生是一个有眼光、有胆识的人。你看这信上说‘鹿死谁手，仍未可知’，希望我们‘再起东山’。他都晓得这个道理，难怪中山先生把他誉为‘军中一范’。他比我们那些一碰到挫折就动摇的同志还看得远呀！”

陈毅仔细看过来信后，说：

“这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看，这个范石生，我们是找定了。”

这就坚定了朱德同范石生联系的信心。他同陈毅、王尔琢等几个领导干部一起又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同范石生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有利于起义军隐蔽目标，积蓄力量，待机发展。朱德还向全体党员讲明了同范石生合作的意义和目的，让大家讨论统一认识。

多数人认为同范石生合作，是保存革命力量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但是，也有人对同范石生合作，提出疑问：

“范石生是地道的军阀，军阀还能支持革命？”

“范石生人多势众，我们力量单薄，弄不好，就让他吃掉了。”

……

陈毅站出来向大家解释：

“革命，离不开主力军，这是基本队伍。但是，革命也需要有同盟军，要有朋友，不能孤军奋战。革命，人多好呢？还是人少好呢？我看还是人多点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嘛！至于范石生是不是军阀，自有公论，我们今天不去讨论。即便他是个军阀，今天他支持革命，就是我们的朋友；明天他反动了，反对革命，那就是我们的敌人。再说我们同范石生的合作是有原则的。我是支持同范石生合作的。”

大家的认识统一了，同意在原建制不变，保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同范石生合作。

朱德受党组织之委托，带了一个卫队，从崇义上堡出发，到汝城同曾曰唯谈判，提出三个条件：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叫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不得进行干涉。”

经过协商达成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起义军改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番号，隐蔽起来，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〇团团长（后又加委了十六军总参议）；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立即发放弹药、被装。

起义军用一四〇团的番号隐蔽起来后，就移防到广东韶关的犁铺头，开始了新的整训。

朱德同十六军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接上关系后，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军军委，陈毅为书记。

1928 年初，蒋介石得知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十六军里，非常恼火。他下令范石生，要立即解除起义军武装，逮捕朱德。同时，密令方鼎英部从湖南进入粤北，监视起义军与范石生的动向。

范石生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后，虽然惊恐，但他信守协议，不忘旧谊，立即写信，派秘书杨昌龄前往犁铺头，亲手交给朱德，劝他迅速离开。他在信上意味深长地说：“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朱德当机立断，撤出犁铺头，辗转北上，越过大瑶山，进入湖南，发动了湘南起义，最后把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智取宜章

三九隆冬，雪花飞扬。

大瑶山下的小山村杨家寨子，在寒风中格外冷清，屋外看不到一个人影。杨氏宗祠里却暖融融，热腾腾，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胡少海正围坐在一盆炭火旁，听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介绍情况。

朱德说：

“宜章的情况清楚了。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怎样把湘南暴动这把火，从宜章点起来。”

屋里静悄悄，大家相对无言，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胡少海，期待着他先打破这沉闷的气氛。

胡少海，又名胡鳌，出身宜章富户，兄弟多人，他为老五，乡邻们称他为“五少爷”。他从小上学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毅然背叛家庭，投身于民主革命，在东征军程潜部当过营长。“四·一二”后，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他受到怀疑和监视，便带领一部分湖南籍的士兵离开部队，躲到杨家寨子，以做贩马生意为掩护，领着一支农民武装打富济贫，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和中共宜章县委的杨子达、高静山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

胡少海沉思片刻，站起来说：

“报告军长，少海生在宜章，长在宜章，对宜章了如指掌。城里只有邝镜明的民团四五百人，都是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请军长给我两个连，保证冲进城去杀他个片甲不留！”

胡少海语惊四座，不少人对他这种主动请缨，敢打头阵的精神，十分钦佩，频频点头。

朱德对这个意见未置可否，但对胡少海这种敢于拼杀的作风十分欣赏，觉得这是位将才。他循循善诱道：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打仗，既要有勇，更要有谋。斗勇，又斗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湘南暴动的第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请大家都讲讲自己的看法。”

“宜章，是座石头城，易守难攻。硬攻，伤亡大；久攻不下，敌人就会来援救。关键是要迅速拿下宜章。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胡世俭这么一说，大家就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最好是‘引蛇出洞’，用小部队把敌人从城里引出来，然后消灭之。”

“急速进军，兵临城下，把宜章鼠个水泄不通，限期令其投降！”

“派一支小分队，扮成赴墟场的群众，混进城去，来个里应外合，把敌人一网打尽！”

个个献计献策，议论纷纷，各种招数都想到了。正在地上踱来踱去的朱德，听到这里，突然止步，环顾大家，说：

“同志们，宜章既然没有正规军设防，五百民团是群乌合之众，杀鸡焉用牛刀？依我看不必强攻，可以智取。”

“智取”之议一出，大家都惊呆了，都用惊奇的眼光企盼着朱德讲下去。他不慌不忙扳着指头，一连讲了四个有利条件：

“一是军阀正在混战，蒋介石和唐生智还在湖北酣战，湘南地区敌人力

量较弱；二是正值年关，地主豪绅催租、逼债，同贫苦农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三是我们的部队经过休整和补充，战斗力大大提高；四是胡少海未参加本乡本土的公开斗争，身份没有暴露……”

话音未落，陈毅就站起来了，拍手叫好：

“要得，军长说宜章不必强攻，可以智取。这个办法要得！”然后，走到胡少海身旁，拍着他的肩头，风趣地说：

“这一回，我看是要借重你五少爷的大名和胆量喽！可不是让你去冲锋陷阵！”

陈毅的风趣与幽默，引出了全屋欢笑。

“对头！还是陈毅同志最知我意。我们这出戏，就叫‘智取宜章’，请少海同志来唱主角！”

胡少海这时已明白了几分，当即起立，表示：

“少海不才，若有可用之处，任由军长调遣，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一个智取宜章的方案定下来了。

1月10日凌晨，胡少海以一四○团团副的名义，带着两连经过挑选的人马，直奔宜章。县长杨孝斌等闻讯，出城迎接，打恭作揖，嘴里念念有词：

“胡团副荣归故里，名在乡样，功在党国。本县守土无方，还望海涵！”

胡少海入城后，当即布告全城：

“本团奉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范军长之命，进驻宜章，扼守城池……”

同时，给朱德送出一封密信：

“弟平安抵达，盼兄如期归来，阖家团圆，辞旧迎新，共度佳节。少海手书。”暗示一切顺利，可按原计划进行。

第二天，正午过后，朱德假称“王团长”，带着部队，人不下鞍，兵不血刃，在一片欢呼声中，开进了宜章。

原计划以宴请各界为名，将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在酒席宴上一网打尽。杨孝斌死活不同意，说什么不能反主为宾，为各位老总接风洗尘是理所当然。

朱德对胡少海说：

“这也好。我们就来个顺水推舟，借水行船吧！”

傍晚，县参议会的伦明堂里，灯火通明，席间杯觥交错，好不热闹。新上任不久的县太爷杨孝斌举起酒杯，在众人面前绕了一圈，说：

“各位，请举起杯来，陪王团长干了这一杯！”

在座的各界头面人物，举起杯子，一阵劝酒词：

“王团长，劳苦功高！”

“王团长，为民造福！”

“祝王团长官运亨通！”

“王团长……”

这时，传出一声长叫：

“鱼，来啦——！”跟随着声音，大厅里闪进一个头包蓝包头巾的“堂倌”。他左手托着一个红木托盘来到桌前。只见一条尺把长的鲤鱼放在一个硕大的银盘里。这是行动的信号。

突然间，朱德起立，举杯掷地。随着一声“咣啷！”门外立即闯入十个战士，个个拔出手枪，虎目圆睁，把宴席团团围住。那帮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哪见过这种阵势，一看枪口对着自己，早已魂不附体。

朱德一拍桌子，厉声宣布：

“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威作福，糟蹋乡里，反对革命，屠杀工农，十恶不赦，是劳苦大众的罪人。现在，把你们通通抓起来，听候公审！”

在同一时间里，陈毅、王尔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决了团防局、警察局，俘虏了四百多人，缴获枪支三百多支。

朱德提出的智取宜章的计划如期实现，为湘南暴动拉开了序幕。

金蝉脱壳

1928 年 2 月 10 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从郴州出发，浩浩荡荡向耒阳挺进。敌人望风而逃，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

工农革命军一靠近来阳附近的罐子场，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股敌人。还没有弄清是哪路“好汉”，就接上了火。敌人虽然不多，但火力很强。他们先放枪，后打炮，猛向工农革命军轰了一阵子。朱德一看来者不善，一面派人去四处侦察敌情，一面组织部队反击，运用左右包抄的战术，很快就把敌人打垮，攻占了罐子场。

罐子场，是湘粤大道旁的一个镇子。镇子上，除了一条两里长的大街外，还有几条自然形成的街道，住着百十户人家，是个不小的圩场。农历初一、十五逢圩时，还很热闹。传说，在很久以前，这里因为出产陶罐而远近闻名，所以就叫罐子场，后来又叫罐子街。当今，已改名为冠市街了。

从俘虏口中得知，原来拥护汪精卫的唐生智被效忠蒋介石的李宗仁打败了。李宗仁手下的大将白崇禧已经带着部队打到了衡阳。刚才那一股敌人正是白崇禧的部队。

战斗结束后，部队开进罐子场。朱德传下命令：

“各部队加强警戒，抓紧休息。在天黑前，镇上只留下一个小分队，其余全部撤到后面山上，隐蔽待机。”

命令下达后，下面议论纷纷：

“刚打进来，还没住下，为啥又要撤走？”

“敌人被打跑了，我们打了胜仗，还撤出去干什么？”

“不如在这里美美睡上一觉，天亮了再撤也不迟。”

……

官兵们不解其义。打垮了敌人，打了胜仗，还要撤退，实在想不通。放着房子不住，却要到荒郊野外去露宿，更觉得有些“晦气”。

军令如山。大家都知道朱军长从来是说一不二的。何况工农革命军有着严格的纪律。所以，意见归意见，命令还得执行。

工农革命军的主力刚刚撤到后山隐蔽下来，白崇禧的部队就反扑回来了。从东面慢慢搜索着，摸进了罐子场。偶尔放上两枪，搞点火力侦察，但进展的速度很慢。

朱德得知敌人来报复了，果然未出所料。他传下命令，一定要拖住敌人，等待战机。潜伏在罐子场里的小分队，有的在房顶上。有的在街巷里，奉命不准还击，一枪未发。敌人眼看无人还击，胆子就越来越大。先是猫着腰，提着枪，搜索前进，到后来干脆大摇大摆地走向罐子场。

也真凑巧。唐生智的得力干将何键的队伍，也不知从哪得到了消息，说朱德要攻打耒阳和衡阳，大队人马已经开到了罐子场。他们就急匆匆地从西面赶来，想拣占便宜，快到罐子场时，听到前面有稀疏的枪声，更是坚信无疑了，认定是工农革命军和民团打了起来。但是，何健部队的那些当官的，都知道朱德带的这支部队可不一般，正是当年北伐军中赫赫有名的铁军“叶挺独立团”，因此没敢轻举妄动，冒冒失失冲进罐子场去。他们呆在镇子外面，一面打冷枪，一面观动静，等待时机。

侦察员回来向朱德报告说：

“西面也来了一股敌人，进到罐子场外面就停下来不动了。”

情况有变化，出现了新的转机。朱德原想趁白崇禧的部队回来报复时，杀他个回马枪，打他个措手不及，没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既然情况变了，敌变我变，朱德胸中另有妙计。他对身边的参谋说：

“不要着急。西边的敌人不动是暂时的，他们贼心不死，终究会动的。这是由不得他们的。”

朱德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战机，不能错过，便立即同几个参谋商量之后，向小分队下达了撤出的命令。

小分队按照命令，在撤离之前，向东西两股敌人进行了猛烈射击，“噼哩啪啦”打得敌人不知所措。当敌人开始还击后，小分队便立即偃旗息鼓，迅速撤出战斗，向后山的主力部队靠拢。

罐子场的上空，升起滚滚硝烟，夜幕徐徐落下。

小分队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撤出了罐子场，无一伤亡，而东西两股敌人却拚杀起来。在黑暗中，他们都把对手当成了工农革命军，都想捞点便宜，好向上司领赏。

工农革命军站在高高的山顶上，看着罐子场上空火光冲天，都拍手欢呼朱军长的“金蝉脱壳”计实在妙。

枪声炮声在那无边的黑夜里，直响到天明，在罐子场交战的双方死伤过半。在激烈的巷战中，借着黎明的光亮，双方才弄清了，他们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

工农革命军迎着东方的曙光上路了。他们是去攻打耒阳城。

里应外合克耒阳

“朱德带着队伍出了郴州，在永兴的马田过了三天三夜！啊哟哟，真格的，兵强马壮！当兵的齐刷刷地一般高，背的都是乌黑发亮的快枪！”

“闹农运的人，都跟着朱德回来了。永兴县放哨的挨户团，口喊检查，声音都打颤，脚杆都发抖，生怕碰上朱德派来的探子！”

好几天来，都风传着朱德要带着工农革命军打耒阳，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

贪官污吏最怕听到暴动的消息，又想听到，听到了又胆颤心惊，真是惊恐万状。

驻耒阳的国民党军的正规部队已撤回衡阳，县长大人也早开溜了，连国民党的《湖南民国日报》也毫不掩饰地刊出赫赫标题：“防军开退，县长失踪！”惊恐之状跃然纸上。

耒阳城里，来不及逃走的官吏和豪绅，就在这时扯起一面“维持委员会”的破旗，梦想维持残局，度过难关。

耒阳县挨户团的常备队有三百多人，由队长章家梅带着，驻守在城南的桌子坳一带，占据有利地形，妄图负隅顽抗。挨户团总局的副主任王旷萱，把耒阳城的四门紧闭起来，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

耒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军事要冲，上接衡阳，下通郴州，为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耒阳，可溯湘江而上，那是“一舟之便”，快当得很。既可监视南来之敌，又可巩固郴州、宜章，还可进图安仁、茶陵、永兴，资兴等各县。所以，在工农革命军占领郴州之后，朱德就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重视耒阳，当即下令，日夜兼程，挺进耒阳。

“耒阳，必须拿下！耒阳，必须迅速拿下，这是革命的需要！”朱德的命令，变成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动。

2 月 15 日，朱德带着工农革命军进入了耒阳的公平圩。

当晚，在圩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场上热闹非常，四乡的农民群众扶老携幼，打着灯笼火把来参加大会。朱军长在会上发出号召：

“农民弟兄们，我们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专打土豪劣绅和反动派的，是来支持大家起来暴动的。……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分田地，实现土地革命。欢迎大家参加工农革命军！”话音刚落，当场就站出四五十名青年农民，要求参加工农革命军。

21 日凌晨，工农革命军顶着晨雾，占领了灶头街。

朱德听取了耒阳县委的汇报，详细了解了耒阳敌人的布防情况，大家各抒己见，好多同志都主张迅速进军，一举夺下。他们说：

“耒阳，基本上没有多少敌人，可说是座空城，容易攻下。”

朱德再三考虑后，说：

“俗话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是用兵之道。我看这次打耒阳，既不用宜章的智取，也不用坪石的猛打穷追。根据耒阳的具体情况，换一种打法，就叫里应外合吧！”接着，他就讲了自己的具体作战方案。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负责歼灭正面桌子坳一带的守敌挨户团常备队，同时，派出一个加强连配合农民武装攻打耒阳城。担负攻城的部队，按照部署，夜间秘密运动到耒阳城外，在茂密的树林里隐蔽起来，待机发动进攻。

耒阳县委的邓宗海、刘泰等带着十几个农军，身藏短枪，装扮成农民，

次日凌晨，挑着蔬菜、柴草、猪肉、鸡鸭，佯装赶圩场，骗过团丁的盘查，从北门混进城去。

行动之前，朱德对参加会议的干部们再三叮咛：

“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部队与农军要紧密配合，发挥各自的特长，迅速拿下耒阳，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他特别对部队的干部强调：

“回去要很好地向攻城部队动员。战斗中，对于顽抗的敌人，要坚决消灭；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要坚决保护。耒阳是座古城，有不少名胜古迹，我们要倍加爱护。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祖先，才对得起我们的后代。我们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你们知道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啥子？”

大家面面相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弄不清朱军长在战前动员的此时此刻，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突然间，有人回答说：

“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

“对头！讲得特别正确。你们可知道那个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经验，造出了‘蔡伦纸’的蔡伦吗？相传，他就是耒阳人呀！据说如今耒阳城里还有蔡公祠、蔡伦墓和蔡伦当年造纸用的‘蔡伦池’呢！”耒阳还有大诗人杜甫的杜公祠……这些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伟大创造精神的文物古迹，一定要倍加保护！”

在场的人被朱德的博学多才和远见卓识震惊了，个个传递着叹服和钦佩的眼神。

这时，几位生在耒阳长在耒阳的县委领导人，听朱德谈起耒阳的名胜古迹如数家珍，再也按捺不住敬佩之情，不停地鼓起掌来。

“要得，耒阳的同志首先支持我的意见了。希望大家认真保护祖先留下来的文物古迹！”

这句风趣而又意味深长的话，引来了满堂的朗朗笑声。

东方微明，攻城行动开始，一切都按预定计划进行得很顺利。进攻突击部队隐蔽在城外的树林里，监视着敌人的动静。化装后的农军，一个个闯过了团丁贼眉鼠眼的盘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北门。

骤然间，“叭！叭！叭！”三声枪响，击破寂静的长空。这是化装进城的农军，在城内同志的配合下，解决了北门哨兵的信号。

枪声传来，埋伏在城外树林里的工农革命军战士和农军，一跃而起，潮水般地涌来。这支队伍有三千多人。他们端着步枪，挥着大刀，举着长矛，架着水机关枪，抬着两尊大炮，呐喊着杀向耒阳城。

攻城的队伍兵分两路，一路顺着汽车路冲向西门，一路冲向北门，很快消灭了负隅顽抗的团丁，当场击毙了县维持会的主任王曾奎，打开牢门，救出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亲属。

天亮前后，朱德带着工农革命军的主力部队，向驻守在城南桌子坳的挨户团常备队发起猛烈攻击。开始，敌人还想顽抗，疯狂地向进攻部队射击，后来看到城里已火光冲天，知道事情不妙，老窝被抄了，就再无心恋战，立即抱头鼠窜。工农革命军在朱德的指挥下，一举攻下桌子坳。挨户团的常备队长章家梅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渡过耒水，退缩到耒衡边界的新市街去了。

攻下耒阳的这一天，正是阳光普照的艳阳天。耒阳城里家家户户挂起红旗，男女老幼涌向街头，奔向大路，从西马路到灶头街，八里长的大路两旁站满了人，欢迎工农革命军。

中午时分，工农革命军在朱德的带领下，排成三路纵队，在一片口号声和鞭炮声中，浩浩荡荡开进了耒阳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部就设在耒阳城里西正街的邓家祠堂里。

第二天上午，耒阳县委在城隍庙里召开了群众欢迎大会。城乡的农民都自愿参加，比过年赶庙会还要热闹。耒阳县委书记邓宗海致欢迎词后，朱德军长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开始讲话，他首先赞扬了耒阳人民的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接着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他说：

“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正在混战。趁着这帮强盗打架，互相揪住辫子不松手的时候，我们发动了湘南暴动，组织和武装了工农群众，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宜章、郴州的暴动已取得了胜利。现在，耒阳的暴动也胜利了。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仅仅是湘南暴动的一个开端，而郴州、耒阳的胜利，却把湘南暴动推向了高潮，暴动的烈火就要燃遍湘南大地，反动派在湘南就要完蛋了！”

朱德的讲话，引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会场上，立即响起了口号声：

“暴动，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暴动，肃清一切贪官污吏！”

“暴动，打土豪，分田地！”

“暴动，组织苏维埃政府！”

朱德接着讲话：

“是的，我们要迅速建立苏维埃政府，实现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发展人民武装，来保卫我们暴动的胜利果实！”

2 月 19 日，耒阳县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刘泰任主席，徐鹤、李树一任副主席，钟森荣任秘书长。苏维埃政府设置了军事、财政、土地、肃反、青年五个委员会。第二天，在城西金盆塘的大草坪上，召开了耒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井冈山会师

革命雄师会井冈，
集中力量更坚强。
红军领导提高后，
五破围攻固战场。

这是朱德为纪念井冈山会师写下的不朽诗篇。

井冈山会师是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里。

讲起井冈山，人们就怀念那火红的岁月。

1928 年春天，朱德、陈毅点燃的湘南起义的烈火，燃遍了湘南大地，有 7 个县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就在广大的工农群众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突然乌云翻滚，湘南起义的一派大好形势，被湖南省委“左”的乱烧乱杀政策断送了。一部分群众产生了恐惧心理，远离了革命。恰巧，这时粤、桂、湘三省军阀之间狗咬狗的战争，也刚刚结束，他们勾结起来，扼杀革命，从南、北、西三面对湘南地区实行联合“会剿”。

在这十分严峻的形势下，朱德当机立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决定除留下部分地方武装，在湘南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和新建的农军都撤出湘南，向井冈山转移，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毛泽东会合，实现武装割据。

其实，这两支革命部队早有联系。1927 年 10 月，朱德带着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赣南千里转战寻找“落脚点”的途中，到了信丰后，赣南特委派人联络时，说毛委员带着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朱德知道后就非常兴奋地说：“我们去找毛委员！”11 月间，朱德率部在江西崇义山区的上堡整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敌人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井冈山一带活动的消息，证实毛泽东确实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

朱德拿着报纸对陈毅说：

“我们去找毛泽东，他确实在井冈山上！”

“要找毛泽东，有一个人去联系最合适。”陈毅说。

“谁？”

“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覃就在我们这里。”陈毅说。

当时，朱德就决定派原在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覃，装扮成十六军的副官，通过敌人的防区，上井冈山去找毛泽东。毛泽覃日夜兼程，巧妙地通过敌人岗哨的盘查，终于在宁冈茅坪见到了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在朱德率领下转战赣南的情况以及两支部队联系的意向。毛泽东决定派出专人去同朱德联系，欢迎两支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敌人。就在此时，张子清、伍中豪带着秋收起义部队的第三营，在江西上饶一带游击时，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了，向朱德介绍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和井冈山的有关情况。不久，毛泽东派何长工下山，向湖南省委汇报工作，结果几经周折，在广东韶关的犁铺头找到了朱德。朱德详细地询问了井冈山的地形、群众基础和部队情况，并问到能否屯兵，是否有利于防守等等。临别时，朱德说：

“今后，我们这两支部队要经常联系，将来要集中起来，力量就更大了！”

1928 年 3 月上旬，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到井冈山，贯彻执行临时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宣布中央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现任省委委员”的处分；取消前委，成立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并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湘南暴动。毛泽东下山后，没有直去湘南，在湖南酃县中村待命，一面就地整训部队，一面发动群众；同时，派毛泽覃带着特务连去湘南同朱德联络。

到了 3 月下旬，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协剿军”的夹击，在湘南难以立足时，便决定接应和掩护湘南起义部队撤退，兵分两路，赶赴湘南。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向桂东、汝城前进；命令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向彭公庙、资兴前进。

朱德于 3 月底在湖南耒阳完成了转移准备后，率领湘南起义部队的主力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新成立的第四师及宋乔生领导的水口山工人武装，在毛泽覃带领的特务连的接应下，4 月上旬经安仁、茶陵到达了酃县的沔渡。

陈毅在郴州接到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后，立即组织湘南各县的党政机关和湘南农军转移，在资兴与袁文才，何长工所率的第二团会合。

4 月中旬，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主力一部和湘南农军第三师、第七师以及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第二团到达了酃县的沔渡，与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大家欢天喜地，受到很大的鼓舞。第二天，何长工就按毛泽东的指示，带着第二团先期回到井冈山地区，筹办两军会师的有关事宜。

久久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24 日前后，朱德、陈毅率领着湘南起义军主力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湘南农军一万余人，来到江西宁冈的龙市。不久，毛泽东在酃县一带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朱德率部上山后，也回到龙市。

朱德和陈毅听说毛泽东要回来，早已等候在龙江书院。当毛泽东来到时，他们迎出门外。毛泽东走近龙江书院时，早把手伸了出来；朱德也抢前几步，同样伸出手来，他们紧紧握在一起。

毛泽东以祝贺的口吻说：

“这次湘赣两省的敌人竟然没有整倒你们，不易啊！”

朱德非常激动地说：

“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掩护了！”

毛泽东说：

“咱们原本就是一家人嘛！”

在场的陈毅、王尔琢、何长工等都热烈握手，互致问候。

第二天，在龙江书院的文星阁召开了两支部队的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会议讨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及人事安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决定在纪念“五四运动”9 周年的时候，在龙市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的胜利会师。接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四军军委，军委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 23 人组成，毛泽东当选为军委书记。

5 月 4 日，山明水秀的龙市，格外热闹。天刚亮，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涌向龙市。会场就设在龙江边的沙洲上，几十只木桶和门板搭起的主席台上，还有用竹竿和蓆子撑起的凉篷。主席台的两边挂着许多彩旗和标语。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会场，宁冈、遂川、永新、酃县等地的农民群众，扛着梭标，举着红旗和标语小旗，川流不息地走进会场，兴高彩烈地来参加庆祝

会师大会。欢声笑语，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上午 10 时左右，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和根据地党政军各方面的代表登上主席台，陈毅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列队站在主席台前的几十名司号员，一同奏起庄严的军乐。这时，鞭炮齐鸣，不绝于耳。

在会上，陈毅首先宣布两军汇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为朱德，党代表为毛泽东，参谋长为王尔琢。

接着，就请朱德讲话。他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走到主席台前，说：

“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胜利会师，意味着中国武装革命的新起点。参加这次庆祝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吧。我们不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不仅让他们难过，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后，我们的力量大多了，又有井冈山作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特别提出，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他还向人民群众保证，工农革命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利益。他那满怀信心和幽默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毛泽东讲话时，指出了这次会师的历史意义，同时非常乐观地分析了会师后的光明前途，他说：

“我们的军队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还不如敌人，但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专打那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有短，荷花出水有高有低，敌人也有强有弱，兵力分布也难保有不周全的地方。抓住了敌人的弱点狠狠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到敌人的背后去‘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的讲话，非常风趣，大家听得轻松愉快，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他代表四军军委宣布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四军参谋长王尔琢讲了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各方面的代表，也在大会上相继讲了话，大家都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域新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名义”。从此，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井冈山会师，使毛泽东、朱德分别领导的两支具有北伐战争光荣传统的起义部队聚集在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全盛时期，对红军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找败江西两只“羊”

江西的敌人连续几次发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剿”，屡遭失败，但并不甘心。到了 1928 年 6 月中旬，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四次“进剿”。

这次“进剿”，朱培德调集了第九师和第二十七师共 5 个团的兵力，以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以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因为这两个作恶多端的师长都姓杨，江西老俵就称他们为两只“羊”。他们原来都是滇军，后来投靠了蒋介石。部队装备好，受过正规训练，战斗力较强。杨池生的师里有个团长叫李文彬，极其狡猾，打起仗来还真有些套套，也不好对付。

为了配合江西发动的这次“进剿”，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严令之下，湘军吴尚的第八军也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一个师向攸县、茶陵逼进，威胁着井冈山根据地的西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朱德首先下令红军撤出永新城，集结于宁冈休整，伺机歼敌。随后，在宁冈茅坪召开军事会议，分析敌情，讨论对策，最后定下了“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作战方针，决定集中兵力对付赣军杨池生和杨如轩部，对湘军吴尚部则取守势。而在第一阶段，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向西出击湖南酃县。这样，既可牵制湘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又能引诱赣军出击，达到“引蛇出洞”之目的，便于红军调转头来歼灭之。为此，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军主力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二十九团，西征酃县；袁文才、王佐带领第三十二团留守根据地，密切监视赣军的动向。

会后，毛泽东带着第三十一团从茅坪出发，经大陇进入了酃县的沔渡、十都；朱德、陈毅率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由茅坪的西南方向进入酃县的十都，同第三十一团会合后，一举击溃了湘军吴尚的一个团，迅速占领了酃县城。

红军主力出击湖南，攻占了酃县的消息传出后，杨池生和杨如轩高兴得拍手叫好，认为好运来了，立即下令向井冈山根据地进攻。

杨如轩上次在草市坳打了败仗，不仅丢掉了永新城，自己还差一点送了小命。这次“进剿”，朱培德就让杨池生当了总指挥，为了照顾他的面子，给了个前线总指挥的名义。他是又气又恼又害怕，战战兢兢地上了前线，带着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和第九师的一个团，企图经老七溪岭或新七溪岭进入宁冈。杨池生带着九师的另外两个团守在永新城里，或进或退，等待形势的发展。

七溪岭，是横卧在永新与宁冈之间的一座高山峻岭，山势险要，树木茂密，山道狭窄。高山顶上有两个可以通过的口子，一个是自古就有的，一个新开的，就是老七溪岭和新七溪岭。它是从永新到宁冈的必经之地。

杨如轩在白口设立了前线指挥部后，就亲自带着两团人马，向老七溪岭进发；另一路的一个团是杨池生的部队，由团长李文彬指挥，由龙源口向新七溪岭前进。他们认为采用这种“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根据地推进，那是稳操胜券。

红军得到敌人从永新出动的消息之后，便立刻回师宁冈。

6 月 22 日，在宁冈新城由陈毅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详细研究了歼敌计划。

会上，围绕着打不打和怎样打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的人认为杨

池生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多为老兵；我们红军武器低劣，新兵多，条件差，难以取胜，主张后撤。而大多数人认为红军有利条件多，战士觉悟高，很勇敢，两次打败杨如轩占了永新城，士气高昂；在根据地作战，以逸待劳，又有广大群众支持。而敌人是劳师远征，长途行军，已疲惫不堪，又屡遭红军和游击队的打击，士气低落。这是关系到根据地能否存亡的一仗，应该坚决打好。最后，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打敌人正面；一路打敌人背后。”

朱德说：“因为新七溪岭是杨池生的主力，由我带着二十九团去截击敌人。由陈毅、王尔琢率领二十八团打主攻，出击老七溪岭敌人的后背。”当年，杨池生、杨如轩在滇军里都是朱德的部下，他们有多大本事，能吃几碗干饭，朱德是了如指掌。

23 日，朱德带着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赶到新七溪岭，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杨池生部的李文彬团；陈毅、王尔琢带着二十八团，赶往老七溪岭，迎击杨如轩的两个团；袁文才带着三十二团一部和永新赤卫大队，从武功潭一带侧击敌人。

新七溪岭，是当时永新经龙源口通往宁冈的主要通道，山高路险，山上还有一些工事。

第二十九团在团长胡少海的带领下，遵照朱德的命令，首先抢占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望月亭一带。当赣军在李文彬带领下，向新七溪岭的制高点冲来时，遭到红军的猛烈轰击，未能得手。但赣军不死心，凭着他们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不断发起攻击，逐渐占了优势，抢占了红军的前沿阵地风车口。

后来，红军第三十一团一营赶来增援，仍未能扭转局势。山头在一个一个争夺，阵地在一寸一寸地丢失，眼看着敌人潮水般地涌向望月亭时，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喊声：

“坚决把敌人顶回去，决不能让他们前进一步！”

随着这一声呐喊，只见朱德军长提着一挺花机关（冲锋枪的一种），带着 3 个警卫员从望月亭上冲下来。他一到阵地前沿，端起花机关，对准风车口的敌人就猛烈扫射起来。

俗话说“兵随将领，草随风”，红军战士在朱军长的大无畏的精神鼓舞下，勇气倍增，个个奋勇当先，从阵地上跃起，奋不顾身地冲向敌群，枪声和杀声震天。敌人顶不住了，一窝蜂似地向山下跑去。

朱军长大喝一声：

“冲啊，夺回风车口！”

敌人已溃不成军，只知逃命，已无抵抗的能力。短短的几分钟后，红军就夺回了风车口。

在老七溪岭方向，杨如轩带着他的第二十五团和第二十六团，一大早就发起攻击，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百步墩。红军第二十八团因为距老七溪岭较远，赶到时已处于不利地形。他们在王尔琢的指挥之下，多次发起攻击，都未奏效。

这时，赣军的大部队已经赶到，居高临下，向第二十八团压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王尔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第三营营长肖劲带队，从部队中抽调班、排长和共产党员组成“敢死队”，趁敌人中午休息时发起攻击，经过几次猛扑，终于占领了制高点，夺下了百步亭，接着一阵猛打猛冲，不给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一直把敌人赶回龙源口一带。只可惜三营营长肖劲

牺牲了。

正在新七溪岭上鏖战的杨池生，从望远镜里看到老七溪岭上红旗招展，本来已慌了手脚，突然又得到杨如轩溃逃的消息，更加心神不定，准备退走。

朱德已看出敌人企图逃跑的征候，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一营，向杨池生的李文彬团发起进攻。红军呐喊着，像怒涛像海潮涌向山下，李文彬已无法招架，便带着部队奔向龙源口，打算夺路而逃。

就在这个当口，埋伏在武功潭一带的第三十二团和永新赤卫大队，在袁文才带领下，趁势袭击了设在白口的杨如轩的前线指挥部。杨如轩一看大势已去，匆匆爬上马背，向永新城里逃去，路上又被流弹击伤。

朱德带着新七溪岭上的第二十九团，乘胜追击，在龙源口会同第二十八团，把敌人团团围住。这时，埋伏在附近的近千名地方武装，也摇旗呐喊，投入战斗。赣军腹背受敌，军心瓦解，全线崩溃。龙源口一仗，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获步枪 400 支，重机枪 1 挺，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龙源口战斗，是井冈山时期最大的一次战斗，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红军乘胜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他的第四次“进剿”。

永新地区的群众在欢庆龙源口大捷时，还编了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

朱毛会师在井冈，
红军力量坚又强。
不费红军三分力，
打败江西两只“羊”。

鏖战赣南

1929 年 1 月，蒋介石下令纠集了湘、赣两省六个旅三万多人，从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等地，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

1 月 4 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在宁冈的柏露村召开了有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各地方组织及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共六十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在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接着，详细讨论了如何对付湘赣两省的第三次“会剿”。经过权衡各方面的利害之后，前委决定红五军留下守山，红四军由朱德、毛泽东带领向赣南发展。

红四军主力为什么要选择赣南为出击的方向呢？因为这里有许多有利条件：地域广阔，境内山峦起伏，井同粤北、闽西相连，红军有较大的回旋余地；物产丰富，可以供给部队足够的给养；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而且交通不便，敌人调动和集结都有相当困难；大革命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对这个地区有较大影响，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这些有利条件，对红军在这个地区活动和发展都会起很大作用。

1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共三千六百多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纡洲出发，向赣南出击。何键得知红军出动的消息后，立刻从“会剿”红军的五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四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截，并尾追红军南下。

红军边打边走，一路闯关过隘，经大汾、左安、崇义到了大余。为了筹集给养停了 3 天，不料赣敌李文彬赶来紧追不放。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匆忙地撤出大余。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朱德军长带着特务营营长毕占云亲自殿后，全军才较为安全地撤向广东南雄县境内的乌迳集合。

在乌迳却又遇到了一次极大的险情。

红军到达乌迳时，天快黑了，夜幕徐徐落下，连续的战斗和行军，部队非常疲劳，很快就宿营休息了。大家都在平坝上露营，晚 9 时许，敌人来了，红军还未觉察到。总以为敌人也十分疲劳，不会再来追赶红军的。

正在敌人准备进攻的时候，党的地方组织派去的侦察员把敌人正准备突然袭击红军消息送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红军立即惊起，摆脱了敌人。事后，朱德说：

“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持，那一次我们就被敌人搞垮了！”

红四军离开乌迳后，又折入了江西信丰，经安远进入了赣粤闽边界的寻邬县境内。

一天，部队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又遭到敌人一次突然袭击。但最惊险的还是向罗福嶂开进时，敌人距离红军有十多公里。红军一个急行军，拚命向前赶，一天走六十公里，结果敌人还是追了上来。凌晨，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当时，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是二十八团的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了，把毛泽东、朱德和军部直属机关都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带着机关先撤出来了，朱德留在后面被打散。他身边只有五个冲锋枪手跟着。

敌人一看到有背冲锋枪的，认定这里面必有大官，穷追不舍，越追越近，朱德一看这种局面，一下难以摆脱敌人，便心生一计，将几个人分成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向西，好吸引敌人分散开。他只身带着一个警卫员冲脱了敌人的尾追。

红军战士们到了圣公堂休息时，听说朱军长失散了，大家万分焦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因为从南昌起义到湘南起义，一直到三打永新，军长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下午，朱军长回来了，部队一片欢腾，士气一下高涨起来。但是，这次遭敌突然袭击，红军损失很大，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牺牲，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在掩护朱德和军部撤退时受伤被俘，受尽残酷折磨后，2 月 12 日在赣州英勇就义。

红军脱离险境之后，立刻冒着大雪，翻过了几座大山后到达了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罗福嶂。这里地势十分险要，只要堵住路口，就是有几百人也莫想冲上去。

离开罗福嶂后，红军本来想北上会昌，后来得知国民党军队正在那里集结，便改变主意插向福建的武平。追赶的敌人一看进入了福建，已经不是自己的地盘，何况他们也很疲劳，很需要休息一下。

哪知，红军在福建的边上拐了个弯，又扭头插向江西的瑞金，趁势打下瑞金城，很快就又撤了出来。在瑞金城外，二十八团被优势的敌人团团围住，局势十分危急。

在这种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朱德对大家说：

“前面有敌人阻拦我们，后面又有敌人追击我们，我们还能往哪里去？要是贪生怕死，那就等敌人来缴枪投降，屈膝求饶；要是愿意为人民去死，那就干一仗，把敌人消灭掉！”讲完后，他对四面的敌情进行了周密的观察，发现敌军已经合围，没有一点空隙。

“全团一个方向！”朱德斩钉截铁地说：

“一营跟着我中间突破，二营、三营左右配合，全团上刺刀！”大家心里都明白，军长要带着大家同敌人拼杀了。话音一落，他举着驳壳枪带头冲向敌群。经过一番生死搏斗，二十八团终于冲出重围，同三十一团会合，开到了瑞金城北二十里外的大柏地一带，准备在此伏击追赶红军的刘士毅部。

除夕之夜，红四军主力在朱德、毛泽东的率领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到了大柏地。这时追赶红军的刘士毅部还一直紧跟在红军后面，仅差一天路程。

大柏地，位于瑞金的北面，是瑞金通往宁都的必经之路，从麻子坳到分水坳，是个有一华里长的谷地，地形十分险要。谷地两边是起伏的山岭，遍布着茂密的森林，便于隐蔽设伏，是个极为有利的歼敌地带。

朱德根据红四军干部会议的决定，巧妙安排，兵分三路，布成口袋阵，准备歼灭刘士毅部。他让主力部队分别埋伏在左右两面山上，然后，以一营红军在隘口警戒，扮作掉队的“散兵游勇”，挑着担子，背着枪，坐在石板大道的两旁休息，待看到尾随而来的敌人之后，放上枪就跑，一直把敌人引进伏击地带。

一切布置停当，引敌人上钩的那些红军战士，坐在大道两旁，左等右等，也不见人影，直等到太阳落山，也没有一点动静，大家有点急躁。

这时，朱德传下话来：

“钓鱼，就得有耐心。大家都要沉住气，不信敌人不上钩。”

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人们都在家里欢欢乐乐过年，而红军战士却静悄悄地在那里等待着敌人，等待着胜利的到来。

天公也不作美。那天，却下起了毛毛雨。下了一阵后，雨停了，又刮起了风；风停了，又下起了毛毛雨。隐蔽在树丛中的战士，个个都是衣服湿了，

被风吹干了；干了，又被雨淋湿了。老天不帮忙，时间还过得特别慢。

下午三时多，敌人果然来了。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隘口，好像步入了无人之地。当敌人发现大道旁有红军的零散人员时，确认他们都是些散兵游勇，便立即开枪射击，担负诱敌深入的那些红军战士，一看敌人上钩了，打心眼里高兴，一边鸣枪还击，一边喊叫着朝前跑去。

刘士毅的部队追了几天都没看到红军的影子，今天好不容易见到了红军，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紧追不舍。一瞬间，敌人的大队人马都涌进了谷地，进入了红军的包围圈。

朱德下令开火。埋伏在两面山上的红军，在一片杀声中，冲向敌群。走在敌人队伍前面的刘士毅，一看形势不妙，知道中了红军的埋伏，立即拨转马头，向来路逃去，扔下他那两个团也不管了。

被红军围住的敌人，这时发了疯似的，拚命向红军冲杀，妄想打开一个缺口，冲出一条生路。敌人把十几挺轻、重机枪都调来，集中在一起向红军坚守的一个山头猛烈射击。子弹像蝗虫一般乱飞，树叶子被打光了，树枝被打断了。但是，红军战士毫无畏惧，他们依托着简单的掩体，阻击着敌人。

朱德军长像座金刚似的站在他们身后，用钢铁般的语言鼓励着战士：

“同志们，坚决把敌人打回去！没有子弹，就用枪托砸，用石头打，决不让敌人跑掉！”

敌人攻了一阵，攻不动，又退下去了。红军从背后包抄敌人的部队，已经打了过来，两面山上的红军一齐冲向坳中的大道，敌人乱作一团，到处逃窜，纷纷逃命。

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分被红军歼灭，他的两个团长萧致平、钟桓也被活捉，另外还有 800 名俘虏，缴获重机枪 6 挺，步枪数百支。

大柏地的胜利，是红四军自井冈山下山以来，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彻底扭转了红军在赣南的被动局面，红四军士气大振。

陈毅说：“大柏地之战是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

大柏地战斗，是朱德指挥红军利用地形以少胜多的一个范例。

1933 春，毛泽东从宁都回瑞金，重过大柏地时，感慨万千，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著名的《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破宁都

一位跟随朱老总南征北战的老将军讲过一个朱德破宁都的故事，十分动人。

那是 1929 年 4 月，红四军在于都开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去，红四军在赣南实行短距离分兵后发生的事情。当时，蒋桂战争正在进行，反动军队忙于厮杀，赣南出现了空虚。红四军抓住“分兵以发动群众”的大好时机，兵分三路：一路到兴国县城，一路到兴国的古龙岗，一路在于都附近。

一天，朱德根据侦察的敌情得知宁都城里只有赖世琮的一个团。赖世琮是国民党新军阀赖世璜的弟弟。他自信根底深后台硬，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在宁都一带也是个小小“土皇帝”。2 月间，红四军大部队进军赣南，途经宁都时，在大柏地消灭了刘士毅的两个团，他望风而逃。红军走后，他窜回宁都便大兴土木，加固城池。为了壮胆，在东西城墙上，各置了一尊 200 斤重的铜炮，在南北城墙上，各置了一尊 300 斤重的铁炮。他看着宁都城的高墙壁垒和四尊大炮，好不得意，气壮如牛地说：

“我倒想看看梭标、乌铳怎打开铜墙铁壁？”

朱军长从情报中得知：赖世琮除加高城墙，安置土炮外，还在四大城门的门洞里安上闸门，填了一米厚的沙包。扬言要同红军较量较量，决一雌雄。

朱军长说：

“龟儿子，有种。不怕你死守，就怕你逃走！”朱军长决定运用“三十六计”中的“无中生有”之计，摆下迷惑阵，来破宁都城。

4 月 24 日黄昏，从于都开来的赣南第二十五纵队奉命赶到宁都城外。他们按照朱军长的命令带着当地的游击队和群众，分别在东门外的孙公岭，西门外的蓟背岭，南门外的寺背岭，北门外的张屋山安营扎寨，点亮通明的火把，树起一杆杆红旗，在同一个时辰里，突然间杀声震天，枪声四起，呐喊声，冲杀声由远渐近，枪炮声一阵更比一阵紧。整个宁都像被千军万马围困。

敌人的探子接连不断地向赖世琮报告：

“孙公岭上下来了红军！”

“南门外的枪声很紧！”

“枪子已落到西门城墙上了！”

……

赖世琮惊慌失措，一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一面派人转移他抢劫来的钱财。他把队伍和民团都驱赶到城墙上，防备红军夜间攻城。

第二天拂晓前，呐喊声停了，枪声也停了，能听到的只有蛙声和虫声。一切如常，好像昨晚上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一样。

一夜没有合眼的赖世琮觉得这事有些奇怪，壮着胆子爬上城头，睁着两只大眼东张西望看了半天，也没看到红军的影子，心里更犯嘀咕。

太阳一落山，夜幕刚刚降下，昨天夜里的情景又出现了。枪声更紧，喊声更大，赖世琮胆战心惊地发下命令：

“哪里有枪声就向哪打枪！哪里有喊声就向哪开炮！”

士兵们躲在城墙垛口的后面，头也不抬地拼命朝四面八方乱打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折腾了一夜。赖世琮又是一夜没有敢睡。

天亮时，城外一切如常，仍然是蛙鼓蝉鸣，一片太平景象。

赖世琮摸不清虚实，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这两天只听见枪响，不见来攻城，到底红军同谁打起来了？他坐卧不安，六神无主，搞不清红军摆的是什么阵。他怎会知道，这是朱军长摆得迷惑阵。那些密集的机枪声，是在煤油桶里放鞭炮合成的。

第三天，当夜幕徐徐落下时，赖世琮更加烦躁不安，担心这一夜又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竖着耳朵等待着枪声，却偏偏没有枪声，城里静悄悄的，除了蛙鼓蝉鸣，再没有一点声音。这时，赖世琮才松了一口气，以为红军是来吓唬他的，肯定是打了两天空枪，没捞到什么便撤走了。他满以为可以睡个好觉了。

没料到午夜刚过，除东门外，南门、西门、北门方向，都又响起了枪炮声。与前两天不同的是在间隙中，不断传来喊话声：

“白军士兵兄弟们，你们也是受苦人，不要给赖世琮卖命送死！”

“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

“红军优待俘虏！想回家的还发给路费！”

赖世琮从梦中惊醒，命令他的部队去迎战红军：

“给老子都上城墙上去。谁也不能打瞌睡！”

“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城外！”

等敌人登上城墙时，城外的枪声突然停止，既看不到红军的影子，也听不到枪声。

赖世琮为了弄清城外的情况，花了 12 块大洋雇了一个赌徒，用绳索从城墙上吊下来，为他去探听虚实。

第二天，那个赌徒回来报告说：

“团长大人，这几天闹腾的根本不是红军，都是些泥腿子游击队！”

赖世琮半信半疑，放心不下，一直惦记着抢劫来的财物和银元，便吩咐亲信找来十几个民夫，偷偷把财物和银元运回石城老家去。

半夜里，宁都城里的党组织派温连奎从城东云石垛那条通向梅江的涵洞爬出来，向红军指挥部报告了城内的敌情。

打打停停，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经过几天对赖世琮的骚扰和迷惑，攻打宁都的时机已经成熟。朱军长于 29 日拂晓下了攻击令。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红四军一纵队和二纵队已分别从兴国和于都赶到了宁都城外的集结地，进入了进攻位置。

攻击令一下，霎时间，城西魁星阁前燃起了熊熊大火，城北蔡家祠也烈焰翻滚，宁都城外的四乡八巷一片枪炮声和呐喊声，探子慌忙来报告说：

“不好了，攻城的不是游击队，是朱毛红军！”

“胡说八道，你怎知道是红军？”赖世琮气急败坏地发问。

“他们穿戴整齐，军服都是一色新，个个背着铮亮的钢枪！”

赖世琮一听是这种装备，真是红军到了。这时，他早魂飞天外，半天只说了一句话：

“一定要顶住，决不能让他们打进城来！”

红军主力在西门和北门首先发起进攻，赖世琮就调兵加强西门和北门的防守。进攻东门和南门的红军一看赖世琮把兵力调走，火力减弱，便领着游击队员背着柴草冲向东城门，然后浇上火油点燃，熊熊大火的火苗窜进城门洞，烧向城楼。赖世琮又急忙从西门调兵支援东城门。敌人顾此失彼，一片混乱。赖世琮也搞不清红军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只能靠着放枪壮胆。很

快城墙上的弹药不够了，赖世琮下令把弹药库的子弹箱子都搬出来，准备大打一场。

士兵们打开子弹箱子一看，个个眉笑颜开，尽是些白花花的银元，就嚷嚷开了：

“团长老爷，对弟兄们不薄，关键时刻就动真个的了！”

“要早发银元，我早就为团长卖命了！”

说话中，就动手抢开了。银元这东西又不咬手，眨眼工夫一抢而空。

原来是两天前，赖世琮往老家石城转移财物和银元时，地下党的同志施了个“调包计”，把装银元的箱子换成了装子弹的箱子挑走了。

这时，红军在火力的掩护下，已经爬上城西和城北的城墙，进入城内，扒开了城门。

在一片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大队红军和地方武装以及游击队，高喊着杀声，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向宁都城。城里的敌人早已乱成一团，到处躲藏逃命。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他们全当了红军的俘虏。赖世琮看到走投无路，正换上便装准备逃遁时，红军战士已冲到他的“后天宫”，从他小老婆的床底下把他拖了出来。

红四军一纵队和二纵队在朱军长指挥下，大破宁都，全歼守敌赖世琮一个团。

朱军长带着军部进入宁都城后，就让把赖世琮押来审问：

“你就是因为有 30 个小老婆而出名的赖世琮？”朱军长很严肃地问道。

“报告长官，是的。不是，不是不是，是不敢。该死！我该死！”赖世琮已吓得像筛糠一样，回起话来，语无伦次。

“你可知道我是谁？”

“报告长官，我有眼无珠，实在不认得。”

“我就是你要把头割下来挂在城楼上的朱德！”

赖世琮听到“朱德”二字，脑袋嗡的一声，如雷轰顶，吓得魂不附体，双腿一软跪在地上，直喊：

“我该死！我该死！”

朱军长不动声色地说：

“赖世琮，你听着！论罪孽，你该立即枪毙！现在，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就看你走不走！”

“走，走。长官只要饶命，让我干啥都可以！”

“限你三天之内，把藏在石城老家的枪支、银元送到宁都。这里还有一张药单子，你尽快备齐送来。东西交齐后，放你回家。要是耍花招，打折扣，当心你的小命！”

“是，是！一定照办！”赖世琮连连点头答应。

赖世琮写好一封亲笔信，派他一名亲信副官连夜送到石城老家。果然，他的大老婆坐着一顶轿子带着一帮人马，把枪支、银元如期送到宁都城。

3 个月后，赖世琮家里又把药品如数送到。朱军长信守诺言，开了一张通行证，把赖世琮放了。释放前，朱军长还对赖世琮说：

“希望你改恶从善，不要与人民为敌。如果继续残害百姓，攻打红军，下次再捉到你，就不这么便宜了！”

赖世琮虽然满口应承决不再打红军。但他本性难移，回去后继续与红军为敌。最终，还是被红军在瑞金的黄柏击毙，落了个可耻下场。

攻占上杭

上杭，位于闽西汀江的中游，汀江绕城而过，城垣三面环水。上杭的城墙十分坚固，下部为石，上部为砖，尤其沿江的城墙多为巨石作基。城高三丈有余，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上杭是闽西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将石宗国，当年曾率数万大军围攻上杭，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仍然是久攻不下。所以，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

铁打上杭，固苦金汤。
东无退路，西无战场，
南有河道，北有池塘。
嘱咐子孙，莫打上杭！

1929 年，上杭城里盘踞着土著军阀卢新铭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那是 1928 年，卢新铭在长岭寨被红军打败后，才逃到这里，招兵买马，占据了上杭城。

为了打破敌人的三省“会剿”，发展闽西的大好形势，必须消灭卢新铭，攻下上杭。9 月 18 日，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和闽西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秘密向上杭运动。

在前委会上，朱德作了周密部署。会议结束时，他特别强调：

“要千方百计迅速同城内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全力策动有关人员响应攻城。各地赤卫队也要积极配合攻城战斗。”

19 日下午，朱德带着各纵队的领导和参谋人员，登上树木葱郁的山头，在落日的余晖中，俯视着山下坚固的城池，仔细地观察了地形，制定了攻城的具体方案。

上杭只有一条路可以从陆上通往城里，那就是通往西门的大道。卢新铭作贼心虚，当长汀、龙岩等被红军相继夺取后，就怕红军攻打上杭。他为了守住上杭，在西门筑起了坚固的工事，城门每天在白天只开几个小时，还有重兵把守，以防万一。其它几座城门，全部关闭，用沙袋堵死，以防红军攻破。

卢新铭预料红军是不攻则已，要攻必是西门。朱德就来了个将计就计，命令一纵队佯攻西门。他对一纵队的林彪说：

“声东击西，是兵家常用战术，这次我们也不例外，只不过不是声东击西，是声西击东罢了。你们在那排山头上，摆上几门迫击炮，照西门放上几炮，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时，我们就可以从后面登城进攻了。”

红四军的主力部队，趁夜间能见度低，由赤卫队带路，从汀江上游水浅处渡过汀江。

按照朱德的部署，一纵队佯攻上杭西门，二、三纵队主攻北门，四纵队在赤卫队的配合下，攻取东门，还有一部分赤卫队员们佯攻南门。

战斗打响后，四面枪声大作。敌人还蒙在鼓里，也弄不清哪是红军的主攻方向。赤卫队乘着无数的竹筏划过汀江，首先用机枪和土炮轰击敌人，然后在洋铁筒里燃放鞭炮，噼哩啪啦，搅得敌人也分不清真假，只顾调兵遣将，扼守城池。刹那间，四面城墙上到处放枪，为他们自己壮胆。

一纵队按照朱德的命令，用炮火把敌人的主力一下吸引到了西门。二、

三纵队便开始在北门发起攻击。红军战士在一阵阵冲锋号的鼓舞下，迅速扑向城下，赤卫队员们抬着预先绑好的云梯，赶到城下，一座座云梯陡然架起，红军战士呼喊着爬上云梯，翻入城内：涌向街头。

卢新铭发现自己中了红军声东击西之计，调兵增援时，北门早已被突破。城门大开，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蜂拥而上。

朱德带着胜利的微笑，紧跟在红军和赤卫队之后，进入上杭城。卢新铭带着十几个贴身警卫已逃之夭夭。

攻占了“铁上杭”，不仅粉碎了敌人的三省“会剿”，而且还为红军迎来了一个休整机会。红四军迅速壮大，全军发展到七千多人。

在素有民歌之乡的上杭城里，又传唱出一首新的《上杭之歌》：

一要高举红旗团结好，
二要袖章挂臂上，
三要消灭反动派，
四要从地主手中夺取枪。

人民大众要记清，
打倒军阀卢新铭，
俘虏敌兵要待好，
他们也是穷苦人。

进了上杭莫把商人扰，
保护穷人要记牢，
捉住地主狗豺狼，
坚决斗争不能饶。
……

巧取中川

这是发生在 1929 年深秋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天清晨，风和日丽。

在闽西永定县金丰大山的脚下，有 5 个砍柴人，提着砍柴刀，挎着绳索，踏着露水走在山间小道上。

满山碧绿，郁郁葱葱，秋雨过后，一眼苍翠，江山如画。透过轻纱般的薄雾看去，那是几个妇女，每人都披着一块花头巾，走在前面的那个戴的花头巾是红底白花，格外鲜艳耀眼，就像一只大蝴蝶飞舞在万花丛中。她边走边唱，微微的秋风带着那牵魂动魄的山歌，在满山飘荡：

山歌勿唱心勿开，
大路勿行上青苔；
脚踏青苔滑滑跌，
为了心肝妹才来！

这里是闽粤边境的山歌之乡，男女老少都爱唱山歌，山歌伴着他们劳动，山歌伴着他们生活。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时常用山歌传递爱情，用山歌来倾述着想往。

歌声唤醒了山川，歌声击破了沉静。

“为了心肝妹才来”荡漾在大山中。

山顶的隘口上有一座民团的碉堡，有三个团丁在防守着。他们一听到悠扬的歌声，一下来了精气神，心里痒得难受，丢下机枪，走出碉堡，阴阳怪气地抢着对起歌来：

白糖好食潮州来，
泉水好饮石缝来；
哥是白糖妹是水，
若是有情上前来！

三个团丁唱着向山下走去，心想顺着歌声去找那会唱歌的妹子。

就在披花头巾的砍柴妹子同团丁的唱和中，另外四个砍柴人悄悄穿过丛林，迅速爬上山顶，猝不及防地将三个团丁摔倒在地。这时，他们才如梦初醒，知道是红军到了。

山顶上，在绿树丛中舞起一面红旗，埋伏在山下的红军战士，一看到红旗，就知道奇袭成功了，立即吹起了冲锋号。

红四军军长朱德举起驳壳枪，带着部队冲出竹林，登上旗鼓山。在四处埋伏的赤卫队员扛着土铳，举着梭标、大刀，潮水般地涌向山头。

原来这是朱德军长为了消灭霸占四方的民团头子胡道南，巧取中川的第一步棋。

中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面有旗山、鼓山，西面有梨子岭，在村头的山上还修了不少钢骨水泥的明碉暗堡。胡道南凭着这些有利地形和他的兵工厂，称霸四方。

昨天，朱德召集了解情况的赤卫队员，研究了半夜攻打中川的计划。他采纳了赤卫队员们的意见，制订了一个巧取中川的妙计。那五个唱着山歌上山砍柴的妇女，原来是五名男扮女装的红军战士。

胡道南发觉被红军和赤卫队包围后，先是把他的部下大骂了一顿，然后像疯狗一样地吼叫着：

“弟兄们，给我好好打，打胜了，每人赏大洋 50 块！谁要是把红军放进来，到那时我胡道南，就是亲娘老子也不认，非宰了他不可！”

民团的机枪响了，子弹像雨点般地落下来，封锁了大小路口。

朱德命令正面攻击的红军停止还击，让司号吹号，调后山的赤卫队员进攻。

“哒嘀嘀，嘀哒哒！”嘹亮的号音响起，埋伏在旗鼓山后面的赤卫队员们“冲啊！杀啊！”呐喊起来，枪声四起。

胡道南一听山后枪声大作，喊声雷动，一下慌了手脚，高喊着：

“坏事了，后山上来了红军！他们是来抄我的后路来了！”他调转头又去指挥民团向后山射击。

后山上，民团的机枪一响，朱德笑了。他知道胡道南又中了一计。接着，他让一些赤卫队员分散到四面的小山头上去放冷枪，再次迷惑敌人。

一前一后，四面八方，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红军，把胡道南打得懵头转向，弄不清红军的主力在哪里，便下令民团拼命向旗鼓二山射击。其实，民团根本没有看到红军的人影，团总下令打枪，他们也只好借着打枪为自己壮壮胆，反正团总有兵工厂，能造子弹。

开始，红军还用土铳还击两下，后来索性也不放了。山上山下都平静下来，炮声没有了，枪声也没有了，一切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胡道南得意起来：

“红军败退了！弟兄们打得好！明天给你们发赏，打牙祭！”

没有多久，胡道南发现红军根本没有撤退。这时，他才知道又中计了，白白消耗了许多子弹。他气急败坏地下令说：

“谁也不准再打枪！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新招！”

胡道南呆在山头上，东看看，西望望，显得非常得意。

这时，西山上突然有赤卫队员叫阵了：

“民团贼子！我们等你好久了，怎不敢出来呀！”

“胡道南，你要是你娘养的，有胆量就过来比个高低！”

胡道南是一个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恶棍，几声叫骂，他就沉不住气了，暴跳如雷地吼道：

“跟老子杀出去，决一胜负！”

他带着一支人马扑向西山。

从旗鼓山脚下向西山进攻，就必须跨过狮象坝水口的清水潭大道。这是中川村的中心地带，山的左边像只昂首翘望的雄狮盘踞在那里，右旁如一只大象伫立在那里，所以人们称之为狮象坝。中间有一条弯曲的小溪流过，地形十分险要，离西山只有二百多米。

朱德从望远镜里看清胡道南已经下山，十分高兴地说：

“敌人终于出洞了，看来这胡道南也真是个不知死活的武夫，一个‘激将法’，他就上钩了！”朱德立即指挥红军把狮象坝水口团团围住，单等胡道南的到来。

胡道南带着一帮人马，憋着一肚子气，一路上大呼小叫，杀气腾腾地冲

进了红军的包围圈里。军号吹响了，在嘹亮而激昂的冲锋号声中，红军战士奋勇当先，杀声震天，子弹从四面八方飞向敌群。被围住的民团，就像一群被打散了的鸭子、叽哩哇啦地叫着，到处乱窜。

胡道南见势不妙，知道自己中了计，自投罗网，钻进了红军的包围圈，便丢下他的部下，调转头偷偷地顺着小道逃命去了。

朱德指挥着红军和赤卫队打下了中川，拔掉了闽西苏区边上这颗钉子，老百姓都拍手称快。胜利消息传出之后，群众还编了一首新歌谣，到处传唱：

铁打朱毛军，
巧取中川村，
攻下兵工厂，
团兵逃广东。
……

借道长征

提起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人们也许并不陌生。但讲到红军长征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向陈济棠借道的事，就鲜为人知了。而在这一事件中，朱德所起的作用，对广大读者来说就更不清楚了。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33 年夏天，蒋介石在美、英、德、意、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了百万大军，亲自担任总司令，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而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有 50 万。蒋介石采取了堡垒主义方针和步步为营、四面合围的战略。委任顾祝伺为北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9 月间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

陈济棠，早年跟随邓铿参加国民革命，后来成为广东地方的实力派，号称“南天王”，曾有“广东是陈济棠之广东”的民谚。陈济棠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历来很深，他曾三次公开反蒋。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虽然封他为南路军总司令，但他深知蒋介石其人，是绝不会信任他，也绝不会放过他的。蒋介石惯用的伎俩是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借刀杀人，强行改编，陈济棠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既想防堵红军进入粤、桂，又不愿为蒋介石用来借刀杀人，更怕蒋介石乘机由赣入粤，抢夺了他的地盘，达到其一箭双雕之目的。在进退维谷的形势下，他思想上矛盾重重。他明白是闽赣地区的红军拖住了蒋介石的主力，隔断了蒋军从江南进取广东之路，所以他才能偏安一时。如果自己与红军作战，那是风险太大，凶多吉少，一棋不慎，就会损伤元气，丢掉地盘。要是按兵不动维持现在这种各方对峙的态势，红军留在闽赣地区，他和蒋介石之间就有个缓冲地带。谋划得当，既可保住实力，又可在广东偏安无事。当然，他又怕蒋介石翻脸不认人。所以，对“围剿”之事还得应付。这样，陈济棠一度举棋不定，“进剿”红军的行动迟缓。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从瑞金到会昌，对粤赣边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写下了《清平乐·会昌》，称赞当时粤赣边的大好形势是：“风景这边独好”。

1934 年 4 月间，敌人攻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门户广昌。5 月间，南方战线的陈济棠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之下，攻占了筠门岭后，便同蒋介石玩起了阳奉阴违的手法，对红军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他一面虚张声势，慌报要进攻会昌，摆出一副要打的架势；另一面却派出他的高级参谋杨幼敏到筠门岭，向红军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犯的谈判。蒋介石已觉察到陈济棠怀有二心，虽怒斥他是“借寇自重”，但忙于对红军的“围剿”，对他也奈何不得。

一月前，中国共产党已公开发表了《告民众书》，号召一切真心愿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们，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性别，联合在反帝统一战线内，一致抗日。这一倡议，赢得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

6 月，毛泽东、朱德联合发出《告白军官兵书》，号召白军的广大官兵：“不要打红军”，“实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联盟，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7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表示在

三个条件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在这种形势之下，陈济棠急于同红军取得联系，派人到处找关系，千方百计找到了正在广州作生意的罗炳辉的内弟，要他担当同红军联系的中间人。9 月间，又秘密派李君到瑞金，提出要同红军联络谈判停战和共同反蒋事宜，受到了朱德和周恩来的热情接待。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讨论了形势和共同反蒋的办法。9 月 27 日，陈济棠授意驻筠门岭的第二纵队第七师给红军发电：“为适应环境应付时局，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对于同陈济棠的谈判，虽然秦邦宪和李德等表示怀疑，并不热心。但是，朱德和周恩来却很重视，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进行了认真准备，挑选了适合的代表，研究了谈判方案，并交换了通讯专用密码、联络地点和办法。开始，陈济棠要红军代表去广州，由于时局紧张，我方建议谈判地点改在寻邬。陈济棠派出的代表是他的心腹杨幼敏、李宗盛和黄延桢。七师师长黄延桢就驻在筠门岭，他同陈济棠的关系极深，很受信任。所以，黄延桢就成了与红军联络的代表，也是谈判的代表之一。

为了能迅速打开谈判的局面，9 月底，朱德还亲自起草了一封给陈济棠的复信，交来人带回，同意派代表去筠门岭谈判。信中说：

“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无耻。华北大好河山，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已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

信中还向陈济棠提出了谈判协商的五条：“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邬、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部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信中还要陈济棠“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最后表明：“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间之电话。”

10 月 1 日 13 时，陈济棠通过筠门岭的第七师给我方来电，建议先行会商军事问题，并催促我方“迅速派出军事负责代表去广州面商”。朱德、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选派 1933 年夏天从上海进入苏区，当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潘健行（潘仅年）和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二人为代表，约定了电台的通讯代号，对方代号为 KSD，为确保通讯联络无误，还调来了钱壮飞、伍云甫等老无线电工作者为译电员。当天，周恩来起草了复电，催促对方迅速对朱德的去信给予答复，并建议我方派代表至筠门岭经该师转商一切。对方收到这一电报之后，答复同意在寻邬会谈。

周恩来立即召集潘汉年、何长工到瑞全交待任务说：

“这是中央给你们的任务，望你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当时，在场的叶剑英也再三叮咛：“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很有益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周恩来为了保证我方代表安全护送过境， 10 月 5 日作了具体妥善安

排。为介绍潘汉年、何长工去谈判，他还代朱德给陈济棠的第七师师长黄延桢写了一封短信：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希予接洽并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10 月 6 日，红军派出送信的侦察班长到了筠门岭，正好第七师的师长黄延桢和他的参谋长都在那里，当面答复第二天一定派人到白铺以北去接红军代表。

深夜，红军的侦察班长返回营，向周昆和黄甦汇报了情况。7 日零点 20 分，周、黄发电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红军同陈济棠的谈判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双方都只有少数人知道，黄甦就曾在周恩来 10 月 5 日的来电上批注：“此电除我和两个译电员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得看。”对方也十分注意保密。潘汉年、何长工到达筠门岭赤白交界处的羊角附近时，天色已晚。前来迎接的是个特务连，连长一见何长工就悄悄地说：“何先生，我听过你们的宣传，也看过你们的宣传品。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

为了保密，对方特地为谈判代表准备了几顶四人抬的轿子。每过一道关卡有岗哨盘查时，那位连长就高声吼道：“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把他们呵令回去，生怕走漏了风声。代表们一路畅行无阻，赶了 40 里山路，到了寻邬县境的一个小山村罗塘镇，在一幢崭新的小洋楼前停下。小楼四周环境十分幽静，戒备森严，是个十分安全的住处。潘汉年、何长工安排在楼上，对方的谈判代表就住在楼下。

第二天，秘密谈判就在小楼上开始了，双方代表各抒己见，经过三天三夜的长谈，终于达成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继续协商共同抗蒋计划。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互相通商，解除对盐、布的封锁。

（四）支援红军一部分军火，并同意予以代购。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通知，陈部撤离 40 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这是长征前夕，红军继 1933 年 11 月同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签订停战协定后，又一次达成的重要停战协定。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又一重大胜利。

谈判期间，潘汉年、何长工突然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暗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意思是红军已开始战略转移，望他们尽快结束谈判返回根据地）。当时，对方的谈判代表杨幼敏拿着这份电报后，非常诡谲地问何长

工：“你们是否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非常平静地回答说：“不是。鸽子象征着和平，这是祝贺我们谈判成功。”但是，杨幼敏并不相信这种解释。

谈判一结束，潘汉年、何长工立即离开寻邬、速返会昌。陈济棠仍派出一个骑兵连护送到筠门岭以北。

这时，中央军委机关已从瑞金转移到于都，周恩来特地派人在会昌等谈判代表归来，并留下一封短信，说：“我在于都等你们。”他们赶到干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十分满意地说：“你们辛苦了。这次谈判取得的成果，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将对红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起重大作用。”

10 月 16 日，陈济棠第七师的代表向我方转达了陈济棠的两项决定：(一）暂时拨给红军弹药 10 万发；（二）盐、布准予放行。要红军设法从筠门岭转运到苏区。同时，要求我方迅速订出反蒋的整个军事计划。当时，中央红军已开始转移，陈济棠的这两项决定由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电告了周恩来。

10 月中旬，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突围的企图之后，多次下令陈济棠阻截红军，说红军突围决不是战术动作，而是战略转移；也不是南侵广东，而是突围西进。要求陈济棠大胆堵截红军。这时，陈济棠既不敢公开反对蒋介石，又怕红军真的进入广东，占了他的地盘。所以，就在第一道封锁线上，以其第二纵队李扬敬部驻守在会昌一带，派其第七师师长黄延桢坐镇筠门岭，以阻止我军南下广东。以其第一纵队余汉谋部驻守赣州、信丰和安远之间。声言这是一道“钢铁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围西征时，根据同陈济棠达成的“互相借道”的协议，红军总部一面派人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通过，希望他按照双方协议放行；一面于 10 月 20 日，下达了突围命令，命令部队在信丰的新坡、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围。

当陈济棠得知中央红军突围时，即令李扬敬纵队撤回粤境，余汉谋纵队稍加抵抗，即从版石、新田、古坡、韩坊全线总撤退，没有过多地堵截红军，却让出一条 40 里的通道。所以，中央红军未经大的激烈战斗就突破了安远、信丰之间的封锁线。25 日，红军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桃江），从南康、大余的边缘地区进入了广东境内。

当时，传闻红军付给了陈济棠 5 万大洋的买路钱，才顺利通过了第一道封锁，那完全是无稽之谈。而真实情况正是由于在朱德、周恩来的策划下，红军同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取得了成功，才建立起反蒋统一战线，因此，红军不仅突破了蒋介石的“围剿”，打破了封锁，而且还得到了陈济棠的援助，在开始长征时较为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化险为夷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贵州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原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楼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实际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使红军转危为安，战胜了千难万险，完成了长征，走上了新的征途。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周归结为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着重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

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说：

“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依靠一个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人来瞎指挥，丢掉了全部根据地，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给革命造成了多大的困难，真叫人痛心！如果再这样领导下去，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了！”

与会者对朱德的慷慨陈词，都肃然起敬。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平时从不发火训人的谦和长者，此时，在大是大非面前，如此态度坚决，毫不含糊，字字千钧，震撼人心。

正是由于床德等同志坚持了原则；维护了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决定撤销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了“三人团”，仍由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受党的委托，是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议，还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中，他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正确领导。这是在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危急时刻，作出的关键性的抉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敌变我变。红军进占遵义城后，蒋介石才醒过梦来，发现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已经改变，于是，命令薛岳等部以重兵逼进黔北。因此，遵义会议上改变了黎平会议原拟定在黔北创建新苏区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北或西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红军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地区开进，准备北渡长江。左纵队是三军团，由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从懒板凳、遵义出发；中路为中央军委纵队，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直接率领，从遵义城出发；右纵队为一、九军团，由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率领，从松坎出发；五军团由董振堂、李卓然率领，从娄山关地区出发，三路大军分头向西北方向开拔。

1 月 24 日，右纵队红一军团进占上城后，继续向赤水县推进。

土城，是赤水河畔的二个大镇子。几十户人家沿河而居，青一色的木板房错落有致地依山临水建造，一条石板路直通到河边，整个小镇宛如一条游龙从山顶蜿蜒而下，一头扎入赤水河，年年月月无休无止地吮吸着河水中的玉液琼浆。这里是川黔边境商贾的集散之地，川盐用木船从四川自贡一带运到这里上岸，然后再从陆路转销在黜北山区。土城算得上是赤水河上的一个

小码头。

27 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军委进人土城。后面有一股敌人也跟踪而至，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认为不过是几团黔军的“双枪将”（每人一支步枪、一支鸦片枪）而已。当晚，决定利用土城以东两山夹峙的峡谷地带有利地形，歼灭这股尾追而来的敌人，估计敌人有两个团，约两三千人。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正在附近伪彭德怀，要他统一指挥三、五军团去歼灭这股敌人。

第二天凌晨 5 时，战斗打响。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较大战果，而敌人不仅没有溃逃的迹象，而且越战越强。直到中午时分，得到情报说，同红军交手的敌人，根本不是黔军的“双枪将”，而是川军刘湘的“模范师”，师长就是外号叫“熊猫”的郭勋祺。此人打起仗来习惯拼到底，骄傲蛮横。敌人的兵力，不是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四个团。后来，才弄清楚敌人实际上是六个团，总人数万余人。而且川军的增援部队还不断涌来，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比黔军强得多。川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对红军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盘踞在土城对面青岗坡高地上的川军，在战斗打响后不久，就分三路抢占了韩棚坳、猫猫岩、凤凰嘴、银盆顶等高地，与靠土城一线的红军形成对峙状态。当红军浴血奋战，一鼓作气拿下银盆顶，乘胜追击，把川军压到韩棚坳时，川军的增援部队赶到，立刻使红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三、五军团与川军鏖战半日，伤亡越来越大。川军倚仗优势兵力，突破五军团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顶不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

这是红军在长征中，继湘江战役之后的又一次大战。红军的命运危在旦夕。这一仗打好了，就能打乱蒋介石的整个部署，保证红军安全渡过赤水河。一盘棋就走活了。如若不然，红军就可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去指挥战斗。

朱德要上前线，震动了大家。

毛泽东不仅知道这副担子的分量，更懂得让红军总司令亲临第一线指挥，万一有个好歹如何向全军交待？迟迟下不了决心，他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吸着，来回踱步，一声不吭。

朱德有点等不及了，把帽子一甩，豪爽地说：

“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危。只要能挽救红军，区区一个朱德又有何惜？”

“你是总司令，安全问题还得考虑。再说那子弹又不长眼睛……”毛泽东还没说完，朱德就答上话了：

“莫啥子关系，敌人的子弹不会打中我朱德的。敌人怕我，子弹也怕我。你没听说吗？子弹会拐弯，碰见我就躲着走了！”朱德这一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的确，朱德一生身经百战，是从血与火中冲杀出来的。他的衣服、帽子弹痕累累，而身上却无片伤，真是一种奇迹，所以，在红军战士中流传着“子弹见了总司令会拐弯”的神话。朱德自己说“我只是熟悉敌情、地形，会利用地形地物，以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罢了”。

毛泽东看朱德像战士请战一样地坦率、真诚和坚决，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无可奈何地说：

“总司令，那我就只好同意了，不过……”

“不过啥子哟？就这样敲定了！”朱德的目的达到了，神采飞扬地站起来就要走。

“总司令，等一会，我们大家为你送行。”

久雨初晴，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军委纵队的同志，每人手上都拿春一面用小竹杆做旗杆的三角小彩旗，兴高彩烈地站在大路两旁，不一会儿，朱德在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林伯渠、徐特立等陪同下，精神抖擞地走过来。他身上穿着那身旧棉衣，头戴红军的八角帽，腰里束着一条宽宽的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脚蹬一双草鞋，肩上依旧挎着那支从南昌起义以来随身携带的驳壳枪。同他并肩走来的毛泽东，手里也拿着一面小彩旗，边走边领着大家高呼着：

“欢送总司令上前线！”

“消灭川军，北上抗日！”

“多打胜仗，创建新苏区！”

“打倒蒋介石！”

……

朱德微笑着，边走边向大家扬手示意。他扭转头来带着非常激动的感情对毛泽东说：

“何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我朱德担当不起呀！”

“怎么是礼重了？总司令上前线，理应如此嘛！大将出征，三军欢呼嘛！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深！祝总司令旗开得胜，多打胜仗，多捉俘虏！”毛泽东十分动情地回答着。

欢送的同志们也齐声高呼：

“祝总司令旗开得胜！”

他们走到队伍的尽头。朱德站下来，回转身同周恩来、洛甫、王稼祥等一一亲切握手，非常感激地说：

“有劳各位了，我朱德深感不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最后，他来到毛泽东身边，两位亲如手足的战友长时间地握着手，用力摇晃着，无限的深情都融合在这握手之中。

“你走了，把我的心也带走了一半！请多加保重啊！凯旋之日再为你洗尘！”毛泽东一再叮咛着。

“请放心吧！有红军战士在，就有朱德在！你也要多保重！”说完，朱德猛然抽回手。后退了两步，向送行的战友们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转身朝前走了。走出去了十几步，他又收住脚步，转回头来向毛泽东以及前来送行战友挥了挥手，以示告别。

在危难时刻，当机立断，挺身而出，敢于打头阵，敢于拼杀出一条生路，是朱德一生中最高贵的品德和作风。为保证起义军南下潮汕，留守三河坝，激战三昼夜的是朱德：起义军失败后，在“赣南三整”中，登高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的是朱德；发动湘南起义时，决策不费一枪一弹，智取宜章的也是朱德；湘南起义后，提出去找毛泽东，实现井冈山会师的还是朱德。这正是朱德大智大勇的虎将风采，敌人闻风丧胆，同志无限敬佩。

朱德大步流星地朝着炮火连天的前线走去。毛泽东和送行的战友们望着他那高大伟身影渐渐消失在莽莽密林中。

朱德赶到前线青岗坡时，三军团和五军团的战士们正在浴血奋战。当朱

德出现在三军团四师的阵地上，对红军官兵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在他的直接参与指挥下，四师一鼓作气，连续夺得川军控制下的几个山头，但是，战斗仍在拉锯阶段，无大进展。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决定，正在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的干部团奔赴前线，发起反冲锋。这个干部团是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扬两个步兵学校合并组成，成员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朱德指挥干部团抢占有利地形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午后，右翼川军的兵力迅速聚增，同红军反复争夺着每一个山头，战斗异常激烈，有的战士子弹用尽就冲上山头与川军展开肉搏，手举大刀向敌人的头上砍去。红军的阵地几度丢失，不仅战士伤亡很多，就是团以下的干部也有不少牺牲。就在这种处境极为危险的时刻，朱德仍坚持在前沿沉着地指挥战斗，岿然不动，毫无惧色。

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几位领导人开会，根据敌军云集川南、黔北一带，围堵红军的新情况，决定改变原拟由赤水北上，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样，就可队打乱敌人尾追的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为此，朱德、刘伯承仍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病员和处理好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都立即轻装，准备从土城渡过赤水河。

赤水河，是长江上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沿云南、贵州、四川的边界蜿蜒北上，在四川江合流入长江，全长四百多公里，穿行在滇、黔、川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河水奔腾湍急，河面最宽处三四百米，最窄处也有一百多米。是一条极难渡涉的河流。

29 日 3 时，朱德下发了红军西渡赤水的命令。不久，他就来到一军团二师四团的阵地。

天下着雨，川军仗着人多枪多，气焰十分嚣张，增援的部队不断增加，战斗一直在胶着，伤亡仍在不断增多。朱德手提着驳壳枪来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敌我战斗情况后，当机立断，下今后撤。

四团从前沿撤下来后，突然发现朱德还未撤出战斗。为了掩护朱德后撤，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又带了二十多个战士冲上山坡堵住敌人。他们顺着枪声搜寻了好久，才远远看见朱德背靠着赤水河，手举着望远镜在观察什么。阵地上的红军越集越多，六团团长朱水秋也来了，大家听说朱总司令没有撤下来，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个个急得手掌都沁出了汗。而朱德还是镇静若定，稳稳地站在那指挥着最后撤出战斗的一营掩护部队。约莫过了 1 个小时，他才收拾起望远镜、地图，不慌不忙地走下阵地。

杨成武向朱德敬了个礼，说：

“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呀！”

“我不知道你们又来接我，为我着急呀！”朱德非常和蔼而又抱歉地说。

王开湘也说：

“我们急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朱德亲切地笑着，非常风趣地说：

“急什么，你们都忘了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哩！我不会有危险的。”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指挥、朱德等协助，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的成

功战役。在四渡赤水之前的土城战斗中，善于化险为夷的朱德在他戎马生涯的征途上。又重重地写下了一笔，创造了总司令上前线的辉煌。

空城计

朱德自幼勤奋好学，家境虽然贫寒，但他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后来，他怀着一颗强兵救国之心，投笔从戎，奋身军界。在戎马倥偬中，也常常是手不释卷，以书为友，以书为伴。他信奉的格言是“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也学不了。”他从书中吸取了智慧和力量。他留下的那部《史记》和那部《三国志》，就是最好的证明。

1916 年，护国战争结束后，朱德因战功卓著晋升为滇军的旅长，驻防在四川的泸州。从那时起到 1919 年，战事平息，生活安定，他购买了一批古籍，结交当地的一批文人学士，在公务之余，博览群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他在读《史记》、《三国志》时，用蝇头小楷写下了一百多条眉批。一部善本《三国志》，拿在他的手里，就读出了无穷新义。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学家当作名著典籍，史学家当作历史，军事家当作兵书。他从中读出了慷慨悲歌，读出了千军万马，吸取了韬略和智谋，吸取了力量和勇气，《三国志》中许多成功的战例和经验，演绎成了他的辉煌战绩。

今天，当我们在翻阅这些珍贵的藏书时，读到朱德的那些精辟的眉批，在深受启迪之余，自然联想起一些同志讲过的长征途中总司令摆空城计的故事，实在兴味无穷。

那是 1936 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积极筹集物资，准备北上的时刻。四方面军总部、医院驻在川西北一个叫梦公镇的地方。这是一个四面群山环抱的镇子，崇山峻岭高入云端，地势险要，十分隐蔽和安静，是个整训的好地方。部队开展着紧张的军事训练，根据北上时可能遇到的敌情和地形，朱德领导着大家学习打骑兵、打堡垒、夜间战斗，强渡江河等战术的同时，还大力开展了政治文化教育和娱乐活动。

这一天上午，小镇南端的球场上有一场精彩的篮球赛。大家听说朱总司令也要上场参加，都格外高兴，早早来到球场等待球赛开始。几乎在镇上的红军都去了，还有不少群众观看。

裁判员的哨音一响，球赛开始了。果真，朱总司令作为一员普通篮球队员，纵横驰骋在球场上。只见他一会儿穿插突破，一会儿中投得分，生龙活虎，赛过那些年轻人。没有多久，比分就超过了对方，随着连连得分，四周的观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时还夹杂欢呼：

“总司令，加油！”

“总司令，加油！”

正在大家兴高彩烈地欣赏着总司令的精彩球艺时，突然，从北面的山脚下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声。

在枪林弹雨中冲杀了二十多年的朱德，对枪炮声特别敏感，不仅能从枪声中辨别出枪的种类和型号，还能判断距离。他陡然停下，向场外的警卫员喊道：

“有情况，警卫员拿望远镜来！”

他从警卫员的手中接过望远镜，朝着有枪声的北山上观察了一阵后，对大家说：

“球赛暂时停止，现在发现敌情，大家准备投入战斗。不要慌乱，要听从指挥。”

说是不要慌乱，可敌人突然偷袭总部，非同小可，不能不让每个人担心：

眼下，主力部队正在前面作战，只有一个警卫连在总部身边，其余都是些机关工作人员，还有医院的大批伤病员。在这危急关头，怎么办？撤吧，一时半晌撤不出去；打吧，只有一个战斗连队。进退维谷，一些参谋人员，在那里急得直跺脚。可是，朱德却非常沉着、冷静。他迅速把各单位的负责人和警卫连召集在一起，下达了命令：

“手中有武器的同志和警卫连一起，到东面大墙下面集合，等我的命令再行动；其余的同志，每人快去找一根木棒，到河边的大操场集合，等待命令行动；司号排，按东、南、西三个方向分散开，听到我们发起冲锋的命令后，你们就在各自的方位上，从四面八方一齐吹冲锋号，号音越响亮越好。现在就开始行动。”

大家迅速散开，各就各位。

枪声越来越密了，也越近了。看来是和红军在北山上的哨位接上了火。

不久，敌人越来越近了，肉眼都能望见，大约有三四百敌人嗥叫着，端着枪向镇上冲过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朱德命令警卫连分成东西两路，向敌人的侧后迂回，其余的人员在正面选择有利地形，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迎击敌人。当敌人进到离梦公镇仅几百米的时候，朱德举起驳壳，一声呼喊：

“同志们！冲啊！坚决把敌人消灭在山坳里！”

还击的命令一下，警卫连从左右猛然发起攻击，正面阻击的同志们也奋勇还击。此时，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枪声、杀声震天，战士们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冲向敌群。

敌人一看中了埋伏，马上乱了阵脚。有的被打死，有的抱头鼠窜，更多的是当了红军的俘虏。

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原来这股敌人是一帮乌合之众，是当地土豪恶霸豢养的一批土匪武装和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他们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红军主力外出作战去了，这是红军的后方，只留下一些伤员，便想趁机抓一把，发点洋财，不想，便宜没沾上还搭上了性命，被红军给消灭了。

打扫完战场，朱德开始审讯俘虏。

一个小头目战战兢兢地说：

“长官，饶命！我罪该万死，不该来打红军！”

“啥子该不该哟！你都打了，只是吃了败仗，你才说这种鬼话！”朱德说。

“我该死！我该死！”小头目一面说着，一面猛抽自己嘴巴子，左一个，右一个，打个不停：

“我说实话。那是当官的让我们来打红军的。他骗我们说这里没啥子部队，就是些伤号。还说，这是红军的后方，有钱，有粮，有盐巴。哪晓得你们这里驻了那么多红军！”

“你说说，到底有多少红军在这里？”

“报告长官，小的不敢瞎说。”

“不妨，你说说看！”

“要小的说，光从号音上就能听出，起码有四个团，这东边，西边，南边都是部队：再说你们在河滩里集会的部队，还没动呢！我们真是活腻味了，找死来了！”小头目说着说着又哭起来了。

在一旁的参谋们都直想笑，小声地说：

“他作梦也没想到这是总司令的空城计。”

“优待俘虏，是红军的一贯政策，你也不要怕。只要放下武器，低头认罪，都会得到宽大处理！”朱德非常严肃地说。

“这一点，小的晓得！晓得！长官饶我一条小命就是再生父母！”小头目跪倒在地连连叩头。

小头目被带走后，朱德对参谋们说：

“唱罢空城计，我们接着赛球哟！”

挥师抗日出征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一场更大规模、更加野蛮的侵华战争开始了。

枪声起处，乌云滚滚。全中国人民愤怒了！全世界人民震惊了！

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庄严通电，明确指出：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一天，朱德、毛泽东和红军其他将领致电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说：

“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通电发出后，红军立即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并限 10 日之内准备完毕。

7 月 14 日，朱德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亲笔写下了著名的抗日誓词：

“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本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18 日，朱德告别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泾阳县的云阳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途经黄陵时，他专门去晋谒了黄帝陵。在苍松翠柏围绕的黄帝陵前，他抚今追昔，思绪万千，恭恭敬敬的三鞠躬后，默默地仁立在那里好久好久，是在重温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抗击侵略者可歌可泣的历史，还是在默诵着他那“不杀倭寇誓不还”的誓言。最后，在离开黄陵时，只说了一句：

“等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军，再来祭陵！”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主力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四万五千人。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

在耀县庄里镇，朱德亲自主持了抗日誓师大会。

8 月里，八百里秦川仍然骄阳似火。当年久旱不雨，地里的高粱、玉米都打了蔫，道旁的小草也黄了尖。农民们早盼着一场透雨。今天终于变天了，天边翻滚着乌云，几声闷雷带来了蒙蒙细雨。早饭过后，乡亲们看见红军队伍冒着细雨，从四面八方向广场上集中。在广场的一边，用十几张方桌搭起了一个台子。

不一会，队伍到齐了。在万头攒动的会场上，《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此起彼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震撼长空。这时，朱德总司令穿着一身灰色的布军装，精神抖擞地登上了高台子，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歌声停了，掌声停了，全场息声屏气地听着朱德的讲话：

“同志们！老乡们！7 月 7 日在卢沟桥又燃起了第二个‘九·一八’的号炮。日本法西斯的铁蹄又践踏在我们华北的大地上，又在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国土了。和平已到了绝望的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面前的问题是，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华北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的抗战，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抗战，只有在抗战中找出路，求生存，没有什么踌躇，而且不容徘徊。这是每个中国同胞应有的决心。全国军民应该紧急动员起来，免去一切隔阂，扫除一切门户

之见，不分畛域，不分派别，齐心协力，整齐步伐，实行团结一致的对日抗战，时间再不等我们了。”

朱德那宏亮而又激昂的声音，在广场的上空回荡着。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像沉重的铁锤，撞击着人们的心灵，都像炽烈的火焰，燃烧着人们的胸膛。人民在受难，祖国在流血，日本强盗的战车正轰隆轰隆地开过来，要从我们兄弟姐妹的胸膛上压过去，我们能坐视不理、束手待毙吗？不能！万万不能！

朱德继续说下去：

“我们红军的志愿，就是抗日救国。为了实现这个志愿，我们愿意放弃有着十年光荣声誉的‘红军’这个名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旗号变了，帽徽变了，但我们的心还是红的，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红军的传统没有变，解放全中国的意志没有变。为了打日本救中国，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正确的。”

换下红五星帽徽，对每个红军战士来说，在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开始时还有些接受不了。可是，总司令把道理讲得非常清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问题不在形式，最为重要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战士们个个都无条件地服从了。

雨，越下越大了。透过雨幕，战士们看见朱总司令站在高台上，挥动着手臂，讲道：

“我们要到华北去！到敌人后方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只要我们把华北的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进行持久的斗争，最后的胜利必定是我们的！”

最后，朱德带领大家庄严宣誓。全体指战员跟着朱德一字一句高声复诵着《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戾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的父母兄弟，奸淫我们的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族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钢铁般的誓言，在风雨中回荡，抗日壮士将要踏上征途。

9 月 16 日，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继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之后到达韩城县芝川镇，决定从这里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为国捐躯”之谜

1938年2月28日，在大后方武汉。

一夜之间，爆出了抗战以来最大的新闻，报童们在中山大道，在江汉关，呼喊叫卖着：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国捐躯！”

“民族英雄朱德以身殉国！”

“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战死在华北抗日前线！”

报纸的号外满天飞扬，各种传闻不胫而走。新闻界闹得纷纷扬扬，老百姓一时间也难辨真假。

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幸灾乐祸，巴不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些头脑清醒的爱国者，认为在没有看到共产党的报导前，不能轻信；各界的爱国民主人士心急如焚，莫衷一是。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不时接到电话，询问朱德总司令的安危。新华日报社也向延安发去电报，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在延安的党中央、毛主席也给八路军总部发来急电，询问情况，特别提到朱总司令所在位置在哪？要求立即回电。

一时间，满天乌云，满天风雪。到底在抗日前线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风云骤变。一进入1938年，山西的战局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依照大本营的部署，企图先集中兵力侵占全华北，不断地从其它方向调来几个师团。这时，华北的总兵力已增加到十一个半师团，重点就在山西。在山西重点计划是发动晋西南战役，日本鬼子攻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临汾。敌人杀来两路兵马：一路沿同蒲铁路南下，直取临汾；另一路沿平汉线西进，过东阳关，经黎城、潞城迂回临汾。

正在这时，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部从洪洞向晋东南转移，去建立太行山根据地。随行人员有副参谋长左权和总部机关的参谋人员，另外还有总部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二百多人。

这一天，朱德率部行军到安泽县的岳阳镇时，突然传来消息说，前面不远发现敌情。

朱德立即派人去侦察。侦察员很快就回来报告说：

“敌军苫米地旅团约三千人，是去攻占临汾的。前卫部队正在快速前进。”

军情紧迫，如何决断？

一位参谋建议说：

“可否给临汾的友军发个急电，通报一下敌情。我们立即甩开公路，向南面山区转移。”

久经沙场的朱德，深知在与敌人遭遇时，来不得丝毫犹豫。他说：

“电报可发。但是，我们绝不能撤！一定要顶住敌人，给临汾的军民争取几天备战和疏散的时间。”

朱德身边的参谋人员，多数是跟随他从九死一生中闯过来的，都知道军令如山，不允许讨价还价。但是，眼下的形势让人太担心了。

打仗，毕竟不是做游戏，而是生死搏斗，一个营对付一个师团，二百壮士拖住三千鬼子，敌我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们从亲身实战的体验中，有一个坚强的信念，那就是只要有朱总司令指挥，就能胜利！他

们相信朱德自有战胜敌人的办法。

23 日，鬼子兵没放几枪，轻易占了良马镇，就更加肆无忌惮，觉得他们是大军开进，如入无人之境，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在通往临汾的大道上，浩浩荡荡，耀武扬威，毫无警戒，一直向西开拔，并传下命令：

“今天要到达临汾城下！”

好梦不长。鬼子快速行进中，在三不管岭碰上了钉子。劈头盖脑一阵枪声，把鬼子的先头部队压住了。他们趴在公路旁，不敢前进一步，这时才醒过梦来：“不好了，前面有八路军！”

这一带正是太岳山的南端，山高林密，一条公路蜿蜒而过，是阻击敌人再好不过的地形，朱总司令让左权带着两个连和安泽县自卫队，去同鬼子周旋。他们依据地形组织了防御纵深，采用节节抗击战术，在山势险要地段设下几道防线，抗击鬼子前卫部队前进。

在第一道阻击线上，只部署了两个班，就把鬼子给镇住了。

鬼子兵不敢前进了，枪声也停了。

过了好久，鬼子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便搜索前进。但是，一扫那种挺胸腆肚的“皇军”威风，个个都像惊弓之鸟，提心吊胆地端着枪，猫着腰一步一步往前挪，生怕从山上杀出一队“八路”来。

天不转地转，山不转路转。鬼子兵刚刚转过一个山弯。突然，又是一阵枪声，而且还飞来了几枚手榴弹，炸得小鬼子鬼哭狼嚎，乱作一团。这是八路军设下的第二道阻击线，就是要打他个措手不及，就是要叫他不得安宁，就是要他不敢前进。鬼子兵哪受得了这种捉弄，早已气急败坏，嚎叫着冲向丛林。这时，警卫部队早已转移阵地，他们连个人影也没看见。

枪声停了。鬼子兵以为是遇上了游击队，是一场虚惊，在当官的指挥下，又大模大样地开始赶路，因为今天的目标是临汾城下。

哪晓得，左权带着警卫部队已设下了第三道阻击线，正在前面等着他们呢！

又是一阵排子枪和手榴弹，比前两次来得更猛烈更突然，打得鬼子兵蒙头转向，血肉横飞。

几个日本侵略军的头目，抽出东洋刀，拼命地叫嚷着：

“冲过去，冲过去！不要停止前进！八路的，不要怕！”

被驱赶的鬼子兵，端着“三八大盖”向两边的丛林冲去，向公路的前方冲去。子弹在鬼子头上飞舞，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

警卫部队神出鬼没，打打停停，节节抗击。三千鬼子被拖在太岳山的盘山道上，既不能集中，也不能展开，前进不得，后退不成。纵然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也无法施展开来，只能处处挨打，他们离临汾城，少说也有一百里。

24 日，左权带着警卫部队同鬼子又周旋了一天。敌人没有前进多少，更没占到什么便宜，而且还送掉不少性命，丢了不少武器装备。气得一直在叫骂：

“八路的，狡猾，狡猾！”

“八路的，良心的通通坏了！”

当官的拿鬼子兵出气，像赶羊似的驱赶着小鬼子到处冲杀，到处放枪，哇哩哇啦的吼声在山谷中回荡着。

25 日，鬼子不知从哪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弄清了阻挡他们前进的不是八

路军的大部队，只是一支小分队，尤其让他们震惊的是指挥着这支小分队的竟然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由此，他们判断八路军总部可能就在这里，立即报告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要求空军来支援，彻底消灭这支小分队。

当时，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正战斗在安泽与良马之间的古县镇一带。日本侵略军的空军接到出击的命令后，就摊开了作战地图，在山西省的南部寻找古县的位置。

自以为是“中国通”的几个侵略军头目，凭着他们所认识的几个汉字，趴在地图上东找西寻，终于在屯留县的西北方向找到一个“故县”，如获至宝，他们认为这就是要轰炸的目标。立即命令十几架飞机起飞，到了故县的上空就是一通狂轰滥炸。转眼间，一个个好端端的和平村镇被炸毁，成百上千的无辜百姓惨遭杀害。故县在流血，故县在流泪，故县变成一片火海。鬼子的空军为了报功领赏，谎报战绩说：

“目标已全部消灭，再未见一个八路！”

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见到八路军的影子，是他们自作聪明，把“故县”当成了“古县”。

这时，朱总司令安然无恙，仍在古县一带指挥着战斗。已经把敌人拖了三天了，但终究这不是久留之地，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建立太行山根据地。副参谋长左权非常关心朱总司令的安全，他觉得万一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就不好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交待。他再三向朱总司令建议：

“把鬼子拖了三天，为友军赢得了时间，该撤了！”

“敌人已知道我们不是大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围拢来，该转移了！”

“现在，四面枪声不绝。鬼子兵不再夺路前进，而是朝着我们扑来。情况非常紧急，再呆在这里就很危险。”

到了 25 日傍晚，情况更加危急。敌人的炮弹不停地在总部附近爆炸，枪声越来越近，子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朱总司令非常沉着地率部甩开大路，转移到路南的刘垣村。

恰好这时，后面总部警卫团新建的警卫通讯第二营的两个新兵连赶到了。他们人虽然不少，可没有枪支，每人只有两颗手榴弹。朱总司令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是锻炼他们的一个好机会，应该让他们同鬼子拼搏一下。

说巧，也真巧。这时，鬼子的后续部队过来了。从侦察的情况得知，过来的是由许多大车组成的鬼子的辎重队。

朱总司令亲自组织新兵们打了一个伏击战。两个新兵连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下，埋伏在敌人必经的大路旁。当敌人的辎重队进入伏击圈后，一声令下，二百多颗手榴弹一齐投向敌群。鬼子军死的死，伤的伤，辎重全部被缴获，不仅有枪支弹药，还有不少军需物品。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炸毁敌人大车几十辆，歼灭一部分鬼子。更重要的是两个新兵连不仅得到了锻炼，还用缴获的武器武装了自己。

朱总司令以他那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冲出了日本鬼子的包围，胜利地到达了太行山区。“为国捐躯”是敌人造的谣言。朱总司令正威武地站立在太行山上，指挥着千军万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浴血奋战。

邀友军观战响堂铺

在八路军连战连捷、军威大振的形势下，朱德于 1938 年 3 月 2 日，就任了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除指挥八路军外，国民党军的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第十七师、骑四师、第五二九旅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第三纵队也归他指挥。

3 月 24 日，朱德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沁县城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的负责干部外，还有山西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兼决死第一纵队的领导人薄一波以及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曾万钟、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任、第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等国民党将领三十多人。当时，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几十万国民党军望风而逃，溃不成军，华北的广大地区已成为沦陷区。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因为临汾失陷，阎锡山逃往黄河西岸，而对坚持敌后抗战失去信心。

朱德在小东岭会上，先分析了形势，说明抗日战争是一场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不管打多少年，最终我们一定会胜利的。然后，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他提出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结合着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例，讲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国民党的将领听了后，有的频频点头称赞，有的还是顾虑重重，总觉得八路那一套学不来。会后，为了传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专门开办了一个游击战术训练班。朱德亲自讲游击战战术。

正在这时，一二九师向朱德请求批准他们在山西黎城与河南（今属河北）涉县之间的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自从日军侵占临汾后，从邯郸经长治到临汾的大道已成为日军的重要交通补给线，很多重要的作战物资都要通过这条大道，送到前方。

响堂铺在晋豫两省边界上，紧靠着山西境内的东阳关。东阳关虽然没有雁门关、平型关、娘子关那样出名，但也是晋东南的一个重要通道，雄踞在巍巍太行山的南端。我们的祖先为了让子孙后代守住这个兵家必争的重要关隘，在那关口的石门上镌刻着“天关叠嶂”、“地设重关”的警句，以示后人。但是，抗战开始后，驻守在这一带的国民党军与日本侵略军稍一接触，就望风而逃了。日军侵占了东阳关后，便长驱直入，先后攻占黎城、潞城、武乡、长治，日本侵略军的旅团长苫米地竟然吹起了“踏破太行山”的牛皮。

在响堂铺打伏击，真是十分理想的地带。邯（郸）长（治）公路沿着一条干涸的小河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着，路面坑坑洼洼，碎石遍地，别说汽车不便行驶，就是人走在上面也不是坦坦荡荡。路南面紧贴着不易攀登的悬崖峭壁，异常险峻；路北面则是连绵起伏的高地，有利于部队隐蔽和出击。

朱德批准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并邀请友军将领去观战。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让他们看看八路军是如何打仗的，以增强战胜日本侵略军的信心。这时，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去参加小东岭会议尚未回到部队，所以决定响堂铺战斗由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负责指挥。

3 月 30 日，一切准备就绪。被邀请来的友军将领，都按计划登上了路南面最高的山头，隐蔽在那里，拿着望远镜注视着下面公路上的动静。自从抗战以来，他们虽然都置身于敌后，但是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这还是第一次。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复杂，有的想看个热闹，看看八路军到底是怎样打鬼子的？也有的提心吊胆，比自己指挥部队打仗还不踏实，怕万一八路军打不过日本军队怎么办？弄不好自己还得当俘虏。也有的认为

既然安排他们来观战，八路军总是有把握的，不然怎么交待。看看人家怎么打仗，自己也增长见识。

的确，八路军是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为了打好这一次伏击战，进行过多次侦察，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3 月 30 日深夜，徐向前、邓小平率领主力 3 个团秘密进入响堂铺一带，设下了埋伏圈，只等鬼子兵到来。

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陈赓旅长打来电话，说东阳关的敌军有二百多人进到了马家峪，长宁东南也发现有敌人的骑兵，向我侧后方运动。陈赓说：

“可能是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要从我右翼侧击，截断后路。是否把主力撤回，去截击敌人？”

这突如其来的新情况，给徐向前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真是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来个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可真是很危险的。就应立即撤出阵地，放弃这次伏击战；如果判断错误，敌人不是这个企图，盲目撤出，就失掉了一次胜利的机会。徐向前正在反复思考着，电话铃又响了。

“撤不撤？”陈赓仍在急切地盼望着下定决心。大家也注视着徐向前。

徐向前两眼盯着作战地图。他判断情报不可靠，如果真是敌人发现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便拿起电话对陈赓说：

“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设伏，不得暴露。”

放下电话后，他又对参谋说：

“注意，在敌情未搞清前，先不要向邓政委报告。我们在前面，不能把不明不白的情况报告他，给他出难题。”接着，他就派作战科副科长邓仕俊和另一个参谋化装后火速去东阳关一带探听虚实。

两个小时后，他们回来了。得到的情报，正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从内线得知敌人无异常动静，所谓“敌骑兵”是老百姓赶的一群骡马驮驴，算是一场虚惊。

果然，不出所料。31 日早晨 8 时，敌人就出现了，先上来的是两辆小车，可能是先来探路的。到了神头河，就停下来不敢前进了。车上下来几个鬼子，手里拿着望远镜，贼头贼脑地东张西望，像是在观察地形，又像在寻找什么。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情况，叽哩呱啦地嚷嚷了一阵后，也就大胆地上车走了。伏击部队看得清清楚楚，但都静静地等待着敌人的运输队，让他们放心地过去了。

不久，传来了嗡嗡的汽车声，随着声音的逐渐增大，一串像屎壳郎样的汽车不紧不慢地开过来，一辆、两辆、三辆……观战的友军将领在高高的山顶上，举着望远镜仔细看着，认真数着，数着数着也就弄不清准确数字。但足足有一百多辆，这时，他们既兴奋又紧张，眼看着一场伏击战就要呈现在眼前。他们虽然也带过千军万马，指挥过不少战斗，但是看别人打仗，而且是八路军打日本鬼子，这真是平生第一次。个个都是目不转睛地瞪着山下的日军辎重部队。

当日本侵略军的辎重队完全进入了伏击圈后，徐向前下达了开始攻击的命令。

突然间，迫击炮、机关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像冰雹似地投向敌群，喊杀声响彻山谷。冲锋号吹响，战士们呐喊着跃出堑壕，奋勇当先。整个响堂铺的峡谷里回荡着一片“杀”声，公路上浓烟滚滚，满载的汽车被打翻了，在那里燃烧，爆炸。战士们同敌人开始了白刃格斗，那些小鬼子还凶狠顽抗，

拒不投降，八路军战士个个勇猛异常，他们端着枪刺向敌人。有的战士负了伤，手上的武器掉在了地上，仍然赤手空拳地同敌人搏斗着，用牙咬，用石头砸……作着殊死的拼搏。友军将领们亲眼看到八路军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被感动了。他们只有在这时，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民族精神，什么是不怕牺牲，什么是英勇战斗。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鬼子兵顶不住了，立即分成几股，企图从南面山脚下逃窜。哪知道八路军的阻击部队正在那里摆好阵势等他们哩！劈头盖脑一顿猛打，机枪、手榴弹把鬼子又逼回了公路上。他们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歼灭的命运。这一仗打得好，歼灭敌军四百余人，摧毁敌人运输车辆 180 辆，缴获了包括平射炮、机关枪在内的一大批武器、弹药。

下午，日本侵略军出动了十多架飞机，飞临响堂铺上空，来了一番狂轰滥炸。其实，这时八路军早已安全撤离到秋树垣一带。那一堆横七竖八瘫痪在公路上正在燃烧的汽车，又遭到一次“自己打自己”的厄运。陈赓风趣地说：

“这不是打我们，是在给鬼子吊丧呢！”

友军的高级将领通过在响堂铺实地观战，对八路军将士的英勇善战精神以及他们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是心服口服。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不攻自破。

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曾万钟无限感慨地说：

“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将。正因为他们敢打敢拼，日本鬼子才会闻风丧胆！响堂铺伏击战，令人钦佩，可敬可贺！”

面对日军的“九路围攻”

1938 年的 3 月。

千里冰封的华北大地，冰雪开始融化，冰河开始解冻，寒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华北抗日前线的人民走出寒冷的冬天，准备春耕。就在这时，蛰居的日本鬼子，也突然活动起来，到处强拉民伏，强征车马，在晋东南地区修机场，修筑公路，运送物资，严然一幅紧急备战的景象，看来会有一个大的军事行动。

八路军总部在半个月前缴获了一张日军绘制的九路围攻太行山区的作战图，最近又从缴获的日军文件和士兵家信中，得知“4 月上旬又有大进攻”的信息，特别是得到可靠情报，日军开始调动第一〇八师团和一〇九师团以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共三万多人，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集中，企图用“分进合击”的手段，将八路军总部和主力逼到辽县、榆社、武乡、襄垣一带加以消灭。这就是日军的“九路围攻”。

朱德和彭德怀根据敌情，制定了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作战方针，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原则。他们命令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动转入外线，隐蔽集结，伺机歼敌一路；同时，发动群众，空舍清野，破坏交通，多方游击，袭扰敌人。按照这一方针，在敌人发动围攻之前，朱德命令八路军主力一部已进入到山西与河北交界的麻田、涉县一带待机。

果然不出所料，4 月初，日军开始大规模出动，一路烧杀，直向根据地中心地带扑来。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一进入根据地就碰上了空舍清野，他们变成了“聋子”、“瞎子”，弄不清八路军的行踪，粮食和牲口都藏了起来，没有吃的，甚至水井都堵死了，又没有喝的，还不断遭到游击队的袭击。

4 月 11 日，南路的日军已进至下良镇。这一路日军，是九路围攻的主力，是由苫米地旅团长亲自率领的一〇四旅团。苫米地是日军中一个凶狠毒辣、目空一切、刚愎自用的将领，就在这一年的 2 月间，日军三路会攻临汾的战役中，由于他诡计多端，抢先一步冲进临汾城，抢了头功，日军大本营为他颁发了一枚勋章。从此，他更狂妄骄纵，自诩精通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扬言一定要打垮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他针对八路军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原则，提出所谓“拖刀计”的战术，就是在作战中烧毁民房后，佯装撤退，当八路军游击队尾随追击时，进行伏击或围攻。这种战法，开始时使有些游击队吃了亏，他就更加自鸣得意，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写信给他女儿说：“天皇因我先入临汾，赐我一枚勋章，我已挂在左胸前，我的右肩也高起来了，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

朱德早已断定这一路日军有经沁县、武乡攻榆社的可能。果然，敌人进占沁县后，又向武乡进攻。当沁县和武乡相继失陷之后，八路军总部的处境就十分危险，经常在敌人的包围中指挥部队作战。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朱德决定率八路军总部转移到浊漳河的对岸去。

朱德率八路军总部避开敌人的锋芒，开始迅速转移，穿行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

部队赶到浊漳河畔时，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平静而流量不大的浊漳河，像一群追逐奔腾的野马，巨浪卷着黄沙和泥浆，从上游滚滚而下，发出

千军万马般的呼啸，震得地动山摇。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如何冲出绝境？

不远处传来阵阵炮声，敌人离他们不远了，情况越来越紧急，掩护总部机关的只有一个警卫排，要过不了河，那将是背水而战，极为不利。大家心急如焚，等待朱德的决断。

走在后面的康克清一听说过不了河，部队在前停止前进了，她非常着急，因为后面的炮声越来越近了，跑到前面一见朱德和彭德怀就急不可待地说：

“敌人眼看就会追来，部队过不了河，你们两位老总看怎么办？”

朱德正在一棵树下拿着望远镜观看浊漳河两岸的地形。他一听是康克清的声音，回过头来，慢悠悠地说：

“天无绝人之路。”然后，走到康克清身边，接着说：

“办法，总会有的，急啥子哟！”

这时，炮声更近了，除了日本鬼子小钢炮的声音之外，还夹杂几声山炮声。人们的心更揪紧了，参谋们也都围在朱德、彭德怀的周围，等待着他们的命令。

朱德说：

“首先要沉着。越是这种紧急关头，越不能慌乱。通知大家作好一切渡河准备，抓紧时间休息。”

不久，敌人的炮声更近了，听得清清楚楚，估计顶多也不到十里路了。形势紧迫，不能再等了。朱德下令开始渡河。他说：

“现在开始渡河。先把一根绳子固定在大树上，然后派人带着绳子游过河去固定好，大家拉开距离，抓着绳子涉水过河。挑选几个会游泳的，由孙泱带着去完成任务。”孙泱是朱德的参谋兼秘书，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的儿子，会游泳，水性很好。

很快挑选好了几个会游泳的，来到河边。孙泱身上系着粗绳，跃入浊漳河，穿过浑浊的激流，很快游到对岸，在一块巨石上拴好了绳子，部队开始渡河。

朱德把自己的马让出来先送病号和文件箱过河。当会游泳的警卫员要背他过河时，他说什么都不肯。这时的朱德已经是 52 岁了，他健步走下河滩，抓着一匹驮东西的马的马尾，走进激流。他一边过河还一边对大家说：

“过河时，眼睛要往前看，不能只看眼前的恶浪。这同咱们搞革命一样，不要被眼下日寇的疯狂所吓倒，要看到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他那坚定而有力的话语，激励着大家的决心和信心。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总部和警卫部队走向浊漳河。

朱德过河后一直站在河岸边。密切注视着大家过河。最后，他看见还有几个战士在河岸边徘徊，好久了也不过河。他问刚刚从河对岸过来的人，是什么原因。原来是几个刚当兵的北方新战士，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河和这么大的水，一看见河水就头晕。朱德立即让把自己的大红马牵过去，叫新战士骑着过河。

几个新战士一听牵来了总司令的马，让他们骑着过河，你推我让，谁也不肯骑。他们感动地说：

“总司令那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膛水过河，咱们怎能骑马？又是总司令的马呢！”后来，是在几个会游泳的战士帮助下，手挽着手，抓着绳子，互相鼓励着渡过了浊漳河。

朱德带着八路军总部渡过浊漳河，后面追击的敌军扑了个空。当他们赶

到浊漳河时，只见水击石响，渺无人影。

把日本鬼子甩在了河对岸，刚刚松了口气，没料到在夜行军中，又同敌人遭遇了。敌人有好几千人，到处打枪放炮。而朱德率领的总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幸亏遭遇战中敌人也弄不清八路军的虚实，根本就不知道同他们打仗的正是他们时刻想消灭的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当机立断，利用夜间的有利条件，在警卫排的掩护下，总部通过山路伸向敌人侧后，跳出敌人的合击圈。

天亮后，总部已安全转移到了太行山深处的偏僻地带。在群山中稍事休息之后，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穿过悬崖峭壁，向太行山的顶峰攀登，彻底摆脱了日军的追击，最后登上了太行山之砖壁村。砖壁村位于武乡县东南的太行山深处，东面靠山，南、北、西三面临崖，活像太行山半腰里伸出的一个“半岛”。村东南的小松山，松柏丛生，地势极为险要，只有村西有一条峡谷马道，通往山外，易守难攻，便于隐蔽。

4 月 16 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四四旅一部，遵照朱德、彭德怀关于跳出敌人的合击线外，隐蔽待机，歼敌一部的命令，在武乡东南的长乐村狭窄的河谷地带，将日军截成三段，予以歼灭。这次战斗共消灭日军一千五百多人，缴获各种枪支和军用物资一部。这股敌军是敌人发动九路围攻的主力，指挥官苫米地旅团长因为在长乐村打了一个败仗，后来受到处分。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有着决定意义的一仗。南路日军遭到严重打击后，其他各路日军更加心惊胆战，纷纷退却。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日军九路围攻的计划便以伤亡 4000 人的代价而宣告彻底破产。朱德不失时机地下令晋东南的八路军各部队全面出击，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乘胜攻克辽县、沁县、沁源、黎城、潞城、屯留、高斗、晋城、沁水、长治等十几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根据地。

授计七贤庄

古城西安市有个七贤庄，因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设在那里，一下就闻名遐迩，成了人人关注的地方，同志、朋友、敌人都拥向这里。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就设在城北西五路北街七贤庄一号。这是一座青砖灰瓦的大院群落，里面有大大小小十几个院子，离西安火车站很近，但又不在繁华热闹的大街上，可以说是闹中取静的一个好地方。

自从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同国民党商讨共同抗日的有关事宜，就在这七贤庄设立了红军联络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联络处就改名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先后在这里主持过工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都到这里指导过工作。

1940 年 5 月，朱德又一次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这是他第三次来到七贤庄。

这次，他是风尘仆仆从华北抗日前线来的，是党中央让他回延安途经洛阳时同卫立煌谈判之后到西安的。

一列火车缓缓地开进西安火车站，站台上站满迎接客人的亲朋好友，都在翘首张望，寻觅着自己熟悉的面孔，招手欢迎。

火车刚刚停稳，朱德就出现在车门前，来欢迎他的人们一拥而上。他一眼就望见了周恩来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主任伍云甫以及办事处其他同志，非常抱歉，惊奇地说：

“恩来同志，你怎么也来了！实在担当不起！”

“总司令，凯旋归来，理应迎接！”他们亲切握手，互致问候。自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他们都天各一方，快有两年没有见面了，当然有说不完的话。这次周恩来要代替朱德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两天前才从延安赶到西安。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当地驻军也派人来迎接，希望能住在他们那里。朱德婉言谢绝说：

“多谢各位，不再给大家添麻烦了。我还是住在七贤庄吧！到了办事处，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一切可以随便些。”

回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刚安排着住下，伍云甫就来向朱德汇报办事处的情况，希望总司令能给办事处的同志讲讲话。朱德满口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他在周恩来和伍云甫的陪同下，给办事处的同志讲话。他说：

“我们中华民族三年来的抗战，已为全世界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历史，为反对侵略扩张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证明我中华民族有充分的英勇和坚决，有足够的团结性和坚韧性，能够愈战愈强，直至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朱德着重介绍了抗战三年来八路军所取得的辉煌战绩：

“八路军三年来，进行大小战斗九百多次，毙伤日、伪官兵十六万人，缴获各种枪支五万多支，各种炮三百多门。当然，我们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有三万多将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三年来，我们曾在敌后建立和巩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我们曾在山东、

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的三百七十五县中，收复过一百九十八个县城。直到现在，可以说华北没有哪一个县是在日寇的完全统治之下，在华北二百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活动的地区达到百分之八十。我们一定要坚持华北抗战，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华北历来就是反对外民族入侵的主战场，自古养成了一种爱国的伟大精神。常说的‘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就是极好的证明。”

接着，朱德在介绍华北反“磨擦”斗争的情况时，说：

“从1939年底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反共高潮。他们到处制造磨擦，残杀我八路军和抗日群众，一时间内战的阴云又笼罩着整个中国。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开展斗争，前门打狼（日本帝国主义），后门拒虎（反共顽固派），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团结中不放弃斗争，在斗争中求得团结，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投降活动。听说你们在后方，也同样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破坏和暗算，处境也很困难，斗争也很复杂。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取得胜利！”

后来，在座谈中，办事处的同志们毫无拘束地提出许多问题，请朱德解答。

“如何来对付敌人盯梢？”办事处的同志问朱德。

这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最为头疼的一个问题。按理说，办事处是八路军的一个合法机关，国民党当局理应加以保护。但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却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使用各种卑鄙手段，想把它赶走或除掉。他们把办事处对面的一幢小楼强行买去，不分白天黑夜，都有专人用望远镜监视着办事处，还公开宣布不准任何商人卖东西给办事处，同时在办事处的周围设立了二十多个特务据点，化装成小贩、修鞋的、拉洋车的、收破烂的，整天蹲在七贤庄一带专门盯梢。进来的、出去的一个也不放过，不仅记录在案，还要跟踪。

朱德沉思了片刻，回答说：

“大家都打过仗，懂得声东击西，懂得佯攻、迂回。我看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盯梢、跟踪，也可以用佯攻的战术，给他来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设了那么多点，你不让他盯着，能行吗？不行。那就让他盯着，你先给他个‘假的’让他盯上，引开了他的视线，‘真的’再出来，不是他就盯不上了吗？你出去一两个人，他能盯上，你出去七八个人，分散开了，不是他就盯不住了吗？他要死盯着你了，也没啥子关系，你以万变应其不变，搞点灵活机动，他就无法应付。比如，要去送文件，要去搞联络，你白天不去晚上去，晴天不去雨天去，不让他摸到规律。出去了，就由不得他了，他跟踪你，你不走大街走小巷，穿堂过屋，前门进后门出去，把‘尾巴’甩掉。恩来同志是搞过长期的隐蔽斗争，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该向他学习！”

周恩来站起来说：

“总司令把隐蔽斗争和打仗联系起来，讲得非常深刻和实在。你们应该结合实际订出几条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战胜各种破坏阴谋，取得更大的成绩。”

朱德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

“你们是在险恶环境之中，一不要惧怕，二不要麻痹，三要讲究斗争的策略和艺术。只要大家认清了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时刻提高警惕，保持革命

气节，做好应付一切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的准备，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勇往直前。”

后来，朱德得知办事处交通科的一个姓贾的战士，因公外出，被特务秘密绑架了。办事处曾多次同国民党当局交涉、查寻，国民党当局矢口否认，至今仍无下落。他仔细分析了西安的情况后，觉得此事必须利用矛盾，才能探得虚实。西安是西北重镇，各种反动势力都在这里插了一脚，特务系统就有军统、中统，还有宪兵、警察，另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地方的杂牌军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朱德以拜访为名，亲自出面从旁探得情况，此事确系国民党当局所为。他便理直气壮地找上门去，指名道姓地向他们要人，迫使特务们不得不把人交出来，终于使小贾脱险，又回到办事处。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在朱德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逐渐学会了在复杂的环境中，开展政治斗争的方法，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与敌同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妄想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场大决战。

1948 年 5 月初。

夏天，已急促地来到华北平原。小麦、油菜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中共中央在河北阜平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一结束，就下达了中原战场的近期作战任务，要求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在中原地区集结，歼灭国民党号称王牌部队的整编第五师，以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临华东野战军前线司令部驻地濮阳视察和动员。陪同前往的有刚参加完城南庄会议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

濮阳，为古代名城，地处黄河北岸冀、鲁、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要地。春秋战国时期是各国诸侯七次会盟的名城。

朱总司令一行上路了，他们分别乘坐着三辆汽车向南行驶。第一辆吉普车上坐着陈毅、粟裕，在前面开路；第二辆吉普车上坐着朱总司令；后面大卡车上坐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都是跟随朱总司令多年的南征北战的老战士。

这是条直通南北的京汉大道，但年久失修，再加上战争的破坏，早已千疮百孔，坎坷不平。偏偏老天不作美，又刚刚下了一场雨，满路泥泞，走走停停，还得边修路边前进，一路颠簸，行进速度很慢。

一过邯郸，就算进入了敌占区。为了安全起见，陈毅建议车队由白天行驶改为夜间行驶，在敌人不知不觉中通过封锁线。

朱总司令说：“要得，这是个好主意！”

一天晚上，汽车刚启动，还未上路，当地的同志就急如星火地跑来报告说：

“前面约三十里处，发现有敌人的散兵。公路离敌人的据点也只有一两里路。”

走，还是不走？是绕开敌人，还是照直前进？几个参谋犹豫了。警卫参谋去请示朱总司令：

“前面发现敌人的散兵，走不走？”

“几个散兵怕啥子？走！”朱总司令斩钉截铁地回答。

汽车开动了，大家都睁大眼睛，注视着前后左右的动静。

为了隐蔽，汽车没有开灯，借着朦胧的月光，向前急驶着。

赶了约三十里路，第一辆吉普车突然停下来，陈毅和粟裕跳下车，快步走上一个土岗，警惕地观察着前方，后面的车一到，陈毅向朱总司令报告说：

“前面的确发现有敌人，大约二百人左右。”

“朝什么方向运动？”朱总司令问。

“正沿着公路向东南方向步行。我们是不是稍停一下？等敌人过去了再走？”

还没等朱总司令回答，后面乘坐大卡车的警卫人员来报告说：

“后面发现敌人，有多少，还未搞清。几辆汽车正朝我方开来。我们是

不是先向旁边避一避？”

朱总司令思考片刻后，果断地说：

“前后的敌人都不要去管它，我们继续前进就是了！”

大家还在大惑不解，有些提心吊胆。朱总司令说：

“你们知道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混水摸鱼’嘛！我看今晚月黑天暗，倒是个混水摸鱼的大好机会。继续前进，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注意！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

汽车又启动了。朱总司令端坐在前排座上，对司机说：

“把大灯打开，放心大胆地开吧！”

司机老于是个老同志，一直是为中央领导开车。当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时，为周恩来开车，后来回到延安为朱总司令开车。他不仅会开车，还会修车，技术熟练，什么样的车，他都开得动。

大灯打开了，两束利剑般的白光，把路面照得通明雪亮。汽车快速行驶着，隐隐约约看到有人影在公路上晃动，渐渐清晰了，确实是敌人的散兵，稀稀拉拉，倒背着枪，歪戴着帽，横不成伍，竖不成行，像是刚刚败下阵来。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他们闪到路边，站在草丛里，愣头愣脑地傻看着驶过来的车队。有几个还在那里用手比比画画乱指一气。

车队离敌人越来越近，警卫战士们站着的坐着的都端起枪，手指扣紧在扳机上，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静。

突然，敌人的一个小头目一声令下，大路中间让出一条通道，二百来人齐刷刷地站在路边。当车队将要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传出一声口令：

“敬礼！——”散兵们为之一震，瞪大双眼，目送着车队通过。

像是捉迷藏一样。这是玩的什么把戏？

原来，敌人发现车队时，也有个估计：起初，他们以为是碰上了解放军，吓得都躲在草丛里，以防万一。后来，一看只有三辆车，而且是两辆吉普，一辆大卡车，汽车都是美国造，车上还有国民党军车的标志，认定上面一定坐的是大官，所以就赶快列队迎送，免得惹出麻烦来。

说也凑巧，没有多久，后面敌人的那几辆车也渐渐赶上来了。看着前面部队这种迎送的架势，认定车上的长官准是个“大官”。所以，总是保持一段五六百米的距离，不敢超越前面的车队。就这样，天亮之前，朱总司令的车队顺利通过了敌占区。

一进入解放区，车队飞速前进，直奔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濮阳孙王庄。

朱总司令硬是带着两员大将陈毅、粟裕，乘着汽车深夜与敌人同行百里，在敌人的鼻子底下通过了封锁线，于 5 月 11 日安全抵达濮阳。

大家都觉得这次跟随朱总司令驱车南下濮阳，真是终生难忘的一部历险记。朱总司令却非常风趣地说：

“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黑暗中同行一条道，天亮时就分道扬镳了！”

朱总司令在濮阳听取了汇报后，向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团以上干部和连、排、班长及士兵代表，分别作了报告。他讲了全国战场的形势，正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号召大家加紧练兵，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

歼灭敌人。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

“蒋家王朝快要倒塌了，人民当家作主坐江山的日子，眼看就要来到了。这次战役关系重大。同志们，毛主席已经为我们摆好了决战决胜的歼敌阵，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朱总司令的讲话像奔腾的江河，一泻千里，引来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大家仿佛听到了胜利的进军号。

朱总司令在华东野战军的前线部队中视察了一周后,于 5 月 18 日离开淮阳，安全返回总部。

在解放战争由战略反攻转向最后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朱总司令日夜协助毛主席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给国民党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三大战役的胜利，为蒋家王朝的覆灭敲响了丧钟，预示着解放战争将在全国胜利。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3 月 15 日，毛泽东、朱德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了解放军。

4 月 21 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吹响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斗号角……